

99/6

总第87期

# 炎黄春秋

■ 任弼时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相助

■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 科学家严济慈的青少年时代

■ 秦陵兵马俑发现经过大写真

■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 「义不忘华」的华裔作家水仙花

■ 包拯七次弹劾宠臣张尧佐



1958年2月，任弼时和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窑洞前

# 强烈谴责

##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暴行

# 沉痛悼念

## 邵云环 许杏虎 朱颖 革命烈士



在贝尔格莱德壮烈牺牲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



在贝尔格莱德以身殉职的《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与妻子朱颖



邵云环与儿子在一起



许杏虎与朱颖结婚照

# 炎黄春秋

## 春秋笔

- 2 任弼时与毛泽东的相识相知相助.....章学新  
9 秦陵兵马俑发现经过大写真.....王兆麟

## 亲历记

- 16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21 我随陆定一长征途中做宣传.....赵发生  
23 “牛棚”里的抗争.....刘 衡(方成配图)

## 殒星篇

- 27 科学家严济慈的青少年时代.....张 沪  
33 陈郁带领我们反“把头”.....杨长春等  
36 温济泽临终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好党员”...方 实

## 人海浪

- 39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苏双碧  
45 中国第一位石油地质学博士潘钟祥.....安作相  
48 民初名记者黄远生喋血旧金山.....胡荣彬

## 群言堂

- 52 要让群众了解真相.....李 庄  
53 王业美发《内参》引发的思辨.....李 宾  
56 参观“柏林墙”追忆.....王为熊

## 争鸣篇

- 58 胜利之路为毛泽东作证  
——与《毛泽东与立三路线》一文作者商榷.....张培林

## 文艺苑

- 63 泪凝的记忆  
——悼丈夫志民一生之坎坷.....傅雅雯  
67 我眼中的作家胡征.....涂光群

## 九州景

- 70 甘肃的古罗马军人后裔.....陇 人  
73 邓颖超与宜昌公园.....曾继全

## 赤子心

- 74 “义不忘华”的华裔作家水仙花.....房福贤

## 古镜台

- 78 包拯七次弹劾宠臣张尧佐.....春 江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轶 张国琦 凌 云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吴 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法律顾问: 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印刷: 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 4.80元

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在党的七大后形成的，是全党爱戴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中任弼时（1904—1950）年龄最小，但他英年早逝。今年时逢任弼时诞辰95周年，本刊特发表《任弼时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相助》一文，以资纪念。

# 任弼时与毛泽东 相识相知相助

## ● 章学新

七大以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人组成。这个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是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复杂斗争中，克服了右的和“左”的错误逐步形成的。任弼时在党的七大的开幕典礼上说：在党的24年奋斗中，“最大的收获”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党产生了自己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七大闭幕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节节胜利，不到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代成熟的领导”。

本文仅就任弼时与毛泽东二人相识、相知、相助的史实作一简介。

### 毛泽东是任弼时当之无愧的师长

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任弼时是湖南湘阴县人，毛泽东长任11岁。

五四运动前，他们虽同时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毛泽东是一师的本科生，在校内是学生自治组织的骨干；在社会上是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创办新民学会的活动分子。任弼时是一师附小的学生，正是政治上启蒙的时期，毛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曾经激励了15岁的少年任弼时。1920年，任弼时进入由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校，就是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介绍的。1921年后，任弼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四年，较为系统地读了马列，接受了严格的组织训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大势有一定的了解。1924年，任弼时回国后，深感困难的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这期间，毛泽东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考察工厂农村，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地方工作，已经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他“闻道”在先，实践在先，是任弼时当之无愧的师长。

尽管毛与任早期的经历不同，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大方向一致，对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军阀的国民革命的方针政策，也是一致的。在“五卅”运动中，任弼时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致力于发动团员和青年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英勇斗争，建设共青团的组织。当时，毛泽东正在韶山，利用养病的机会作社会调查，组织秘密农会。“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在当地组织了二十多个雪耻会，开展公开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活动。后来他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在写的文稿中赞扬“五卅”运动是“空前的反帝”，“民众因此认识到什么是不平等条约”。

“四·一二”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后，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毛泽东率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任弼时在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的会议期间，听了斯大林的讲演，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任弼时接受了这个论断。所以，在八七会议上，他们态度鲜明地批评陈独秀的错误，一致主张发动土地革命。在革命转变关头，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 他们为复兴中国革命艰苦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毛泽东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任弼时坚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虽然斗争环境不同，但他们从总结经验入手，聚集革命力量，复兴革命的斗争精神是一致的。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任弼时都没有出席。这期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名的文章，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和李维汉、罗登贤等三人留守国内指导工作。任弼时时代中央（留守）起草了《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城市乡村工作指南》、《军事工作大纲》和《兵运策略》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对于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转变革命工作的方式方法，复兴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军事工作大纲》，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大



延安整风期间的任弼时

纲》规定：割据区域建立的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成分须有广大工农分子参加，首先选拔“赤卫队中的勇敢分子”；红军战士的任务“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以及军队党的组织领导和地方苏维埃的正确关系，苏维埃军委“即为党的军委”等等。这些规定，成为后来红军建设的基本准则。6月4日，任弼时为中央（留守）起草的给朱、毛的信中，决定：以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为军事委员会书记。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这种革命实际运动，在1928年5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这期间，正是任弼时等留守中央时期。如果说有差异，主要在于毛泽东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开始

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任弼时，虽然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已有所认识，提出了城乡斗争配合，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游击战争“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开”沉溺于赤色恐怖，而是“用少数武装拥护群众斗争向前发展”，以及发展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暴动的窠臼。

## 毛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操纵下，借口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犯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错误”，把一个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搞教条宗派的王明扶上台。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向几个重要的农村根据地先后派出代表团。任弼时率王稼祥、顾作霖去江西苏区；夏曦率代表团去湘鄂西苏区；张国焘率代表团去鄂豫皖苏区。同样是中央代表团，但政治作用和工作作风大不相同。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张国焘和夏曦从教条宗派的立场出发，在苏区夺取权力，忠实推行王明路线。毛泽东曾说：夏曦去后，把一切党权、政权、军权揽于一手，对贺龙、关向应诸同志的意见置之不理。其结果，就是把长江以北大块苏区“取消”干净。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猛烈指责原特委书记曾中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夺了他的权，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集于张国焘一身，八个中心县委书记被撤掉七个。

任弼时及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到江西后，情况完全不同。

在江西苏区设立中央局是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后决定的，目的是在蒋介石开始重兵“围剿”苏区时，中央对苏区工作加强指导。中央局的成员为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九人，周为书记。1931年1月15日，中央局

在江西宁都县成立时，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在上海处理四中全会后的有关事务，中央局书记由项英代理。

4月中任弼时率代表团抵达江西苏区，除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外，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正在召开的中央局扩大会议，并认同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总前委和苏区工作的充分肯定。

第一，决议认为：总前委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而且“并未因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在中央对毛已有所谓“右倾”、“富农路线”等微词时，上述评价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对中央局的成员，除了增加代表团成员王稼祥和顾作霖为委员外，不作变更，仍由项英代理周恩来为书记。任主管组织，毛泽东主管军事，王稼祥主管宣传；项、任、毛、王四人为中央局常委。根据毛的提议，扩大会议选举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报请中央批准。

第三，在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上，支持毛泽东和朱德的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击敌的正确主张。第二、第三两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任弼时离开军队，留住永丰县的龙岗，集中精力筹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中央局决定恢复毛泽东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统一领导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

第四，经过几个月的共事，任弼时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脾气大，不重视理论，有时‘杀偏风’”；认为项英处事“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因此建议中央以毛泽东代替项英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的这项建议连同增加彭德怀等五人为中央局委员的报批，中央置之不理。直到10月中，苏区党代会即将召开前夕，任弼时一再催问，月底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才作出答复：一是告诫“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

更之权”，“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二是不得不同意“中央局书记由泽东代理。”这样，11月1日召开的苏区党代会上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毛又被推举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1931年底，周恩来抵达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的代理书记和任弼时的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同时完成了历史任务。

第五，在筹备党代表大会过程中，临时中央确定的政治基调是：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决议案》中，没有强调要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只是在讲到加强党内教育注意思想斗争时，提到要“打击狭隘经验论”，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及离开实际的“空谈主义”两种倾向。所谓“狭隘经验论”，就是不指名地批评毛泽东。因为任弼时当时认为毛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是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社会调查。其实，毛提出这个口号后，不久有所补充，他写道：“我们的口号：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任弼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言不切中。半年后，临时中央指责党代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是“以反对所谓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批评任弼时没有贯彻临时中央的意图反对毛的“右倾机会主义”。

对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对中央局成员，毛说：“我当时提出要增加五个人，保守主义一概否定”。



任弼时与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台上交谈工作

##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

周恩来到达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到1933年5月任弼时调离中央苏区的一年半，是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与毛共事的后期。这期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正在深入推行，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工作的直接干预，也越来越强化。任弼时最大的失误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并且同意将毛从前方召回后方。

宁都会议的错误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任弼时认为“首先是对形势的估计和战略方针的争论”。到1932年春天，中央局的多数成员接受了临时中央的主张，夸大主观力量，要和反革命“决战”，“扩大苏区直至中心城市”，打赣州、打南昌，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毛泽东鉴于红军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部队连续苦战，亟须休整补充，红军应扫除闽、赣两个苏区之间七八个县内的地主武装，打通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然后，向苏区东北的地域发展，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以便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央局的领导没有采纳毛的主张，结果强攻赣州受挫；而毛泽东率领



任弼时、陈琼英和孩子在延河边

的东路军却在福建漳州获胜。这个事实并没有唤醒中央局大多数成员，反而责备毛执行进攻路线消极。1932年5月上旬，毛在前线时，中央局迫于临时中央的压力，在一个决议中甚至认为：三次战争以来中央局领导“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项针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是正式地宣布中央苏区原有领导的“死刑”。所谓“三次战争以来”，连任弼时也在被批评的范围之内。

其次是关于“前方来信”。为了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周恩来到前方，成立最高军事会议。后方的工作交给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主持。7月，前方来信提出毛泽东任总政委，“取消政府主席一级”，军事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以改变“宝塔式的指挥权”。9月，前方再次来信，提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机断专行，前方负责人太多，组织上又不“集中权力于个人负责制”，有时各持一见，不胜争论，工作“非常难做”。任弼时是支持这些意见的。

第三，是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湘鄂西、鄂豫皖两块根据地相继失利，纷纷来电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策应。临时中央又电告中央局，敌将倾全力进攻中央苏区，望以“最积极迅

速”之行动，伸出苏区击破敌之一面。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意临时中央“急于求战”的意见，主张先在苏区内准备战场，赤化南丰河两岸，诱敌深入。彼此意见分歧。在前方和后方的中央局成员电报往返陈述各自理由的过程中，前方发出训令，决定以十天为限，红军分散发动群众，教育训练，布置战场。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认为：前方这样做“完全离开了原则”，在这样的气氛下，前方坚持要求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不料，到了会上，多数成员因为早已形成了毛不执行进攻路线的错误印象，便集中指责毛泽东，主张召毛回后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虽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周负主持战争全责，毛仍留在前方助理；二是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讨论结果，“大多数”中央局成员同意集军事全权于周，保障进攻路线的执行的方案。但是，毛泽东因为“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提出暂时请假回后方治病。毛因此离开军队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这是周恩来所始料不及的。任弼时后来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才发觉的。”当他认识错误以后，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和七大的书面发言中一再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任弼时光明磊落的品格，令人景仰。

## 任弼时心悦诚服地辅佐毛泽东

任弼时为人光明磊落，思想方法上，尊重客观实际，敢于以社会实践论是非，既不轻信，亦不盲从，遇事独立思考。他坦率地说，离开中央苏区时，他仍然认为毛不重视理论，思想上“杀偏风”。抗战开始后，他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读了毛在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以及有关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才改变对毛的某些错误的认识，而且认为毛的论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特别是1940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在毛直接领导下工作，看到毛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



有节的策略运用，整风运动中思想领导和各种政策的掌握，他这才对毛泽东“爱戴佩服”，而且认为毛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从而心悦诚服地辅佐毛泽东，成为他的亲密助手之一。

任弼时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在复杂的斗争中不断深化的，但是他对毛的基本政治信仰是坚定不移的。所以，他离开中央苏区后，在关键时刻能坚持党的原则，积极支持毛泽东。

一是，长征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支持毛泽东北上抗日。长征途中，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拥兵自重，甚至另立“中央”，公开反对“毛、周、张、博”。任弼时、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极尽分化拉拢之能事，甚至以红军总政委身份要召开两军联席会，向任、贺施加组织压力，妄图抵制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任弼时和贺龙不为所动，坚持北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一方面军会合行动。1936年三军会师后，任弼时立即建议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红军三大主力。

二是，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不理解，不放心，所以派王明回国。王明以国际代表自居，一到延安就对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中央即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的书面和口头汇报中，阐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及八路军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坚持敌后抗战的伟大作用。共产国际改变了过去片面的看法，在决议中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和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说：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领袖。共产国际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的错误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有意思的是，在1938年

2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的是王明，但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支持的却是毛泽东。这是王明始料不及的。

三是，1940年春，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回延安后，全力协助毛泽东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毛泽东称这是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作用的两个环子”。任弼时和朱德总司令一起，组织军队屯田开荒，官督民办运盐，发动干部种粮菜纺线，发展边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三年奋斗，实现了丰衣足食，克服了国民党经济封锁而造成的边区“最大的一次困难”。与此同时，又受中央委托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从审查代表资格，研究党的政策，协助开展整风运动，直到准备会场等，做了大量准备。在此基础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担任大会的秘书长，胜利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

四是，全面内战爆发后，1947年3月，胡宗南以10倍于我的兵力进攻延安，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为了拖住胡宗南的兵力，书记处的三位书记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不过黄河，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后来，毛泽东称这是指挥最大的战争的“最小司令部”。在这一年时间里，任弼时一面参与决策，研究我军的军事行动，一面率领800人的中央纵队，负责解决“最小司令部”的行军居住、安全警戒、敌情侦察、电讯联络、物资供应等大量细致而复杂的具体工作。患有高血压病的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餐风露宿，沐雨栉风，几番化险为夷。他和毛、周等堪称生死之交。

## 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彼此相知相识，党的生活也较健全，因此，书记处内部实行集体领导，重大问题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任弼时勤于调查，原则性强，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偏向，敢于坦诚直言。比如：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时，康生夸大敌情，说什么干部队伍中

“特务如麻”，搞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延安各机关的知识分子干部一度被逼“坦白”成风。任弼时发现后和周恩来一起，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以可靠的数据，指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怀着抗日救国的热忱，“抢救运动”中被逼“坦白”的干部很多是弄错的。经书记处肯定后，任弼时着手进行细致的甄别工作。又比如，1947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又是康生在晋绥地区“指导”土改，破坏政策乱订标准划分阶级成分，在他直接“蹲点”的兴县蔡家崖村，被划为地主富农的，竟占总户的22.5%，同时，乱斗乱打乱杀，破坏工商业政策和统战政策，以致几个月之内，土改运动出现了“左”的偏向。任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在1947年12月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要立即纠正这种偏向，毛泽东采纳了任弼时和周恩来的建议，向全国各解放区广播了任弼时的报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策略指示，划阶级的文件发迟了。古人云：“千土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史实证明，任弼时不失为毛泽东的诤友。

## 历史的启迪

任弼时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值得称道的；自遵义会议开始到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也是一直为史家所称颂。但不容否认，在这个工作得很和谐的领导集体中，也隐伏着一个不健康的因素，这就是缺乏明确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遵义会议后，中央总负责人是张闻天。张闻天是个书生，政治经验逊于毛，加上遇事谦让，所以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毛泽东。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是40年代在延安经过两次机构调整而形成的。

六届五中全会后的书记处（也叫常委）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和周恩来等组成，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补为政治局常委。抗战初期，由于周在重庆工作，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书记处

成员不齐。鉴于六中全会规定：书记处开会时，中央所在地的政治局委员均得出席，毛泽东和任弼时商定，在1941年8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提议：七大以前，书记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和凯丰等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当时还有同志提议，开会时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三人必须出席。

到了1943年3月，整风运动深入，为了解决党政军“三权鼎立”的弊病，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政治局两次讨论。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权不明确，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说：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任弼时和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客观上是反映经过实践检验，毛在全党具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主观上都是出于对毛的尊重，但是这就在事实上造成日常工作中书记处主席决定一切。严格说，这是和六中全会的规定不相符的。六中全会规定是：书记处的训令、电文、文件，“须经半数以上书记同意方得发出”，各书记之重要文章及对外发表的重要谈话或报告大纲等，“在可能时须经其他书记多数同意方能公布”。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之说，是不符合六中全会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后来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书记处主席。”把党的三个主席集中于一个人，加上已形成的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不成文之法，这样，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主席就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没有制约监督机制的党法，是不完善的。这是任弼时和刘少奇的千虑一失，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迪。

（责任编辑 洛松）

编者按：秦始皇陵的地下庞大军阵——兵马俑群的出土，被誉为“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正值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 25 周年和秦俑博物馆开放 20 周年之际，本刊特邀长期从事文物考古报道的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兆麟，对秦俑的发现、挖掘，作全景写真，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和未公开的情况和材料。

二十多年来“秦俑热”历久不衰，西安的秦俑博物馆迄今已接待了中外人士四千多万人次，其中包括一百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这些风靡五大洲的秦始皇“地下御林军”是怎样被发现的呢？请看下面这篇文章——

# 秦陵兵马俑 发现经过大写真

● 王兆麟

## 农民抗旱打井 意外挖出“瓦神爷”

就像 1899 年北京古文字学者王懿荣那样，偶然从一剂中药中的“龙骨”，确认为是刻有文字的甲骨，由此引发其后对商都殷墟的考古发掘。25 年前，陕西农民在打井时挖出了“瓦神爷”，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大规模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有三座俑坑，内藏有秦始皇的陪葬品八千多名与真人真马大小相似的陶质兵马俑的浩荡大军。

1974 年初，陕西关中农村发生严重春旱，位于秦始皇陵冢东侧骊山脚下的晏寨公社下河大队西杨生产队，是个缺乏水源的穷村子，生产队决定打一眼机井抗旱。可是井址选在哪里合适呢？队干部们一合计，觉得在村西南那

片满地砂石的柿子园里比较合适，一来这里是个不长庄稼的“死沟”，二来这里地势较高，便于抽水灌溉北边的农田。3 月中旬，西杨村生产队长杨培彦、副队长杨文学领着一些社员来到这里。杨培彦用镢头在脚前划了一个直径等于一个镢头把长的圆圈作井址，杨文学端详一番后说，这井应该对着骊山脚下那个峪口，因为下雨的山水从峪口向下流，地下水必定丰富，他把井址向西移了一下。事后才知道，移动后的井址恰好圈在一号俑坑东南角的边上。

3 月 25 日，生产组长杨全义带领杨志发、杨彦信、杨新满等打井社员来到这里开始打井了。开头几天还算顺利，但挖到第 4 天，他们遇到了坚硬的红烧土，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硬土就是俑坑上部被火烧过的夯土层。

3 月 29 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天刚好是阴历三月三，有庙会，一些参加打井的社员赶庙会去了，在井下挖土的

## 房树民慧眼识珍 文化馆征集收藏

是杨志发和杨彦信(已去世)两人,他们干到下午二时许,已挖下三米多深,杨志发一镢头刨下去,发出了“咚”的响声,两人感到奇怪,再向下挖,露出了碗口大的黑窟窿,他们以为是个瓦罐。杨彦信说,小心点挖,不要碰坏了,可以拿回家放鸡蛋。两人手、镢并用,连扒带刨,把土清理掉,才发现是个没有头的陶制空心身躯,他们感到有些意外。

两人继续向下挖掘,又发现了一截截陶质残腿断臂、一些陶渣片,以及若干生锈的青铜箭头。井上社员把这些运上来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人说这底下是砖瓦窑,有人说是神庙。大家对一个形象怪异的彩色陶质人头感到惊奇,只见他头上长角(实际上是发髻),嘴唇紧团,双目圆睁,远不如佛像那样慈祥温和,於是好些人认定这是个“瓦神爷”。以后继续下挖,又出了一些缺胳膊少腿的“瓦神爷”和许多陶质碎片,但始终没有挖出水来。

对这些残损的“瓦神爷”的出土,社员们各有自己的认识。有的认为打不出水来就是“瓦神爷”在作怪;有的老年妇女却认为打井动土惊扰了地下的“神爷”,就偷偷到井边烧香叩头,祈求“神爷”不要降罪参加打井的亲人。

有个年轻人却不动声色,在井边搜寻了许多青铜箭头和三付铜弩机,悄悄拿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一下子卖了十几元钱,惹得别人眼红,羡慕他脑子活,生财有道。

秦俑得以问世,缘於西杨村的这次打井,后来众多的媒体长期对这几位参加打井的农民作了反复采访报道,他们成了新闻人物。从1995年起,杨志发、杨培彦、杨新满等人分别被秦俑博物馆所在地的友谊商店、旅游纪念品商店、停车场等处请去,为中外游人在他们购买的书籍、画册和纪念品上签名盖章,使这些单位和本人人都增加了经济收益。特别是杨志发更是红火,还曾作为嘉宾应邀到上海电视台和日本德岛县访问,克林顿参观秦俑时还特地接见了他。

其实,第一个认为挖出来的瓦片可能是重要文物的人,是西杨村所在的临潼县宴寨公社一位管水利建设的干部,叫房树民。

当时,房树民了解公社各村抗旱打井情况,听说西杨村打下四五米深还见不到水,这天一早,他便骑车来到西杨村打井工地,问队长杨培彦:“这口井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

杨培彦说:“不像是死线,可不知为啥打出好些瓦人和箭头。”

房树民急忙来到井边仔细察看,捡起几块陶片看了一番又敲打了几下,觉得有些奇怪,於是他下到井底。发现四周粗糙的井壁上嵌着好些陶片、碎砖。他用手一抠,抠出半块砖,去掉泥土仔细一看,不由心中一惊:这砖不是跟县文化馆见到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砖一样吗?原来房树民与县文化馆干部丁耀祖是好朋友,他从丁耀祖那里学到一些文物知识。

他爬上井口,对杨培彦说:“我看这井下好像是秦代的一个遗址。你马上让社员停工,我打电话到县文化馆,让他们派人来看看。”

房树民没顾上吃中饭就赶回乡政府,给文化馆打电话,没打通,就骑自行车去十里外的县文化馆。巧在半路上碰上回家的丁耀祖。丁耀祖听了房树民的介绍,即刻掉头返回文化馆,向副馆长王进成汇报,王又叫上管文物的干部赵康民,三人一起去西杨村,而房树民已经找来西杨村的干部在打井工地上等候了。

他们四人会合后,在工地上仔细察看,又让杨培彦领着去堆放井土处,看到了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文化局的同志十分震惊。1964年4月,文化馆在陵冢附近社员那里征集到一件秦代跽坐陶俑,才65厘米高,他们还从

没见过跟真人一样高大的陶俑。

王进成发话先把这些文物统统收拢集中保管。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到三里村废品收购站，把收购的青铜箭头、铜弩机作价收回。他又带领社员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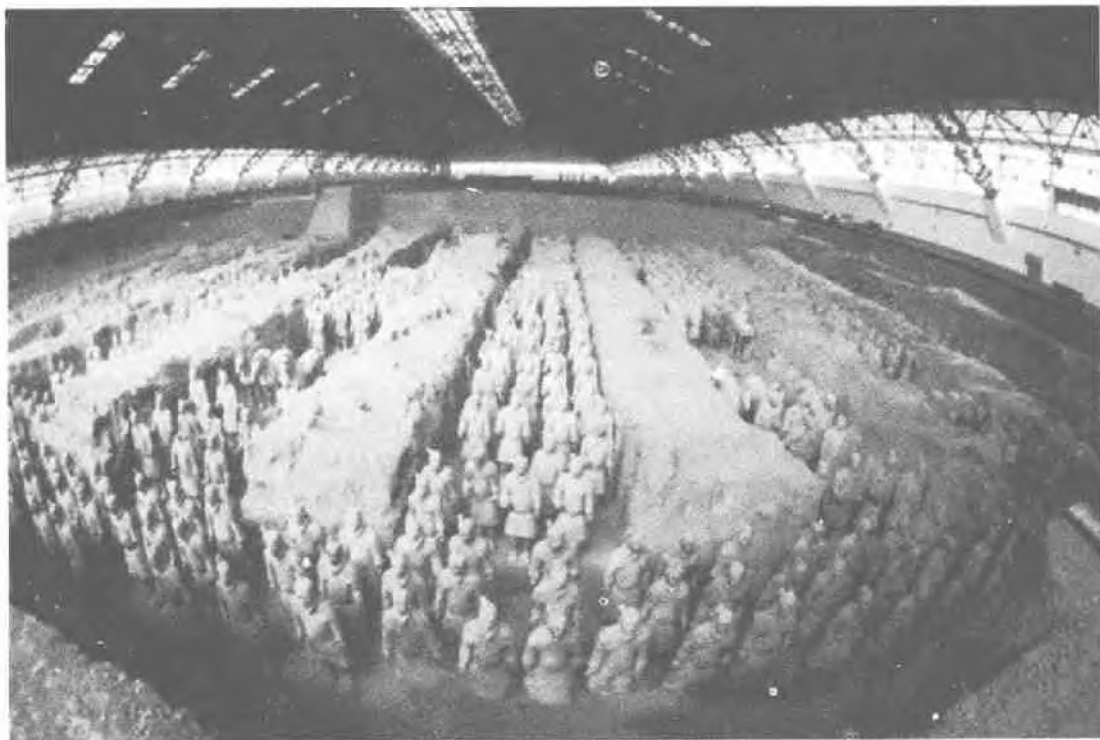
社员们把这些完整和不完整的大小不同的文物共装了满满三架子车，队上打发杨志发带领六名妇女拉车送到十多华里外县文化馆，赵康民给了他们30元奖励。

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作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作些考察发掘，在二十多天里，他组织社员在井的周围掘开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等文物。此后，他每天躲在文物修复室，对这些没头和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残片作了清洗，细心地进行拼对、粘接、修补，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

## 文化馆秘而不宣 蔺安稳探亲遇宝

按照考古工作的常规，像临潼县文化馆这样的重大发现，应该逐级上报，然而他们却对此秘而不宣。

后任县博物馆长的赵康民是这样解释的：赵康民从1963年起在馆内搞文物考古工作，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由于他把两尊北周时期的石佛造像用车从交口镇巷里村拉回馆内收藏，被“四清”工作组当作他是在搞迷信宣传，是“封资修”的典型，让他作检查，并在全县通报批评。“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文化馆门前一对明代石狮子也被造反派贴上“拉倒”、“砸掉”的纸条，并要冲进文物陈列室搞打砸抢，赵康民赶紧写了封条贴在门上，说“这是国家文物，谁砸谁毁谁负责任！”文物保住了，他却成为造反派的眼中钉。王进成和赵康民、丁耀祖反复商讨并请示县委后，才作出暂时不上报的决定。



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展览大厅

正当赵康民躲在僻静的文物修复室里潜心修复陶俑时，这年5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终于使这支地下陶质将士在沉睡两千一百余年后得以及时公诸於众。

他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现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副总编）。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社工作。他这次回临潼探亲，从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一天，他到文物陈列室后面一个光线暗淡的房间去看个究竟，只见几个十分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铠甲，手臂作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不凡。他对史书上关于秦始皇和秦国兴衰的记载十分熟悉，看着这些陶俑，他觉得这是按照两千多年前秦代士兵的形象塑造的，十分罕见。

蔺安稳为何有如此深厚的史学根底和文物鉴别力？说来和他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来自农村，受党培养，在60年代被人视为“根正苗红”的蔺安稳，1965年被新华社送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准备学成后派往国外任驻外记者，但不久“文革”爆发了，当时他血气方刚，看不惯“文革”那一套，写了一张《和陈伯达、戚本禹商榷》的大字报，获“炮打中央文革”的罪状，又因在毛主席著作上写了些学习评注，又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受到批判，并隔离审查，住了“牛棚”。这样倒使蔺安稳有了许多空闲时间，本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他捧起《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孜孜不倦地研读起来，对其中有关家乡的秦始皇陵修建情况及秦始皇的生平事迹更为注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面前的陶俑作出了大胆的判断。

蔺安稳又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踏勘，找打井干部、队员交谈。一些老农告诉他，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说，在他十岁时，他父亲也曾在这里打过井，本来已挖

出了水，但不几天水就没有了，后来再向下打，发现地下有些空隙（秦俑坑是半地下建筑，被焚塌陷后，把俑也压坏了，其间有些空隙），水就流过去了。当时他父亲在井底四壁也发现过像人的残损“怪物”，认为是这些“怪物”在作怪才打不出水，就把它提上来，放在太阳底下曝晒，结果还不见井里出水，一气之下，就用棍子把它们打个粉身碎骨。可见，秦俑的发现由来已久，只是没有被人重视而已。

## 蔺安稳返京商讨 王永安策划“内参”

6月24日，蔺安稳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就来到东单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原原本本地向王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过去所有报章书刊关于秦俑发现的记述中，从未出现过关键人物之一王永安的名字）。

王永安於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当时在评论部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由于工作关系，他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批儒评法”，宣扬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政治新动向十分关注。现在听到蔺安稳说起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认为这是当今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千万不能放过，赶紧写出稿子来，一定会引起中央的重视。

但是王永安考虑了一会又说，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省、中央文物考古部门的认定，一下子见报恐有困难，不如先发《内参》，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再说下一步，以蔺安稳当时的处境，在新华社发《内参》怕难实现，不如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上刊用。署名也不用新华社记者，可用“中国新闻社记者”的名义（文革开始后中国新闻社并入新华社，作为新华社对外部的一部分，叫“中新组”，但对外界，仍用中新社的名义发稿，蔺安

稳就在“中新组”工作)。蔺安穩第二天一下班就关在宿舍里写稿,26日稿件就到达王永安的手中。

王永安看后觉得基本可以,情况、问题大体都说清楚了,不过他考虑到当时“批儒评法”的任何重要的公开或内部报道都得先送姚文元审阅,怎样才能从姚文元那儿顺利过关呢?他想,稿子最好要跟“批儒评法”挂上钩,以便引起姚文元的兴趣和重视,于是他提笔在导语的末了加上这样几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他写毕找到《情况汇编》组编辑马炳泉,把这篇内参的采写经过及作者情况向马作了介绍,马也认为此稿很重要,未作改动就排印出来派人送到姚文元的办公处。

姚文元看后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把第二段的一句话“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第二天就退回报社。马炳泉于6月27日在《情况汇编》第2396期刊发。

## 李先念亲作批示 文物局组织发掘

蔺安穩的这篇关于秦俑发现情况的第一篇文字报道刊发后,引起毛泽东、周恩来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这是“文革”期间继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而且其时代要比前两次发现早得多。与此同时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注意。

在当时批儒评法运动中,“四人帮”吹捧秦始皇是法家,如今在他的陵园里首次发现了陪葬的武士俑,自然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国家文物局于8月初向国务院写了《关于秦始皇陵出土陶俑情况的报告》,《报告》的最后一段说:“这次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对文物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近我们除遵照江青同志关于不能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国务



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彩色骑士牵马俑

院草拟了文件外,今后还准备在工作中经常注意表扬保护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评本位主义、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倾向,把文物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江青对“内参”中说:“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感到很恼火,提出了批评。因此国家文物局起草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文件,国务院于8月8日下发。文件中规定:“任何地方、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能据为己有。凡是重要的考古发现,都要及时上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6月30日,李先念副总理对此内参作了批示,全文如下:

“庆彤同志并冶秋同志:

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

一重点文物。

先念 1974 年 6 月 30 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批示的头一句话“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在迄今已公开引用这个批示的报章书刊中均作删除。而批示抬头所写的吴庆彤的名字也被删掉。所有报章书刊只讲王冶秋，而未提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文物工作的吴庆彤。这个指示全文是王永安得悉中央领导对“内参”作了批示的消息后，於 12 月 6 日下午与蔺安稳一起到国家文物局去看批示，并全文抄录下来的。

7 月 5 日，王冶秋看到了上面转下来的“内参”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一方面他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十分振奋，另一方面又对“内参”中反映的问题感到沉重。同时又奇怪，文物考古方面这么大的事，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於是拿起电话让文物处陈滋德处长到自己办公室来询问，可是陈滋德也全然不知。王冶秋不得不又拿起电话打到陕西省文化局，可是对方竟同样一无所知。后来他又把“内参”再仔细看了一遍，原来是临潼一直没有向上级报告。

由于中央许多领导对此事非常关心，为了争取主动，王冶秋让陈滋德立即赶赴陕西弄清情况，陈滋德第二天乘飞机一到西安，就向省里主管领导和省文化局传达了“内参”的内容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随后在省里同志陪同下，来到临潼县文化馆，看到了几件已修复的武士俑，又在西杨村考察了赵康民扩大发掘的俑坑，坑内更多的陶俑已经显露出来。

陈滋德与省里有关领导商定，立即上报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委托陕西省组织正式发掘，由省、县、公社、生产队四级有关领导组成考古发掘领导小组，考古队由“文革”前华东师大毕业的古代史硕士研究生袁仲一任队长，队员有屈鸿钧、崔汉林、赵康民，以后由于发现俑坑的规模很大，又增派王玉清、程学华、杜葆仁为队员，省文管会领导成员杭德洲到考古队负责协调。

1974 年 7 月 15 日，秦俑考古队进驻工地，

他们对发掘前景并未抱奢望，因为它距秦陵封土太远了，即使它是给秦始皇陪葬的俑坑，按过去考古发掘的经验，也不会有多大，估计十天半个月就可“班师回朝”，所以就在工地上临时搭了个帐篷，支起行军床过夜。在赵康民已开挖的南北长 15 米、东西宽 8 米的坑上向周围开掘，可是半个月挖下来，越挖越多，一直没找到俑坑的边沿。

为了搞清这个俑坑究竟有多大，考古队从 8 月起抽调 4 人，用专用探测工具“洛阳铲”，以间隔 3 米的距离，向周围进行密集的钻探，从地下的提取物来分析判断下面的埋藏。经过约半年的大面积钻探和部分发掘，终於大体弄明白；这是个东西长 230 多米、南北宽 60 多米、总面积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巨型陪葬坑。根据已发掘的陶俑、陶马推算，坑内共约埋藏着 6000 件陶质兵马和许多木质战车及大批实用兵器。

这是陕西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发现。当时陕西省有关部门在组织、领导及发掘、清理、研究诸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和薄弱环节。1974 年 11 月下旬省文化局文物处负责人曾到人民日报作了反映，报社又派王永安於 12 月到考古队和工地现场作了调查了解，回京后写了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大批武士俑的新情况》的“内参”，刊发在 1975 年 1 月 6 日第 2562 期《情况汇编》上，其内容为：一，俑坑是秦始皇的随葬坑，二，从已出土的陶俑的装备、编队、布局及铜剑、铜弩机、铜镞等兵器及没有人殉葬等情况，对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有价值。三，整个陵园还需作进一步研究。四，存在的问题。陕西省领导及有关部门根据“内参”的反映，对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改进和加强。

1975 年 7 月 12 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千余字的消息，首次向全世界公开披露了秦始皇陵发现兵马俑的情况。



## 老师关怀建馆 七九国庆开放

对于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由考古队队长袁仲一於1975年8月执笔，写了一份全面而详尽的报告，送呈陕西省文化局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当时王冶秋局长正在北戴河，他看到这份报告后十分高兴，思考着如何对它进行妥善保护和利用。正好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在这里休养，一天他与聂帅在海滩上不期而遇，就乘机向聂帅汇报了目前秦俑坑发掘的收获。聂帅听后说：“不得了啊！这么大的一个地下军阵，要是能建个博物馆就好了。”

王冶秋赶紧接过话茬：“我早有这个想法，但考虑到目前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没敢提出。”聂帅沉思片刻后说：“你打个报告给国务院，让大家讨论一下嘛。”

王冶秋大喜过望，赶回北京后当即写报告，第二天就找到谷牧、余秋里二位副总理，提交了根据聂帅意见在秦俑坑遗址建立博物馆的报告。二位副总理都表示赞成，他们又把这份报告提交国务院办公厅上正式讨论。这次办公会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经过讨论，作出了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决定，拨款150万元。

8月26日，王冶秋带文物处干部童正洪飞抵西安，会见了陕西省委领导同志章泽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告知国务院的决定，次日王冶秋到发掘工地考察，当天晚上在西安人民大厦召集有关人员研讨建馆问题，要求省里尽快向国务院提交博物馆设计方案。

经过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1976年2月，修建博物馆的遗址保护展览大厅的基建人员陆续进驻工地，5月开始清理现场，在毛主席逝世的9月正式破土动工。由于博物馆规模很大，原拨款远远不敷需要，在谷牧副总理和国

家计委的大力支持下，又陆续追加了数百万元，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为了确保基建过程中文物的安全，考古队暂停发掘，把坑中露头的陶俑、陶马全部重新用土掩埋。考古队分成两支小分队，对其周围进行调查勘探，先于1976年4月23日在俑坑东端北侧约20米处，探出一个新的俑坑。同年5月11日，在俑坑西端北侧25米处，又探出一座俑坑。7月，在俑坑北侧还探出一个未建成而遭弃的俑坑。根据它们发现的先后，分别命名为一、二、三、四号俑坑。前三个俑坑先后进行发掘、修复和建大厅予以保护和展示。

1979年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80高龄的叶剑英元帅来到博物馆基建工地，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来此视察。他先后看了正在兴建的一号坑大厅和正进行试掘的二号坑，以及出土文物陈列室，对身边陪同参观的军队人员说：“秦俑坑是我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这里面有学不完的东西，希望今后我军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看一看。”

叶帅参观结束时，问秦俑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人杨正卿：“你们什么时候开馆？”杨答：“今年国庆节。”“要快！要快！要快噢！”叶帅一连说了三个“快”字。足见叶帅对早日建成博物馆，以保这批稀世罕见的国宝其情之切。

杨正卿深知叶帅对这座古代军事博物馆的感情和企盼，当即请求叶帅为博物馆题写馆名。叶帅说：“我回去后写好寄来吧。”

1979年10月1日，在这个建国30周年的喜庆日子，叶帅题写馆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挂牌，建成开放（在此之前的四五年间，许多海外人士以能到秦俑坑考古工地先睹为快，视为特殊礼遇，先后接待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法国巴黎市长希拉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等贵宾）。从这一天起，这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地下御林军”，在埋藏地下2100多年后，终于正式接受中外人士的检阅和观赏。

（责任编辑 方 徨）

# “盗窃中央档案馆

## 核心机密”案真相

● 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形形色色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董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讎，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

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 this 指示。全文为下：

###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

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辩解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時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署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

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



抗战时期的曾山同志

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他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

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三百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



严佑民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时和夫人合影

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谢这十足的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

提问。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接着×××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又问：“你是造反派？”军代表答：“是的。”×××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的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于是×××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

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的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向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笑容可掬，劝我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

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进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四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冷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作不了主，请示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



作者孙宇亭近影

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谢富治、×××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后代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

机密”冤案的嫌疑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得悉严佑民被从秦城监狱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珏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研究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原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了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该是我。”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痍死狱中……”

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选》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 严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系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 洛松)

# 我随陆定一长征途中做宣传

● 赵发生

1932年，我由共青团寻邬县委干部参军，长征时任总政治部秘书处文书科长。文书科又称文印科，有油印机两架。当时，中央纵队虽然也带了印刷机，但由于战事紧张，在中央苏区开始出版的《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停刊了。唯有我们总政文印科印制的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坚持出版。过湘江时，油印机损失了一架。此后，背在我们身上的那架简陋的油印机以及一些钢板、油墨、毛边纸，便构成了整个长征途中红军唯一的流动印刷所了。

遵义会议后，陆定一同志主编《红星》报。从此，我们朝夕相处。他那机敏、睿智的天性和儒雅风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5月的一天，陆定一同志交给我一份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拟就的《布告》手稿，让我印制。当时，红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准备选择彝民聚居区作为行军路线，但是，由于历代统

治者反动的民族政策，彝汉两个民族交恶日久，疑忌甚深，通过彝民区远非坦途。陆定一起草的布告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的。布告沿用当时通行格式，六字一句，共26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琅琅上口，易记易传，短短156个字（如图表），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

准确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用油印机印布告是要费一番心思的。我用两张蜡纸将布告分上下两半精心刻出，又小心翼翼地拼印在一张相当于现在人民日报一个版面大小的纸上。陆定一同总政的几位部长见印出来



长征途中，陆定一起草、赵发生刻印的布告

的布告字迹优美、醒目，大小也适于张贴，十分满意。几百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发给部队，广为宣传，加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彝族沽基部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实际行动，红军顺利通过了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民区。可贵的是，这一布告不仅是整个红军长征中唯一的布告，而且是这一布告第一次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开始了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

经过艰苦工作，我党首先同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1936年6月中旬，正当我军胜利挺进宁夏之际，蒋军陈诚等部队从东北方向向陕甘根据地后方发动进攻。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东北军也从南面逼近我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的瓦窑堡。党中央、中央军委一面调动部队迟滞蒋军西进，一面同东北军协商，中央机关和平撤离瓦窑堡，使东北军进占瓦窑堡。根据党中央确定的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结合，通过耐心的政治工作，争取东北军成为抗日友军的方针，当时已担任总政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撰写了一副对联：“不打仇人打亲人，错把他乡当故乡”，横批是“山海关”。照他的意图，我爬上梯子，用白粉

将对联写在东北军进入瓦窑堡首先必经的南大门上。这副对联简短明白，蕴意深长，任何一个东北军士兵都由此认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激发东北军士兵抗战的爱国热忱。这一对联是陆定一宣传文稿的又一杰作，多少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

抗日战争开始后，陆定一同志随八路军总部到山西抗日前线，随后我转到财经部门工作。此后四十多年我虽与陆定一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悠悠岁月并没有淹没他对我的记忆。1993年，我的好友冯彩章教授到北京医院请陆定一为他的书作序提到我的名字时，陆定一同志的眼睛一亮，紧紧抓住他的双手，深情地回忆道：“赵发生，我熟悉，红军时期我俩朝夕相处，相知甚深，一晃几十年不见，我很想

念他……长征时红军的那个布告是我写的，赵发生刻印的。他写一笔好字，给布告增色不少。告诉他把布告找来，你给我俩照张像，留给后人纪念……”1995年10月，我到医院看望了他，也照了像。遗憾的是，匆忙中我忘记带那张布告，未能了结他的心愿。

陆定一同志是我们党内的老前辈，我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陆定一同志在上海读过大学，以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工作几年，是个吃过不少“洋面包”的人，但他深受王明等人的打击，憎恶他们的作风。从上述陆定一同志起草的红军布告、对联可以看出，他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上最早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之一。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来函照登

《炎黄春秋》四月号中的错讹之处，值得注意。例如，《章太炎“七被追捕”考略》文中，把章著《旭书》误为《旭书》，是不应该的。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收有所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文，皆曾提到《旭书》，并有注，似可参看。而作者把“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句中的“天雄”注为“唐方镇名”，更不应该。作者大概是查了《辞海》的。但《辞海》同时要求参看“魏博”条，才能明其义。因此至少要注成“唐代方镇名”才好。不过即使这样注了，仍是错的。下面还有“大黄”二字。作者注“大黄”为药名，当然不错。但“大黄”这一味猛药和唐代方镇“天雄”有什么关系呢？莫非“大黄”是“天雄”的特产吗？当然不是。“天雄”其实也是一味药，被认为“药之凶毒也”，自然也是猛药。这才能和“大黄”相提并论。

王景山



# “牛棚”里的 抗争



● 刘衡

方成配图

反右前的刘衡和她的儿子

## 我投奔“牛棚”

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

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社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

2. 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孩子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

可以避免这种灾难。

3. 来农场前几天，宿舍院子里的家属要我每天晚上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一站就是半小时。虽经多次抗议，也没有用，我想来农场可以不受这种体罚。

我听说农场设了“牛棚”（又名监改队），已经关进了三十多名“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现行反革命”……，我要求进去，到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去。

“牛棚”领导芦××问我：“进‘牛棚’的都是敌我矛盾，大家都怕进‘牛棚’，你为什么自己报名进来？”芦××是个精干的小伙子，他监督我们劳动的时候，常常跟着我们一起干，不像有的人站在旁边动口不动手，光是吆喝、训斥。他问我的时候，尽量板着脸，憋着笑，装出认真严肃的样儿。我回答：“我不进

‘牛棚’，就已经是敌我矛盾了，进了‘牛棚’，有人管，便于解决这个敌我矛盾。”

## 读书不是读颜色

在“牛棚”，我们排着队，早请罪、晚请罪，还要高举红宝书，高喊：“毛主席万岁！”别人举的都是有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唯有我一人举的是没有红色塑料封皮的白色的书。我一点没有发觉这有什么不好，举了几天，竟然被一位“牛棚”里的难友发现了“新大陆”，找到立功赎罪的机会，就向领导打了小报告：“万红丛中一点白，刘衡一个人太特别了，对毛主席太不忠了！”于是，芦××责备我，为什么不举红宝书？我只好向他解释：

“文化大革命”前，报社发给我

一本平装的《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开始，报社不给我发任何学习材料，也不让我在印刷厂车间购买学习材料，我只有这一本白皮平装的。我说：“我没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学习《毛主席语录》，是学习它的内容，不是学习它的颜色。”芦××不再责备我，只是劝我以后有机会，再买一本精装的，为了“一致”、“好看”。

## 驾轻就熟写检查

在“牛棚”里，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看见大家吭哧吭哧地写，又要写心里的话，又要琢磨怎样才能让革命群众满意，写得十分困难、费劲。但我的检查写得十分快捷、顺利。

《我把错误简单说一遍》：有个问题，同志们问过千百遍：“在敌我斗争中，你站在哪一边？”我的检查已经写过千百篇。现在，再把我的错误简单说一遍，我站在结论不是敌人的斗争对象那一边。为什么站在那一边？是因为：我看见组织把同志当作敌人斗争好多天，以后又向他赔礼、道歉。我以为这是工作中的偏差、缺点。我不知道斗争就是审查。以为斗了自己人，伤了他的感情、体面。我没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不知道毛主席要革命接班人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我的详细检查，已经写了一篇又一篇。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这次检查，用的是电报式的语言。

《我不愿耍滑头》：我的三条所谓罪状，已写了十多个年头。有人一直在喊不够、不够、太不够！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我的检查仔细瞅过。虽然如此，我也不愿耍滑头。我只是老老实实诚恳恳提出请求：不要空

口说不够，请给我一点具体的帮助，只要你说什么地方不够，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问题藏在哪篇检查里头。

《我变成祥林嫂》：我的三条所谓罪状，我已写了十多年检查，早就讲不出新的话。我怕别人说我态度不好，只好变成祥林嫂：“我真傻！我以为是斗真的敌人，不晓得斗争是在审查。等我明白这一点，我已付出很大的代价！”

《年年在唱“小放牛”》：年年在唱“小放牛”，唱来唱去没个头。问君能有几多愁？好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生活不应老兜圆圈》：“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早就十分肯定。我的话斩钉截铁，我的脚站得稳稳的，我不会有丝毫动摇，不会改变我的声音。同志们尽可放心，不要把我问个不停。生活应该前进，不应老兜圆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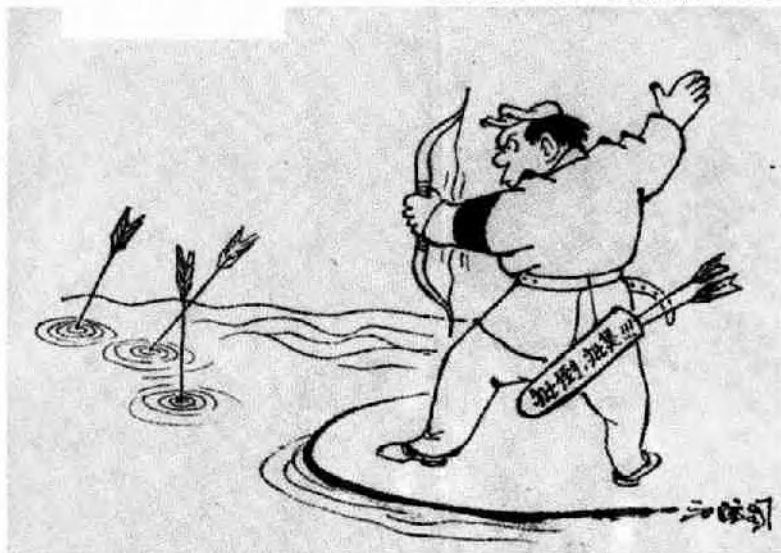
## 有的放矢

有个时期，“牛棚”领导让我们

读毛主席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据说这是全国所有“牛棚”的通读教材。为什么要我们读这两篇文章呢？我琢磨了好久。

这两篇文章都是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写的，当时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敌人正处在山穷水尽的地步。毛主席就向杜聿明等讲明利害，劝他们停止抵抗，早日投降，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表面看来，我目前的处境和杜聿明等有些相象。例如：革命群众几次斗争我，监改队不让我参加集训班学习，要我全天劳动，每顿饭只许吃咸菜、窝窝头，似乎已处在山穷水尽，群众包围之中。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敌人，也没有什么不愿交代的罪行，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决不是我有罪不肯说，而是我不知道我的罪行在哪里。

我写了一个思想汇报，《无的放矢斗一通》：“对什么人唱什么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对敌人的政策攻心战，怎么适合于对我？越斗越好笑，越斗越叫人恼火，无的放矢斗一通，怎么一点不考虑效果？”但又一



无的放矢斗一通

想，这两篇文章虽然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可它是对我们整个监改队说的，别人不见得都没问题。为了使我们的学习遵守毛主席的“有的放矢”教导，我就自作聪明，把其中几段作了一些修改。

对《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我是这样改的（括号内的是原文）：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监改队人员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文化大革命中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革命群众就要大进军、大批判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我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无论我们老实交代也好，不老实交代也好，（人民解放军）革命群众总是要（前进）进行大批判的，（……）老实交代了，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不老实交代，不会有好的结果。老实不老实，是对自己有利无利的事情。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并没有人强迫我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我们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我们自己的自由。（……）或者是老实交代，或者

是顽抗到底，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我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革命群众就要大进军、大批判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对《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我的修改是：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工贼、大内奸、大叛徒刘少奇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只有老实交代，向人民靠拢，（……）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顽抗，就顽抗吧。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到了晚上，监改办公室同志和革命群众把我带进帐篷，斗争我，说我篡改了毛主席著作，就是反革命。我申辩我改毛主席的话，把南京政府改成监改队，意思就更明确了。我说，如果不是针对监改队，何必无的放矢，要我们学这两篇文章呢？听了我的申辩，监改室的同志们激怒了，他们踢打我，要我弯腰、请罪。

## 我被“活埋”

在这次批判我篡改毛主席著作的斗争中，他们还玩了一个“活埋”我的把戏，但被我识破了。

当我拒绝弯腰、请罪时，人民日报国际部干部申××和印刷厂一位工人还有记者协会的一位同志把我叫进帐篷，捆我，要用手帕塞进我的嘴。我死死咬住牙，才没有被塞进去，但嘴巴流血了。他们手里拿着锹，在后面一股劲推着我往野地里跑，使我造成要被处死的错觉。我感到这事是经过监改队批准的，不是

个别人的胡作非为，倒不怎么害怕，我在这方面有过经验：凡是通过组织批准的行动不会危及性命。例如在报社时的几次游楼，虽然小将们推着我走，但同时还要保护我，抵挡来自人群的拳打脚踢，他们比我还累，甚至还要代我挨打挨踢。这次，他们推着推着，我的一只棉鞋跑掉了，我大喊：“棉鞋掉了！棉鞋掉了！”记者协会的那位同志赶忙回头帮我捡起来，等我穿上鞋后，又接着推着我跑。我心里更有底了：“如果真的要处死我，还会管我脚上有鞋没鞋吗？”

跑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他们逼我承认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然就要活埋我。说着，就用锹在地上挖土。挖一下，问一声。我瞧着他们装腔作势的表演，不作一声。他们挖了几下，下不了台。就说：“你在纸上写，你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将来永不翻案，写假的也行。”我说：“你们要我写假的，我可以写，但要写明白，这是你们在逼我说假话。”我又说：“你们这种做法叫做逼供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反对过的”。申××很小就参加儿童团，是年轻的老干部，听了我的话，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但又不肯在我面前认输，更不愿费力气继续挖坑，就说：“算了算了，把她捆在树上，让野兽把她吃掉。”捆完后，三人赶忙离开，往干校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说：“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一声不吭，知道他们会转回来。果然，不一会，他们回来了，一边解我身上的绳子，一边说：“走走走，把她送公安局去！”绳子被解开后，我便往去干校相反的方向走。他们大叫：“回来回来，你往哪里走？”我说：“你不是说送公安局吗？我很愿意去！”他们当然不让我去，我跟着大家回到

监改队,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我精疲力尽,只想倒床就睡,但值班的芦××硬要我写篡改毛主席著作的检查。我心里十分清楚,他以为我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一定会神经错乱,会把内心不可告人的秘密泄露出来。实际上,我心如明镜,心地磊落,嘴里讲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现在写的就是我以前讲的。芦××还不死心,要我写了一次又一次,一共写了三次。我十分清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找出我前后交代中的破绽,来发现我心底的秘密。我因说的是真话,在疲劳中颠来倒去,次序虽然有所不同,但内容始终一样。他这才“开恩”,让我睡了。第二天清早,我仍照常出工。

从此,申××对我比较友好,不再踢打、责骂我了。

## 该骂的就要骂

我的一些“棚友”比我聪明,有“政治”经验、“革命”世故。他们对待领导、小将们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明知不对,不说为佳。免得惹是生非,引火烧身,少受许多无妄之灾。



又是打来又是吼 不爱文斗爱武斗

我对这些是不满的,但孤掌难鸣,无可奈何,为此给监改队写了一个自我解嘲的汇报:

《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只要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党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如果党要我做匕首,我就闪闪发光,猛然一击,刺进敌人的胸膛。如果党要我做试金石,我就默默不响,躲在墙角,收敛起一切光芒。现在党要我做一只杀鸡吓猴的鸡,我也是十分愿意,因为猴子被吓住,鸡并没有死。

对待监改队的某些做法,我也不断提出抗议,我写:

《我的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天早晚,我们要在毛主席像前低头念两遍。坦白从宽,我坦白;坦白从严,我也坦白。我的坦白,经得起考验。芦××责问:“怎么坦白会从严?你这是歪曲政策!”我说:“事情就是这样,只要我一说真话,我就要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这不是坦白从严吗?”我还写了:

《一个欺骗》:“站出来,请罪!”一转眼,我被推到毛主席像前。我有什么罪?我请什么罪?谁也讲不出

来。讲不出来也要站半天。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让没罪的人请罪,是不是对毛主席的一个欺骗?

《毛主席会不会难受?》:又是打来又是吼,不爱文斗爱武斗。游楼、用刑又“活埋”,罚吃咸菜窝窝头。不听毛主席教导的不请罪,跟毛主席走的在弯腰低头。毛主席的相片如果有知,会不会感到难受?

芦××看了这些汇报,气得满面通红,踢了我一脚:“不许你用毛主席来压我们!”我毫不介意,相信他迟早会有明白的一天。果然,发生了下面一件事:

每天早晚,我们排着队向毛主席请罪时,都要说一句:“某某(本人姓名)向毛主席请罪”,大家说得十分响亮、清晰,有的还带着哭腔,以示悔悟之情。唯有我,仅在喉咙里咕噜一下,谁也听不清我说的什么。喊口令的芦××离得远,没有发现。站在我旁边的“棚友”向他告了密,说我打马虎眼,从来不向毛主席请罪。芦××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说:“我无罪可请,我不能欺骗他老人家。”我反问他:“你是不是要我欺骗毛主席?”他笑了:“随你的便。”

监改队的最高领导刘××也笑着对我说:“刘衡,你老写材料骂我们……”我问:“你们该不该骂?可我一直文斗啊!”他光笑不做声。

虽然如此,我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不久,“牛棚”撤销,我仍然作为顽固右派转到五七干校接受群众专政。我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外一个“战场”,准备迎接新的抗争。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现已离休)

(责任编辑 林 耀)



# 科学家严济慈 的青少年时代

● 张 沪

严济慈(1901-1996),是中国现代物理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成果,曾为世界科技领域广泛应用。这里介绍的是他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的故事。

## 崭露头角

严济慈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横店下湖严村的一个清贫的耕读世家。他的父母生育了五个儿女。严济慈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与二姐同年出生,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因父亲严树培是长子,祖母急于抱孙,便把刚出生的二姐给人当童养媳,母亲接着又怀孕,光绪二十六年腊月初四(1901年1月23日),严济慈出生了。严济慈从小聪慧、稳重、寡言,极受长辈疼爱。母亲在他会说话的时候就教他认字,还把着手教他用手指沾水在小板凳上写字,或用树枝在沙地上划字。他不像一般孩子那样贪玩,学会写字后常常自己练习,所以他七岁入私塾时已会读会写了。

东阳县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最偏僻的小村也设有启蒙馆,即私塾。下湖严村严氏祠堂除设立蒙馆外还设有程度稍高的经馆。蒙馆

塾师是严济慈的叔公严惟纶。私塾授课不分年级,教学法是填鸭式,主要是让蒙童背诵。开始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然后是四书五经、四史、千家诗、唐诗等。严济慈读书极为专心,不少孩子读几年也不懂书中的含意,而严济慈边读边思索。两三年内他基本读完诗书经史,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的刻苦勤奋,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能融会贯通,打下坚实的古汉语基础,后来他在紧张的科研工作中除了写科研论文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和他从小扎实的语文功底有很大关系。

在严济慈七岁那年由祖母主持分家。按当地规矩祖产不能分光,要留下一部分,其余按户均分。严树培这一支有六口人,只分得两亩多地和一间住房,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全家六口人一年的口粮。据严济慈回忆,当年那间住房里铺下两张床后,就放不下其他家具,每天吃的是两稀一干,而且都是糙米杂粮。

为了维持一家的温饱,父亲严树培只得从事长途贩运。他到杭州向卖火腿的店铺预支钱款,替店里到金华、东阳一带收购火腿,或到外地收苜蓿籽运到东阳贩卖,又到诸暨贩棉纱,到杭州贩煤油,通过这些买卖,赚些薄利,本钱不

足，有时还要借高利贷。严树培除了搞些贩运外，还在祖传的中药铺惠元堂里为人看病，但病人多半是赊账，要到年底才收得到现钱。

常去省城的父亲接触到许多新事物，思想比较开通。一天，父亲从杭州回家，送给严济慈一本书。严济慈翻开一看：那是一本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笔算数学》，书里如天书一般满是他从未见过的符号——阿拉伯数码。私塾里不教数学，亲友之中也无人看得懂这本书。但是天赋与数理有缘的严济慈经过反复阅读、琢磨，竟然在一二年中看懂了这本“天书”，当时他只有七岁。后来他回忆说：“我从未学过数学，也找不到教师教，就自己一道一道反复演算，弄懂每个定理，硬是把这本书弄通了。从此对数学有了浓厚的兴趣。”

《笔算数学》是一把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掌握了这把钥匙，他触类旁通地用于实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父亲行医的惠元堂到了年底十分忙碌，许多人来还账，许多欠账要去索回。父亲和仅有的一个徒弟顾了里顾不了外，就让严济慈帮着结账。试了几次见他算得又快又准，就放心把账目全交给他。那时这位账房先生刚满九岁。管账关系到全年的收入，来不得半点差错。这一工作使严济慈从小养成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作风，这对他以后钻研学问进行科研有很大帮助。

1909年，东阳县70所私塾合并成立时化小学。其中包括严氏宗祠的私塾。这时家里经济更困难，父亲决定五个子女中只培植严济慈一人。九岁的严济慈转入时化小学后，十分珍惜求学的机会，学得更加刻苦。小学课程增加了算术、常识等等，未学过这些课目的孩子都觉得太难了，而严济慈因自学过算术，学起来毫不费力，屡屡考第一。

虽然是家中唯一上学的孩子，严济慈在姊妹兄弟面前毫不骄傲，尤其体谅父母的艰难。这位小账房先生比别人更清楚家里入不敷出的窘况，他除了努力读书学习之外，一有空就帮助家里干活，减轻父母的负担。晚上做完功课帮助母

亲做织布用的纱锭；白天课余又帮着拔草、耕地、砍柴、割稻；暑假时还给邻家放牛，增加家里一点收入。严济慈因经常劳动被太阳晒得黧黑，可是身体也锻炼得非常结实健壮。

1912年（民国元年），严济慈转入离家30里路的东阳县城宏道小学高小插班。这是一所本地乡绅办的学校，设有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宏道小学在高小二年级就设了英文课程，当时，这在全县算是超前的。

严济慈从未离家这么远，那时他只有12岁。好在从小他就学会照顾自己，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起初他借宿在一个姓卢的亲友家。每天清晨天不亮，他就起床读书，这时卢家全家人还在酣睡。他怕吵醒别人，便找个无人的角落轻轻诵读。有一次被卢家婶婶发现，以为他一大早起来是练唱歌呢。他悄悄地对这位婶婶说：“阿婶，我是在读英文呢！”惹得阿婶都笑了。

后来，父亲为他办了住校手续。为了省钱，严济慈没有在学校包饭，而是每个星期日回家带上一星期的粮食干菜，自己起伙做饭。学校比卢家大得多，有许多僻静的处所供他读早书，不必担心吵醒他人，严济慈起得更早了。他那时常用来自勉的一首诗，至今家乡还有人记得：

三更灯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立志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头方悔读书迟。

严济慈正是抱着这样的志气，从他的少年时代就勤奋苦读，最终攀上了科学高峰。

## 慕光苦读

1913年冬，宏道等几个小学又合并为东阳县立第一小学，严济慈以全校第一名毕业。

民国初年刚改新学制，高等小学不多，毕业生更少。严济慈得第一名以后，同期毕业的学生亲友纷纷前来祝贺，同学们更是聚会欢庆，吟诗

作赋互相酬答。不少毕业生不再升学，有的准备当初小教员或去机关、军队任文书，有些家境优裕些的就打算在地方上当乡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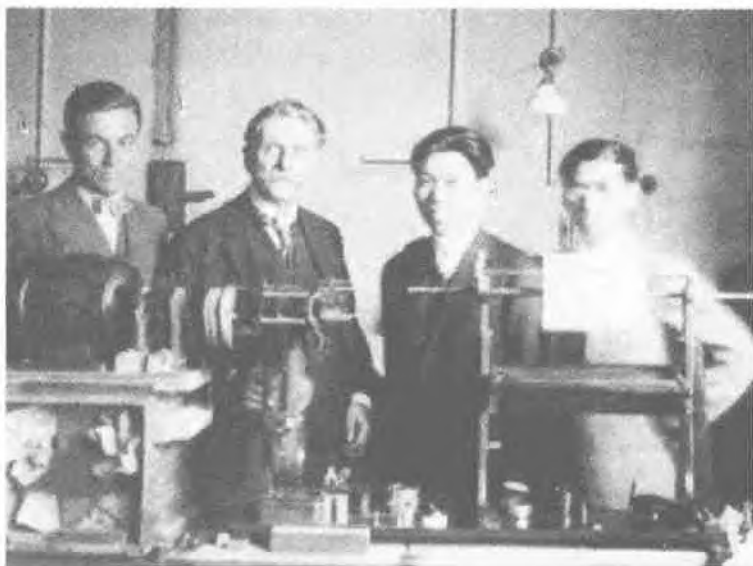
成绩优秀的严济慈作何打算呢？他正在烦恼之中。因为这时家里遇到不幸，父亲被歹人坑害，欠了一大笔债，实在拿不出钱供严济慈继续读书了。可是这么优秀的高材生，若不报考中学真是太可惜了，同学们纷纷鼓励严济慈去考东阳中学，有的还去劝他的父亲。众口铄金，父亲只得同意让严济慈去试试，他对儿子说：“考得上读中学，考不上回来种田！”没想到这句话成了严济慈的动力。

1914年2月的一天，村里消息灵通的人拥到严家报喜：“严府济慈高取东阳县立中学第一名！”

原来当时还按前清的旧习行事。科举时代考入县学为生员（秀才），第一名称案首；考入省试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考入殿试为进士，第一名称状元。民国虽废了科举制，但村人仍认为县立中学相当县学，13岁的孩子即考上“案首”这在小小的严村算是件大事。

严济慈的父母却喜忧参半。家里正借着利滚利的高利贷，哪里有钱供一个中学生呢？严济慈虽是“案首”，到底还是个孩子，听到父亲不打算让他读中学不禁哭了。父母见了也心疼，他们心里也明白，这样的孩子不培植他实在可惜了。想了又想，算了又算，咬紧牙关决定节省再节省，省下钱来供严济慈上学。

开学的那天，通往东阳中学的大道上熙熙攘攘。有钱的人家雇挑夫替子弟挑行李，雇不起人的也有父兄陪送。父亲准备歇业一天送儿子去学校报到，严济慈却说：“不必了，歇一天就会少一天的收入。”他坚持自己挑行李去。这担行李比别人沉重，因为除了被褥书籍外，他还带了



1927年，严济慈（右二）与导师法布里（右三）在法国巴黎大学实验室

粮食干菜，准备还像读小学时那样自己做饭，省下些伙食费。

东阳县立中学只有一位校长和十多位教师，一百多名学生分成四个班，每班30至40人。中学课程比小学多，增加了史地理化等等。严济慈的视野更开阔，学习的劲头也更足了。

每天清晨天刚亮，县中操场的井边就出现一个学生在悄悄地读书，那就是严济慈；晚上熄灯以后，有个学生还在悄悄地用功，那也一定是严济慈。

他没有钱买灯油蜡烛，就收集别人丢掉的蜡烛头来用。有时连蜡烛头都找不到，就划一根火柴照着看上几个字，背诵熟了，再划一根……就这样严济慈居然背出了一本英汉小词典。学外语的人都知道，在掌握了语法规律后，最重要的是扩大词汇量。严济慈用这个方法记住词典里的生字，大大提高了他的英文阅读能力。本来他在小学学过两年英文，成绩已超过其他同学，现在更是突出，引起了英文教师傅东华的注意。

傅东华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军警追捕，在北京无法存身，回到家乡东阳避风头。东阳中学正缺英文教师，便聘他任

教。傅东华的教学法和一般人不同，着重开拓学生思路，培养学生的运用创作能力。他不用教科书而是用原文版的《泰西五十轶事》、《莎士比亚故事集》等书做课本，同时介绍各种英文书刊给学生阅读。

这位认真负责的教师发现成绩优秀的严济慈，非常欢喜，尤其是了解到严济慈家境清贫又如此用功也十分同情。当时商务印书馆为了鼓励青年学英文，出版有《英文月刊》、《英语周刊》等杂志，并举办征文竞赛，得奖者可以免费订阅这些刊物。傅东华常常介绍严济慈参加比赛，严济慈几乎每次都得奖。这对于清寒的严济慈说来真好比雪中送炭，既能扩大知识面，又不致于加重父母的负担。傅东华为严济慈取字为“慕光”，勉励他像古时凿壁借光读书的匡衡；囊萤读书的车胤；映雪苦读的孙康，学习他们不畏贫穷发奋读书终于有成的精神。没有辜负师长的期望，慕光这个名字预兆了严济慈的未来。后来他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成就，完成了居里兄弟都未完成的研究课题，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为全世界物理学家应用，真正成为“科学之光”，符合了“慕光”的含意。

除了英文，数学是严济慈的强项以外，他尤其擅长破解刁钻古怪的难题，对他来说解析这些难题像在做智力游戏。越是难解的题一旦解出，那种胜利的喜悦无法比拟。每解开一道难题，他的数学知识面就更拓宽一些，解题的速度就提高一步。他做完老师指定的习题后，便向老师未讲的新课习题进攻。做完了教科书上的习题，又到处搜罗难题怪题来做。同学们都知道：严慕光最喜欢的礼物不是吃喝穿戴，而是新奇的数学题。久而久之，连老师解不开的难题，到严济慈手里也能迎刃而解。

1916年，有位一年级的数学教师有事请假，一时找不到代课教师，若换其他课程，又会影响数学课进度，校长正在着急。三年级的数学教师听说后就找到校长，对他说：“不要为难，我这里有个现成的代课教师！”

当上课铃响过，教务主任陪着走进课堂的

代课教师竟是三年级的学生严济慈。有些学生心里不服气，因为民国初年学校学生年龄参差不齐，部分一年级学生比严济慈大，就不服气地怀疑他能教好课，但是一堂课下来，人人心服口服。严济慈不但讲得条理清楚，而且结合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学生一听就懂。那一年，这位“中学代课教师”才16岁。

中学四年，严济慈年年考第一名，个子也长高了，师长都勉励其他学生向他学习。但是这位全校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却是全校穿得最破旧的一个。刚考取东阳中学时，母亲要给他做一件新长衫，被他拒绝了。他说：“妈，用不着的。学校发给一年级新生每人一件青布长衫，我再带一套土布短装就够了。”可是青布长衫是校服，每天必须穿，他没有自做长衫可以替换，只能穿脏了晚上洗，晾干了白天穿。四年来，这件青布长衫破了补，补了又破。

从学校回到家，严济慈和小时候一样，什么活都干。暑假他下田、车水、耘地……样样农活在行。寒假就为惠元堂结账。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帮母亲做纱锭、接纱头。

一年夏天大旱，田土都龟裂了。严济慈起早贪黑地为家里二亩多地车水。这一天，为贪黑夜凉快，干到后半夜才回家。母亲见儿子又饿又累，心疼地唤他：“朱银（严济慈的乳名），水缸的钵头里冰着剩粥，你去盛一碗吃了。”这时小弟弟醒了，听见唤哥哥吃粥，嚷着也要吃。严济慈一想，剩粥是准备第二天全家吃早饭的，盛了两碗，早饭就不够了。就说：“妈，我不饿！”只喝了两口冷茶便去睡了。

严济慈少年时代吃苦耐劳、克己让人的事极多。凡是他的亲友都知他不是只知读书的白面书生，而是农田劳动，粗茶淡饭，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能吃。正因为如此，也给了严济慈一个健壮耐劳的好身体。身体好使他在学校里能比别人学得更多的知识，家境清寒使他更珍惜学习机会，更主动钻研，经济物质条件差使他早早学会适应环境，生活自理……这些都是他后来在做科学研究工作时得以夜以继日地攻克难



关,取得成果,耄耋之年依然思路清晰,健康长寿的基础。

严济慈晚年常说:“我身体好,和我从小生活 在农村,参加农田劳动有很大关系。”

## 连中三元

四年苦读换来丰硕的收获。

1917年底,东阳县立中学欢送第三届毕业生。第一名是严济慈。

师长、同学纷纷向他祝贺。严济慈却喜在脸上愁在心里。他正在考虑毕业后是工作还是投考大学呢?这是每个中学毕业生都面临的问题。同学们议论:严慕光无论投考哪个大学会百发百中,没问题!严济慈自己心里也明白,要论自己的程度,当然没问题,可是父亲供自己上了四年中学,已是艰难之至,还能供自己上大学吗?不说别的,单是上省城杭州考大学,就要一笔路费、食宿费,这谈何容易,家里拿得出这笔钱吗?父亲能答应吗?难!难!难!

果然,严济慈回到下湖严村,父亲十分欢喜,说是可松了口气。在那个年月,培养一个中学毕业不是件易事,单是筹措学费书费,父亲这几年就老了不少。他想现在儿子终于毕业,可以工作挣钱,帮这个穷家一把了。

遵照父亲的安排,严济慈一边下田劳作,一边在附近的私塾学校教书。等待找个更合适的工作。可是他心里实在不甘心就此度过一生。他见不少成绩不如他的同学在商议如何复习,如何去杭州报考大学,他心动了,悄悄对母亲吐露了心声。母亲是疼爱儿子的,她不忍心看儿子愁得夜夜睡不着,答应“想想法子。”

母亲手里无钱,能想出什么法子呢?还是要跟父亲商量。父亲一听跳了起来:“上大学?家里借的债还没还清呢!”母子俩碰了一鼻子灰,商量又商量,决定先偷着去考一次试试。

1918年夏,严济慈瞒着父亲,悄悄请人替他在私塾里代课,拿着向姨母家借来的盘缠,告别母亲,赶到东阳城里的卢家,卢家和他们是家

世交,严济慈上小学时曾寄宿卢家,他家的长子卢辉玉与严济慈在小学时便同班,又同考入东阳中学,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好友。

严济慈刚走进堂屋,就听见有人说:“好,人都到齐了。”抬头一看,果然约好同去的十一个同学都到了,只差他一个人。大家告诉他;已经决定明天一早坐轿赶到离东阳约百里的牌头过夜,第二天再赶一天路到诸暨乘船上杭州赴考。并告诉他轿钱早已付清。大家知道严济慈家清贫,他们就用抽签的方法来确定谁付双份,抽中的恰巧是跟严济慈最好的卢辉玉代严济慈付轿钱。

严济慈听了却摇摇头,不疾不徐地用他一贯的稳重态度,慢慢地说:“谢谢大家的好意,我不能坐轿!”听了他的话,堂屋里热闹起来,有的问他为什么?有的劝他。严济慈等大家说得差不多时,掰着手指说了三点理由:

“第一、我从小练出走长路的本领,一天走七十八里路不在乎,不必坐!

“第二、继续读书,势必加重父母的负担,内心已感不安,不能再增加父母的额外开支。何况我可以走路,不能坐!

“第三、既然不需要坐,怎能让同学花钱?不该坐!”

三点理由说得大家无言以对,堂屋里一下安静下来。这时门忽然打开,有人一脚跨进屋里来。严济慈一见,立刻惶恐地站起来,是父亲!他想肯定是父亲发现儿子不见了,忠厚诚实的母亲说了实话,他便连夜赶来要把儿子带回去。严济慈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我家塘小养不了大鱼,还是消了报考大学的念头,安心在私塾教书,等着找个合适的事做吧……”心里一慌,他的脸都发白了。

谁知父亲进门后开口就同意严济慈上杭州报考,还拿出钱来付轿费。原来父亲赶到卢家后站在门外,听见大家的劝说和儿子讲的那三点理由,感动得他的眼眶都湿了。心想多么好的孩子!确实是条“大鱼”,窝在乡里实在耽误了他,再困难也应该培植他上大学!



1988年，严济慈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后，在颁奖仪式上讲话

严济慈听了父亲的话出乎意料之外，呆了半晌，接过还留有父亲体温的钱，心知这是父亲千算万算省下来的血汗钱，怎能用来坐轿呢？他更不肯了。劝说的人中又增加了一个父亲，但他们还是没能说服严济慈。最后，当天晚上退掉了一顶轿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一行青年学子上路。父亲送他们到大路边，目送穿着草鞋背着包袱的儿子健步走在十一顶白篷竹轿前，向牌头走去。

在牌头住一夜。第二天严济慈又是步行，其余人坐轿到诸暨的一个渡口。大家坐上船板沿钱塘江抵达杭州。

到了杭州，有钱的同学图方便在考场附近住旅馆，唯有严济慈找到凤凰山下一个东阳县籍的木匠家里寄宿，讲好一个月食宿五块钱，因为从考试到发榜需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当时全国国立大学不多，只有北京大学和南京、北京、沈阳、武昌、成都、广州六所高等师范。浙江省的考场在杭州，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考

题，共考数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七门。严济慈细看了各校的章程，发现高等师范不需交学费，还供食宿，便报考了离家较近的南京高等师范。

在等待发榜期间，考生们有的去听戏，有的游西湖，而严济慈每天跑到清波街的商务印书馆看书。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张招贴，上写：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省合办的河海工程学校招预科和本科生，考场在杭州第一师范。这所学校学费也是公费，但食宿自理。他觉得反正闲着没事，就去报考试试。

揭榜那天，有人欢喜有人愁，没考上的学生垂头丧气收拾行李回家。严济慈却两个榜上都有名：南京高等师范的榜上严济慈雄踞第一；河海工程学校他考上本科生。

消息传到东阳，全县为之轰动。东阳县立中学出了严济慈这样优秀的学生，引起浙江省教育厅对东阳中学教学质量的重视，破例拨出一笔经费给东阳中学，以资奖励。

消息传到下湖严村，人们的兴奋喜悦心情，更是超过四年前严济慈考取东阳中学那一次。叔公严惟纶尤其高兴，这个优秀的青年当年是他亲自启蒙的，又是他的亲侄孙。老人来到严树培家贺喜时，正好听见父子俩为去南京报到的路费犯愁。老人慷慨地说：“不要愁了，去南京的路费我出！”

严惟纶回家卖了祖留的几亩地，同窗好友又捐助了一些，严济慈才得以如期到南京高等师范报到。

由于统考时是各省教育厅出题，南京高等师范考虑各地考生程度不齐，又举行了一次复试。严济慈不负父老乡亲的期望，复试时仍名列第一。

东阳县立中学高材生严济慈“连中三元”的佳话，至今仍在东阳县被人们广泛流传着。

（摘自河北省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严济慈传》）

（责任编辑 方 隼）

# 陈郁带领我们 反“把头”

● 杨长春 冯振禄 江罗维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遣26万军队到东北地区抢夺胜利果实。中共中央对东北十分重视，派了20名中央委员，两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开赴东北，其中就有中央委员陈郁同志。

陈郁同志是广东省宝安县人，1901年生于贫苦海员工人家里，当过汽车修理工，以后长期在轮船上当海员工人，参加过1922年苏兆征同志领导的香港罢工，1925年省港大罢工，于当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司法委员。1930年经六届三中全会选为党中央委员，次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至1933年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因为反对王明，被王明、康生诬蔑为“右派”，停止了党的组织关系，下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当了六年工人。直到1940年2月，才跟随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他从不向人诉苦，对个人往日的坎坷经历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很多同志都只知道他是位革命老前辈，却不知道他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

1946年的东北，战争仍在进行，物资严重

短缺。东北局号召全党把领导生产作为群众运动的中心工作之一。1947年2月，东北局调原在合江省担任地委书记的陈郁同志到东北生产委员会任副主任。当时，工矿企业和交通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电厂发不出电，工厂开不了工，火车和电厂烧豆饼和木头样子，城市人民做饭、取暖用的燃料也很困难。陈郁同志认为关键是缺乏燃料，有了煤炭，工厂与交通就活了，全局也就活了。于是就决定首先抓鸡西和鹤岗两大煤炭基地，迅速恢复生产。

陈郁同志于1947年3月到达鸡西矿区，他在鸡西蹲点时，亲自领导我们同鸡西煤矿职工同甘共苦一起战斗。在1947年他虽只46岁，因德高望重，大家都亲切敬重地尊称他陈老。

伪满时期，鸡西煤矿在东北是仅次于抚顺、阜新的大煤炭基地之一。煤矿职工超过1.4万人。滴道矿曾有14个坑口出煤，年产原煤七八十万吨，还有选煤厂、焦子窑和自备电厂。滴道矿在日寇逃跑时遭到有计划的大破坏，矿厂全部停产，加上“中央军”和土匪侵扰，职工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李立三同志于1946年11月

曾到滴道矿视察，将一个冒充苏联红军代表的白俄商人乌洛维赤赶走，让工人保护矿山，等待人民政府接收。地方土改工作团滴道工作队发动职工群众，初步进行了反奸清算斗争。1946年5月成立矿工农总会，矿工陈子章任会长，同年10月建立起党支部，鲁流义为支书。1947年2月，东北工矿处接收了滴道矿，唐楠屏任矿长。

在刚接收后的一段时期里，主要力量是抓恢复生产、安定职工生活，还未能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加之东北战场上敌我胜负大局未定，“中央军”和土匪侵扰，日伪的残渣余孽和反动会道门造谣破坏，人心很不安定。

陈郁同志了解情况后，做出一项重大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把头斗争，进行民主改革，使广大职工在政治上翻身，成为矿山的主人，加快恢复生产的步伐。

来滴道的同志分别到焦子窑、暖泉、河北几个井区，与工人同住同吃同劳动，到职工家中、井下和工地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同职工谈心交朋友，进行阶级教育，讲解放战争形势，启发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的积极性。

东北煤矿工人大都是因受地主压迫剥削而破产的穷苦农民和走投无路的城市贫民。他们都是被把头诬骗或日寇抓劳工来的，一进煤矿，就成了奴隶，完全丧失了一切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人宰割。日寇在煤矿这座最底层的人间地狱里，实行的是最野蛮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

伪满煤矿的把头，远非平常厂矿里的工头“拿摩温”可比。这些人是投靠日本鬼子的汉奸，其中有很多人原来就是土匪、恶霸、流氓头子，他们用贿赂或其他手段求得日本鬼子赏识当上了把头后，就与伪警察、宪兵、特务、密探、勾结在一起，掌握着对矿工及其妻儿老小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对矿工除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外，还掌管着矿工和家属的口粮和衣物等各种“配给品”的分配权。他们层层扒皮，给你多少就算多少，工人谁敢问一声，就会惹下灾祸。他们只管催班，强迫工人天天下井，哪管你是死是活，有些工人生病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到“万

人坑”或塞进“炼人炉”。他们看工人中谁稍不顺眼，就随意安上一个什么“反满抗日”、“私通八路”、“要逃跑”等等罪名，捆吊起来，用镐把打死。或者被押送到“矫正辅导院”、“宪兵队”，进去以后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矿工成年累月在黑暗阴湿的矿井里，“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在日本鬼子，监工头的榔头、棍子和胶皮鞭子的抽打下，在恶毒的辱骂声中，象牲畜一样地劳动，见不到阳光，吸不到新鲜空气，毫无安全保障，随时都可能在水、火、瓦斯、冒顶等灾难中丧生。干完一天活，精疲力尽地爬上井来，吃着橡子面窝窝头，还不能填饱肚子。一年四季穿麻袋片，在四面透风、肮脏污秽、蝇虱臭虫众多的破工房里挨日月。他们看不见前途，只能混日子等死。

陈郁同志根据东北局指示的精神，指出人民政府接收敌伪矿山后，要千方百计把无吃无穿无住的煤矿工人及其家属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要依靠工人阶级来管理矿山，决不能让把头当干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展开反把头斗争，肃清敌伪残余势力，让矿工自己解放自己，做矿山的主人。对罪大的汉奸把头和敌伪分子，根据政府批准予以惩处。要改革日本鬼子压迫工人的管理机构，彻底废除把头制度，否则，工人就不能真正翻身作主，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恢复和发展生产也就没有可靠的基础。

我们和工人积极分子，分头深入群众，通过个别谈，开诉苦会，把长期埋在广大职工和家属心中的仇恨烈火燃烧起来。那时前线军队每打一次胜仗，职工就掀起一次生产高潮。职工和家属纷纷起来揭发和抓捕民愤大的汉奸把头和伪警宪特，有些工人自己凑路费，三俩人一伙，把逃跑以及混进我们部队当了军官的把头和伪警宪特抓回来批斗，对罪大恶极的人，报经人民政府批准，给予惩处。

经过这场斗争，矿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往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煤黑子”，抬起了头，直起了腰；正直的职员、技术人员也吐出了霉气，心情舒畅，都成了企业的主

人。

滴道煤矿民主选举了矿工高敦水与翟凤亭二人为副矿长,选举工人积极分子担任区长、坑长和生产班、组长。矿和坑口建立生产管理委员会。

我们根据抗日时期在延安兵工厂展开赵占魁运动的经验,于1947年7月在滴道矿发起立功竞赛,矿井每月超产百分之十记一小功,连续三个月记一大功;每三个月出满勤记一小功。河北区矿井经过七八两个月立功试点,由日产300吨提高到500吨,接着连职工家属也发动起来投入立功运动。

日寇统治下的鸡西煤矿,生产方式非常落后,根本没有什么采掘机械,井下靠手工作业。日本投降时,又进行了严重破坏。解放后恢复生产时,连镐头、铁锹也不够用。采煤完全用手镐刨;遇到岩石巷道,掘进就更困难,手把钢钎子一锤一锤地打眼,用炮引子,冒险明火放炮,在这样困难条件下,要加快恢复生产,多出煤炭支援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广大职工高度的劳动热情,许多人还义务献工。1948年鸡西全矿区职工出勤率达到95%,全员效率由伪满时期最高的1944年每工0.3吨提高到0.56吨。全矿区煤炭产量从1946年的15.6万吨,增长到1947年的108万吨,1948年的236万吨。一列列火车,满载着鸡西矿区的煤炭和职工的深情厚意,给前线将士和解放区人民送去温暖和光明,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和生产建设。

伪满时期煤矿的工资制度不合理,科室人员比直接生产人员工资高,井上人员比井下人员工资高。解放后进行了初步改革,对采煤、掘进、支柱等工种,能计件或包工的改为计件或包工;井下工比井上工的工资高25%,采掘工更高一些。到1947年秋,职工的生活有了改善,井下的采掘设备与安全用具初步改良,保证了安全生产。

陈老有坚强的党性,自己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不讲条件。他从不炫耀突出自己,也厌恶和反对别人宣扬他。无论身处逆境或工作环

境恶劣,生活困难,他从不消极,从无怨言。他是一个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高级领导干部(建国后定为行政四级),但没有首长的架子和官僚的派头,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也反对别人为他安排特殊待遇。同志们同他一道工作,心中总感到一股热乎乎的力量。

陈老同广大群众、干部有深厚的革命感情,总喜欢和大家一起去作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的苦辣酸甜。他平易近人,亲切相待,遇事总要事先与有关同志商量。对不同意见总是虚心讨论,很少声色俱厉强加于人,同志们有话都愿意同他讲。他常去井下、车间和职工宿舍,了解群众的要求,发现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千方百计设法去解决,使职工衣食住行能有基本保证。

陈老从革命事业出发,很重视职工教育,舍得花大力提高职工的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他经常讲:广大群众和干部有了文化,提高了政治和业务水平,才能真正当家作主。1947年3月,陈郁同志到鸡西,5月就在恒山办起东北工矿处工人学校,身兼名誉校长,袁溥之任校长,矿山负责人都兼职上课,陈老也用自己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先后办了十期,共培训学员1397名,其中党员355人,职员82人。此外还为鹤岗、蛟河矿务局及附近铁路、电业部培训了一批职工,其中不少成了矿业的行家,如曾任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的于洪恩同志,就是当时工人学校的学员。

陈老于1948年在哈尔滨开办了东北工业部干部学校,1949年在沈阳开办了东北工人学校。新中国建立,他担任燃料工业部部长,马上办起了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和中国煤炭工业第一所最高学府——中国矿业学院(现为中国矿业大学),随后又办起电力学院、石油学院和一批中等专业学校。此外,大力支持全国煤矿工会办起了秦皇岛、本溪、泰安等正规制的煤矿工人速成中学,为大批青年矿工进一步深造准备文化基础,其中不少人考上了大学。

(责任编辑 吴 思)

# 温济泽临终给自己定位：

## “我是一个好党员”

● 方实



温济泽遗照

1999年4月16日晚7点多，我正在看新闻联播，于光远同志突然来电话，问我知道不知道温济泽同志去世了。他说，听说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去世的，但他还没有核实。我立刻给温济泽的夫人钱家楣打电话，果然，老温已经不在世了。两三个星期前，我听说他因为肺炎住院治疗，还说要去医院看望他。家楣同志说，因怕患者再感染，医生不允许现在去探视。我说，什么时候让看了，告诉我一声。没想到转眼之间天人永隔，竟与老温永别了。家楣同志告诉我，一直到去世前的七八个小时，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15日下午四五点钟，他让家楣给青年出版社编辑吴晓梅打电话，说他刚交出去的回忆录还有两处要修改，请吴晓梅来作个交代。电话打通了，但吴晓梅不在，他竟匆匆于16日凌晨离开了人世，以致修改回忆录的心愿也未能实现。

失去老友的沉痛，随着我对往事的回忆，愈来愈烈。我急于把对他的怀念写出来，以遥祭亡

灵，对我也是一种解脱。

我与济泽同志的交往始于半个世纪之前。1939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43年“抢救运动”时，我以“叛徒、特务”的罪名，被关在保安处隔离审查。1946年2月平反之后分配到新华社做编辑。温济泽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主编。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同在延安城东北角的清凉山上。这两个单位的社长是一个人——秦邦宪。两个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一共不过一百多人，所以很快彼此就相识了。但真正称得上熟悉，还是1947年3月以后的事。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并入新华社，温济泽任新华社口播部主任。口播部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新华社从延安撤退时，我们一起从陕北向太行山转移，每天一起行军，有时睡在一个土炕上。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除了通过铁路线外，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解放区。所以一路上都很轻松，大家说说笑笑。我和温济泽同志很说得来，到达目的地太行区的涉县西戌村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神态和风采，他的诚挚热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仍然显现在我的眼前，而半个多世纪已经逝去了。

1949年1月底，解放战争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文化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了。三月下旬，新华社跟随党中央一起进驻北平。这次我和温济泽同志仍然是一起走的。这次行军与从延安撤退那次不同，我们是乘大汽车走的，今非昔比，只用了两天便到达目的地北平。到北平不久，口

语广播和新华社分开，另外成立了广播事业局，温济泽被任命为副局长。

1982年我从新华社离休。一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温济泽同志突然来电话，他说，根据李维汉同志的提议，中央决定撰写一套正规的、权威性的《革命烈士传》。当时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委托他主持这项工作。《革命烈士传》先撰写新民主主义时期（1921年到1949年）的烈士，完成之后，再编撰新民主主义时期之前和全国解放以后的。胡乔木说，撰写《革命烈士传》要少花钱、多办事，编写出一套高水平的烈士传丛书。编这套书，一不给经费，二不给编制，三不给办公室，一切要温济泽同志自己想办法。老温在这样“苛刻”条件下，白手起家，只好找他熟悉的同志来帮助。他首先找到我和解放军出版社社长黄涛同志。我们商量后分头从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炮兵司令部等六七十个单位，动员了五六十位离休老同志发挥余热，参加这项工作。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到外地采访。材料搜集到后，按人头和时间顺序分别撰写。老温是这部丛书编委会的主编，他负责抓全面工作：提出编辑方针，决定编写计划，审阅重点稿件，有些重点人物的传记，还是他亲自撰写的。这套丛书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全国各省市党史办公室和众多党史工作者的积极协助，经过长达七八年的时间，终于在1992年全部出齐。全书共分十卷，约二百五十万字，撰写了烈士传略794篇，共1058人（其中包括若干篇集体传略）。中央领导同志对这部书很重视，邓小平为这部丛书题词，陈云题写书名，李先念写序，江泽民题字。老温为这部丛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是他离休后为中国革命历史和教育后代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在《革命烈士传》编撰期间，仍然由温济泽主编，黄涛和我协助，出版了一个大型的传记刊物——《中华英烈》。这样一个专门宣传英雄和烈士事迹的杂志，在全国上万种报刊中，可谓独此一家。这份刊物发行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小学校的欢迎。可惜的是，刊物出版仅仅



温济泽同志

四年，就因找不到挂靠的主办单位而夭折，济泽同志对此感到十分痛惜。

在《革命烈士传》即将编撰完成之际，1991年7月，我协助杜导正同志参加了创办《炎黄春秋》的工作。为了把这个刊物办好，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态度，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我们聘请了国内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和老同志做特邀编委，帮助我们出主意、把好关。温济泽同志是这个刊物第一批特邀编委之一。他非常热心地支持办好这个刊物，经常提示办好这个刊物的编辑方针，帮我们组稿、约稿，更为重要的是积极为刊物写稿。八年来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十六篇之多，平均每年写两篇，而且所写文章，多是具有高水平、有独到见解的力作。他是这个刊物的第一个高产作者。

温济泽写的文章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不是史学家，但他尊崇史德，写文章时，严守实事求是原则，言必有据，引必有注。如他写王实味事件的经过，就写他与王实味的交往，写王实味在延安中央研究院被批判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何拉着他的手痛哭，最后他又如何遵照李维汉同志的嘱托，积极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奔走。写胡乔木，就写胡乔木如何帮助为他平

反,使他成为全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分子,后来他们之间又如何产生了意见的分歧,以至温济泽竟说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温济泽写的文章很像他本人说话,娓娓道来,不温不火,诚恳得让你感动。

最近几年,老温因患脑血栓,腿脚不便,但仍然坚持参加我们的特邀编委例会。他是坐着轮椅让人推着参加会的。老温在每次特邀编委会议上都一定积极发言。他的讲话像他的文章一样内容精湛,有独到见解,而态度又恳切温和。古人曾形容一些修养极好的人,说在他们面前,听他们讲话,“如沐春风”,我在他面前就有这种感觉。他也对我们刊物在编辑工作上的缺点提出批评,但他批评的方式如同春风化雨。

在去年秋季《炎黄春秋》的特邀编委会上,有同志谈到编辑部改文章有时下手太狠的问题。温济泽说:“当编辑修改文章,我是吃过苦头的。我在延安改过徐老(徐特立)的文章。后来徐老打个电话,约我到他家去谈谈。徐老是很客气的,问我,你改我的文章,怎么不跟我商量呀?我说我随手就改了,很对不起。今天我再把这个几十年前的故事讲一遍,目的是希望我们的编辑记取我的教训,就是要十分注意尊重作者……”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温济泽可算历尽坎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三次被捕,坐牢五年,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无条件释放出狱。全国解放后,到了1957年,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右派平反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又成了“污染源”。后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老温又成了自由

化的一位代表。

到底该怎样评价温济泽呢?该怎样给他定位呢?他的夫人钱家楣告诉我,在他去世前一天,他再次说到自己的一生。他说,回忆录写完了,了却了一大心愿。我给自己的结论是:“我是一个好党员。”

我同意他给自己做的结论。当然,他不是完人,他也会犯错误,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左’过,也右过,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认识了,认真改正就是了。”这里,在老温一生的历史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他对党、对人民、对理想的忠诚。他可以犯错误,但是只要认识到了,一定改正,今后努力不再重犯,绝不会为谋取个人利益而明知故犯。这使我想起了张闻天。当年温济泽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的时候,张闻天是研究院的院长,老温说,张闻天也可以说是我的恩师。张闻天也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但是他很正派。“左”过一次,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就能牢记终生,力求不再重犯,哪怕得罪最高权威,哪怕“永世不得翻身”,也不肯昧心地附和错误。温济泽就是努力以张闻天同志为榜样的正派人,是一个大大的老实人。我以为,一个人有什么头衔并不要紧,有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他就足以自称是好党员。有这样的党员的党,应该可以称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温济泽同志一生笔耕不辍,著作极丰,临终前还有很雄伟的心愿。他说,我病好出院后,还计划写两本书,一本书的题目是《鲁迅与瞿秋白》,一本是《我所熟悉的文化名人》。可惜的是,他的心愿未能实现就匆匆地走了,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温济泽同志离开我们了,我为自己失去了这样一位好朋友、好知己而伤心。我们杂志为失去这样一位好作者、好编委而难过。我们为的党失去这样一个诚实正派的好党员而痛心。我为失去济泽同志一哭……

(作者原为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  
新华社高级编辑)



温济泽与造访青年在一起



#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 苏双碧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

## 遇罗克母亲的一封信

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狱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没有想到这几句话又引出一桩公案。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走进我的家门。在问准我的姓名之后，她说：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说着，声泪俱下，话音呜咽。她叫王秋林，是遇罗克的母亲。我一下被问住了，和《海瑞罢官》案有关而被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况且，遇罗克能不能平反具体应由公安局来做。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申张正义，替受害者鸣冤，

并努力去促成这个冤案的平反。于是，我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我记得很清楚，她听到我的话之后，她经受委屈、迫害到已经有点木然的眼神，突然闪出一缕微微的光芒。看来，她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希望我能替她儿子申冤。信的内容很简单，记得是写了如下几点：

1. 她儿子遇罗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因为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谬论，即被当成反革命抓走。

2. 遇罗克写过《出身论》是为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的，绝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3. 她儿子被杀是冤案，要求为她儿子平反，还他儿子和受株连的家人一个清白。

信不长，只有三四百字，但字迹清秀工整。后来才知道，王秋林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曾经当选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1957年反右派时因替一个“右派”辩护，被划成右派。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原在水电部任工程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化，遇罗克兄妹都成了“右派”的子女。

我送走王秋林老太太之后，重读她留下的这封短信，心情沉重，竟然翻滚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后，并经领导批准，以记者身分携带《光明日报》介绍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下午四点钟，我



被拒于大学门外的遇罗克

来到了保存遇罗克的全部档案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一个存放“文革”中案件材料的办公室，办公桌和地上都铺满厚厚的一层灰尘，看起来已经好久无人接触这些材料了。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材料说：“这些都是有关遇罗克的档案，够你看的。”说着，他帮我搬到一台乒乓球桌旁边，一共24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

面对着这么多材料，我有点发怵，这么多材料，从何入手？同时，我又感到这么多材料足以揭开遇罗克案子的秘密了，我倒显得有点兴奋了，赶在五点下班前，我草草地翻开了一些审讯记录、死者的日记、诗词、口供，以及侦破计划，最后的判决书等等。我认定这是个冤案，材料很典型，必须下工夫弄它个水落石出。第二天，我约请我的同事张义德、赵少平二位，又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从此三人看了整整两天材料，才把材料看完，并对《出身论》以及遇罗克其他文章、日记、诗词、审讯记录作了一些必要的摘录。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遇罗克是被错杀的冤案，便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说明派记者研究了全部档案材料，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遇罗克是怎样被错杀的呢？

## 《出身论》触犯了 “无产阶级司令部”

遇罗克的《出身论》大约写于1966年冬季，“文革”初期曾经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个论调曾经支配着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遇罗克为反对这种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在《中学文革报》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可知遇罗克《出身论》是为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种错误理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而这种错误理论却是来源于“左”的思潮在用人制度上的唯成分论。“文革”初期，全国青年何止千百万人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从心灵到肉体遭到摧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便无法安定。遇罗克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的愿望来写《出身论》的。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的回忆，《出身论》最早是由遇罗文在广州印刷的，并带回一部分到北京，随后在北京解放军报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报纸出来后，一抢而空，在青年中产生巨大的反响。加上传抄、复印，《出身论》流传非常广泛。每天都有大量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北京，寄到遇罗克手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一伙，此时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一篇文章吓呆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于1967年4月13日点名批判了《出身论》，诬陷《出身论》是反动的。从此，遇罗克的行动就不自由了，出门时经常有人盯梢。而且这种监视、盯梢越来越严重。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把遇罗克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但盯梢并没有放松，而是把对遇罗克迫害的重点又转到《出身论》上来，并把一个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

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欲把遇罗克致于死地而后快。到1967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四人帮”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加紧步伐。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经过一段磨练，他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心情非常沉重地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年代，他已意识到，凭他所坚持的真理是无法抗衡这股恶势力的，他预感到：“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但他认为就社会历史进程来说，他不相信历史就会这样写下去，他信中说：“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上面两封信是他被捕之前不久给朋友写的，说明他对当时的处境和形势已有充分认识和思想准备了。

当然，遇罗克的判断是对的，这时“四人帮”一伙，已经磨刀霍霍，正在制订逮捕和加害遇罗克的计划。1977年10月20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新型的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的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纲。可按毛主

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可见，对遇罗克迫害，一开始就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重视，被上层所重视。对遇罗克定罪的调子，是在逮捕遇罗克前就定好的。这样，材料编写时可以上纲，可以捕风捉影，不管搜集到什么材料，都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从这个“指示”看，“四人帮”一伙，确实对《出身论》怕得要命，一位善良的青年只不过写了一篇有见解的《出身论》，就被他们当成一个大案来抓。

在这之前，10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另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示：1. 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2. 批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可见，当时对遇罗克所注意的仍然是《出身论》，至于如何处理遇罗克，“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作出决定，并不是由遇罗克本身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因为写《出身论》就铸成了他的“罪过”，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了。

12月30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了“同意”两个字。就这样，遇罗克被逮捕入狱。

## 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遇罗克起而迎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和诬蔑。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了》，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把它作为反面文章刊出。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遇罗克似乎很早就预感到，他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一帮人，大多进行尖锐的批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批驳姚文元，他除在报上写文章公开批判姚文元外，在日记中对姚文元在理论上的错

误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1966年1月2日，他写了一篇《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姚文元“认为历史上无清官”的“机械主义观点”。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尽管《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当成“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他认为他是“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他为自己敢“全盘否定姚文元”感到自豪。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焚’，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而在5月13日的日记则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这篇日记充满着对姚文元的蔑视，也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任意愚弄群众的极度不满。

遇罗克被捕后，日记落到‘四人帮’一伙手中。“四人帮”的审讯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当时就是要宣布《海瑞罢官》死刑，姚文元是革命左派，你不仅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攻击姚文元。”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在“文革”初期中另一个风云人物陈伯达，遇罗克对他也大不以为然。他读了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此书“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当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难哉！”打着批判



遇罗克的母亲王秋林(中)和孩子们

资产阶级的旗号，宣扬封建主义，在当时盛极一时，陈伯达的言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林彪断章取义的语录本，同样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行为。由于现代迷信盛行，社会上对领袖人物无原则的颂扬，成了风气，所以，遇罗克认为陈伯达的错误是“最起码的”，比起有些人来，也不过如此。

遇罗克这段话，本来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在被捕以后，这也成了一条大罪状。当预审员要他交代这个“罪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攻击过陈伯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断然拒绝这种指控，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时，遇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从这些答话，可以看出遇罗克是敢作敢当的，他并不回避事实。而对那些

无中生有的陷害，诸如什么遇罗克要仿效张良行凶等等罪名，遇罗克痛斥“四人帮”爪牙：“这是什么时代，怎么不实事求是呢？”

遇罗克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他对当时扭曲了的文化现实，指出：“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对当时的文化流弊，他痛苦地写道：“哲学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当他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颇有感慨地写道：“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其原因是“重事不重情”，这是“当今艺术之流弊”。而对当时报上号召对毛主席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他反对这样提法，认为这是“把真理当成宗教”。

综观遇罗克当时对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的某些言论的批评，以及当时他对经济、文化现状的一些批评，都是理智的、有远见的，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并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多次拒绝“四人帮”一伙的无端指责。

## 为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 主义献出短暂的一生

1970年3月4日，遇罗克在这一天被“四人帮”一伙杀害，成了因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殉难者。遇罗克究竟犯了什么罪，非杀不可？笔者从遇罗克的有关材料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觉得他的“罪行”都是上纲上上去的，全部记录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善于思考无罪可言的青年，竟成了“四人帮”的刀下鬼。那么，“四人帮”是以什么给遇罗克定罪呢？留在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

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1970年3月5日”。

从这个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通篇都是大帽子，是上纲上线的言词，并没有半点能构成犯罪的具体内容。至于气焰嚣张，态度的好坏本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遇罗克的确不愧为一位坚持真理的战士。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给遇罗克罗织罪名的。

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准逮捕遇罗克。1月5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来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果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是第一次审讯，遇罗克心地坦然，并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随后从1月9日到1月16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他被跟踪、盯梢，处境危险时，他因为在日记中记了许多人和事，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怕拖累别人，就都烧掉了。他只留下一本，托他妹妹遇罗锦保管。遇罗锦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曾东移西藏过，总感到不安全。最后转移到中山公园的公厕里，不幸，却被清洁工人发现了，最终落到审讯人员的手里。因为日记中确实攻击过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员，成了他们对遇罗克定罪的绝好证据，所以穷追不舍。遇罗克当然也明白日记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作了说明：“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

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遇罗克的争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以“反动日记”当作杀害遇罗克的罪状之一。接着审讯人员穷追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对此，遇罗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当审讯人员强加于罪时，遇罗克愤怒地指出：“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这本来是光明磊落的保证，但“四人帮”一伙既要置遇罗克于死地，黑白可以颠倒，有无也可以更替。“四人帮”一伙气急败坏地说：“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已经是定论。”

“四人帮”一伙对遇罗克一案，既不实事求是，也从来不听取遇罗克的任何申诉。他们指责遇罗克说过“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指中日邦交）”这样的话，并因此破口大骂遇罗克：“是反动，是卖国贼，叛徒！”遇罗克拒绝对他的诬蔑，说“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连影子也没有”。“四人帮”一伙竟然凶相毕露地叫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遇罗克说：“我不承认，你们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其实，事实不事实“四人帮”一伙已无所谓，不是事实也照样可以定“罪”。他们声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既然遇罗克的“罪行”是用“思想”看穿的，也就不需要为一条材料是否事实进行争辩了。

至于判决书中说的“扬言进行暗杀活动”，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致，不足以为证。遇罗克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遇罗克确实没有估计到，就凭几条“莫须有”的材料，就会把他杀了。这是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凶残估计不足。后来他听到审讯人员骂

遇罗克(左一)与同学在野外



他是“死反革命”时，他才意识到“四人帮”一伙已对他露出“杀机”。当即给“四人帮”一伙写了一封信，要求“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死反革命’。”这种最坦诚、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

当遇罗克预感到“四人帮”一伙就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哲学著作没有读完；在写作计划中，长篇《工资论》，还有待于修改；与朋友探讨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且，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还在横行……他只有把未竟的事业，寄托于朋友，寄托于未来。至于个人，死何足惜。他喜欢历史，历史上的无数先烈就是用头颅和热血开拓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从容不迫，他潇洒自如，写下了临终的诗篇。他在《纪行》一诗中写到：“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充分反映出他是抱着为真理献身的激昂心情，而在《赠友人》一诗中则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持重我头轻”的不朽的诗句，坚信未竟的事业会有“众英”来完成，他所思虑的是社会、是祖国，至于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概。

(责任编辑 洛松)

# 中国第一位 石油地质学博士潘钟祥

## ● 安作相

### 我国陆相生油理论倡导者

潘钟祥教授逝世十多年了。他曾任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大学石油地质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他在石油地质理论上巨大贡献。已故的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在中国石油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曾讲过：“在我国过去是运用海相生油和传统构造理论指导找油工作的。如果在石油地质理论上唯海相生油还占统治地位，没有人提出陆相沉积生油的观点，我们的石油工业决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在这个开幕会上，我们悼念潘钟祥同志，他就是我国陆相生油的倡导者。”

潘钟祥是河南汲县人，生于1906年，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0年就在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上发表论文，题为《油田之地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他和中国石油地质理论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他的声音，而且往往是超前的。

潘钟祥大学毕业后，被设在北平（今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聘任。当年秋即奉命去陕北调查石油地质，此后每年都去，直到1934年。这位身材中等、性格内向、不善词令的年轻学者，在野外调查能吃苦，观察细致；在室内研究联系

广泛，有创新精神。他根据自己发现并采集的延长古植物群，纠正了本世纪初美国学者关于陕北的地层划分方案，确定原陕西系上部时代为晚三叠世，应用至今，以此确立了他是一位古植物学家的地位。在石油地质方面，他在产油的延长组、永坪组之下，晚三叠世地层中，发现了一套黑色页岩，其中有鱼鳞等陆相化石，称张家滩页岩。他在1933年写的论文《陕北油田地质》中，已经指出：“延长组及永坪组含油层，按地层上言之，均在此页岩之上，所以此页岩亦许与石油之生成，有密切关系。”并且提出该层是假定的生油层。此外，由他测定的201号井位钻探，获日产3吨的产量，是当时最高产量，从而发现了永坪油田。在产油层系中，发现了四层油页岩。正是由于对祖国石油事业的爱，尽管陕北油井产量不高，而在潘钟祥心目中分量很重。

1935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到南京，潘钟祥随行。此后，他多次奉命去四川进行石油地质和煤田地质调查。他注意到，蓬莱镇油田的石油“确来自下白垩纪”，而这里产油层至今仍认为是陆相的。这个观点刊于《四川石油简报》（1936）。此外，他在重庆南的石油沟构造拟定的井位，经钻探产出了天然气（产于三叠系），发现了该气田。

1940年，由于潘钟祥在石油地质学显示的天赋才华，政府公派他赴美留学，专攻石油地质学。他到堪萨斯大学才几个月，就翻遍了图书馆的

关于生油问题的文献，在众多的论文中几乎都是海相生油。忽然在《AAPG》(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志)1938年8月号上，看到了一篇科罗拉多州泡德尔瓦什(Powder Wash)油田的报导，文中描述该油田的石油来自非海相沉积。这一信息更加坚定了他关于陆相生油的认识。

当时堪萨斯大学有周末学术讲座，无论对讲者还是听者都比较自由，讲者只需出个告示，听者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听。那天下午，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第一次登台亮相就出语惊人。他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石油都是来自海相地层，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所有的石油必然是海相成因的。他们一般不相信石油可以从淡水沉积物中形成……”接着他以泡德尔瓦什油田开头，重点用陕北延长油田、永坪油田和四川石油地质资料，详细地论证了陆相沉积可以生油的观点。他明确指出：“陕西系的油，看来不可能从海相地层中运动移来，说明这些油是陕西系内部生成的，它们是陆相(河流和湖泊)成因的。一场学术讲座下来，不仅引起听众极大兴趣，热烈参加讨论；而且也使他的导师兰德斯(K. K. Landes)教授对他刮目相看。在美国见新不怪的国风中，潘钟祥向海相生油论提出挑战的新观点，并未被视为异端，反而受到鼓励。

这篇被后人认为是论述陆相生油学说的始作，并非是灵机一动的作品，它凝聚着潘钟祥多年石油地质调查的积累，也凝聚了他对祖国石油事业无穷的爱。1946年，潘钟祥成为中国第一位石油地质学博士，学成回国了。可是国内却是战云密布，毫无和平建国的迹象。他的所学只好暂搁在一边，而投身于高等教育界。

新中国成立了，石油地质调查勘探大规模展开，身在高教界的潘钟祥，一方面全力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另一方面，克服重重困难，继续陆相生油的研究，写成《中国西北部的陆相生油问题》(1959年)。他指出：“过去一般认为陆相不能生油是一种偏见，毫无理论根据。……陆相不仅能生油，而且是大量的。”直到大庆油田的发现，人们才完全信服了陆相生油学说，使这一学

说有了重要的发展。

在我国石油实现自给以后，在国内开展了批判“中国贫油论”，同时称颂陆相生油学说，也注意到这位首倡者潘钟祥。但是，他没有适应当时传媒口味来“包装”自己，由此失去了一次机会。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件憾事，可是具有科学家实事求是品格的他，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美德。直到80年代，笔者再次聆听这篇著名论文诞生过程时，他仍然和当初一样，没有任何修饰。

## 古稀之年的潘钟祥 又提出了“二次生油”理论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科学上有创造的年龄在30岁左右。言外之意是说，过了那个年龄段在科学上就无所作为了。细想起来，可能有些道理，但对潘钟祥是不适用的。

那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造反派强加在潘钟祥头上的“罪行”自动消失，五七干校撤销了，他规规矩矩从干校沿长江西上，到学校外迁新址宜昌报到，向工宣队请示去向。当时工宣队负责人看到一位衣着破旧、面色黝黑、口齿木讷、行动迟缓的老者坐在自己的面前时，心里产生的第一印象是：“老朽、无用”。他爽快地答复潘钟祥：“回北京，待退休。”就这样成全了我们的理论大师，使他有时间重新遨游在石油地质理论的海洋里，又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年初冬，潘钟祥回到久别的北京地质学院，回到老妻的身边。尽管房子被迫换小了，因为人口少还能凑合住。老妻把“文革”抄家剩下的图书杂志堆放在朝北一间9平米的斗室里。他有“逆境不馁”的品质，过了不久情绪稳定下来，衰弱身体也得到恢复，好像投入土地怀抱后的安泰那样，又一次获得了力量，要披挂上阵了。因为他看到，他所热爱的石油产业，苦苦地支撑着频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他想应该发挥自



己的作用，为战斗在生产战线的科技工作者提供理论支持。

这时他凭借的是，除这间斗室和一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借书证以外，就是自己睿智的大脑和热爱石油地质的心。几年里，这位等待退休的老人，没有人给任务，也没有单位给立项拨款经费，他终年来往于自己的家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之间，那时只有公共汽车，对于年过花甲的他来说，要有多大的毅力啊！在家里方桌是他的写字台，坐的是多次用铁丝加固过的藤椅。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1973年写成了《三角洲沉积体系特征及其和石油的关系》。此文被大庆油田的科技工作者参阅以后，对那里的油田开发和科学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1975年河北任丘发现高产油田，潘钟祥应邀考察地质问题，随后写成《基岩油藏》，给这类油藏一个科学的概念。此文于1982年在《AAPG》上发表，引起国外同行重视，美国、埃及、印度、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学者来函求教。美国的几所大学多次翻印此文。

“四人帮”垮台了，潘钟祥进入古稀之年。科学大会召开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提出来，人们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中华大地，对于潘钟祥来讲，真可谓迟到的春天。在北京的百名教授上书，呼吁恢复石油学校，恢复教学。他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可是，“文革”巨大的惯性，阻碍着这个正确主张的实现。直到70年代末，地质学院才实现了一校两地的局面。潘钟祥出任石油地质系的主任，又办起了博士点，这位中国第一位石油地质学博士，于古稀之年才被允许培养博士。

这时中国石油学会蕴酿筹建，潘钟祥又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以他的成就、名望和对该会的积极态度，在第一届理事会上被选为副理事长。在校内、校外各项事务繁忙之中，他没有放下理论研究工作。他写成了

《不整合对于油气运移聚集的重要性》的论文，发表于《石油学报》。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二次生油”的理论。笔者听到他的这个理论是在1982年，是在中国石油学会长沙学术年会上。他作为副理事长，在会上讲演，题目是《关于找油的某些石油地质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是：二次生油和在华北下古生界寻找油气问题。

人们听了这个理论以后，都折服大师宣讲的道理，但也有不少人对此理论的实现持观望态度。如果说潘钟祥以极其喜悦的心情，看到了自己首倡的“陆相生油”学说得以证实的话，那么他没有来得及等到“二次生油”学说的证实就与世长辞了。90年代，塔里木盆地石油勘探取得长足进展，人们发现，那里的下古生界（寒武系和奥陶系）的石油，确有二次生油现象存在。如果潘钟祥再能活十几年，就会看到二次生油学说被证实的情况了。

每当我打开他的遗著，就想起那朝北小小的斗室，想起那把多处捆绑着铁丝的藤椅，想起卷伏在方桌上微微发胖的身躯。他勤奋地写着，著书立说留给后人。在我看到他的遗著中，“陆相生油”、“三角洲与油气的关系”、“基岩油藏”、“不整合的重要性”、“二次生油”，等等，我的眼就花了，视觉模糊了，一会儿显乳白色，一会儿又是殷红色的。啊！我看见这位大师挤出的“奶”和呕出的“心血”。

（责任编辑 小徐）



潘钟祥(前排中)与学生在一起。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 民初名记者黄远生喋血旧金山

胡荣彬

## 喋血旧金山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25日晚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中国城唐人街口的广州楼(此房现名“冠园酒家”),中国杰出的青年记者黄远生在此晚餐后正下楼梯,因点燃雪茄烟而停步,忽然,背后人丛中一人朝黄的背部连开三枪,年仅31岁的黄远生当场被击毙于血泊中……

这刺客却在一片惊慌嘈杂中诡秘地溜出广州楼(饭店),朝唐人街向东逃去。这刺客是谁,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直到七十年后的1985年9月,在黄远生故乡江西九江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才得出结论: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的。

黄远生是得罪了谁而遭此毒手呢?原来,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黄远生和许多人一样,在政治上曾对袁产生幻想,曾发表过赞成袁总统的文章。然而,民国初年,北京政局十分动荡,瞬息万变,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等众多的党派和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与斗争的关系复杂多变,黄远生以其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在不同时期曾对国民党、孙中山、袁世凯等许多党派、要人发表过态度明确、言

词激烈的批评和赞许。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表露后,黄远生对此极为不满。袁世凯深知新闻舆论的重要性,想用大记者黄远生之笔,吹捧帝制,而黄远生却极不想作此违心之文,但又慑于袁的权力,只好写了篇似是而非的文章搪塞。袁看后很不满意,命黄重写,黄自知凶多吉少,便逃离北京,来到上海,立即在上海各大报上公开声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接着又经日本来到美国旧金山。而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等人,因远隔重洋,信息传递较慢,并未及时知道国内新近发生的袁、黄决裂的消息,仍以为黄远生是发表过赞成袁世凯、批评孙中山的记者,黄一到旧金山,便受到秘密跟踪、监视,待机谋杀,12月25日便发生了本文开篇所述的场景。

## 宁为记者不为官

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何以有资格穿梭、周旋于袁世凯、孙中山等国家头号政要之间,并推起波掀起浪呢?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叫人相信的传奇故事,然而这确实是客观存在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县斩合镇址坊村人。光绪十年(1885)出生于一书香世家,幼年时不仅熟读经史子集,其父

母还请了一名外国女教师给他教英语。16岁时入南浔公学，因学习优秀被全校学生推举为代表，电贺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专制而罢学，并亲赴上海该校。19岁时中了秀才和举人，20岁中了进士。象这样一连中秀才、举人、进士的称为联捷进士，旧时极少，因此，20岁的黄远生当时已名声大噪。

中进士后，清政府派他去河南省当知县，而他觉得自己年轻轻的，怎忍心坐在公堂上喝令衙役用板子打老百姓的屁股？他不想当官，便按清政府的规定，留洋到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他接受能力很强，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日语，被老师和同学们一致推举为课堂翻译。他的学习兴趣很广泛，西方文史哲无不钻研，课余还写作、翻译了许多文章发表，并出版了译著《岩仓贝记》。在中央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推他致答谢词，致词毕，他用汉语、日语、英语、法语，一连说了几声“谢谢”，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1909年（宣统元年），24岁的黄远生学成归国，清政府任其为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撰修官等职，又做过律师，其间常写国内外观感文章给京沪各大报刊发表。他在官场上混了一年多，由于官场的黑暗污浊，使他对仕途厌倦并失去信心。他的九江同乡李盛铎是清末政府派

出欧洲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李盛铎曾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多是报馆撰述人员，你若去做新闻记者，一定会成为一个名记者。这番话对25岁的黄远生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久便下决心，不做官不做议员，要去做记者，要为揭露中国政治的腐败黑暗、拯救人民于深重苦难而奔走呼号，以求激励民心，改善政治，改造国家和社会。

### 抨击时弊的政论家

起初，他常就国家、社会重大问题，撰文于北京的《亚细亚报》、上海的《东方日报》、《申报》等大报刊，进行报道和评论，1911年（辛亥革命），他与蓝公武、张君勱三人拿出一部分薪水创办《少年中国》周刊，专门报道与评论时政。由于见解新颖，切中时弊，每期印2000份常常被抢购一空，远生等三人因此而名声鹊跃，时人称他们为“新中国三少年”，《少年中国》也因敢于直谏、屡揭袁世凯政府之弊病而被时人称为“总统府之都察院”。



近代杰出记者黄远生

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局，犹如光怪陆离的万花筒，变幻无穷，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国家大政要事，而黄远生的文章大都落笔政坛要事，视野开阔、发微探幽，入木三分。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有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黎元洪、章太炎等总统、部长、要员。外国入侵蒙古、六国大借款、张振武被杀案，宋教仁遇刺等社会重大事件，都是通过他的笔向社会作了详细、真实的报道和评论。如他在《记者眼中的孙中山》（民国元年九月发表）一文中写道：

问：究竟（孙）先生对袁总统的批评如何？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

恐怕不够么？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这样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了，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答应的。

黄远生对袁世凯当总统持疑问的态度问孙中山，而孙中山的回答是对袁世凯的赞

许，难怪黄远生从此和许多人一样，对袁世凯在政治上存在幻想。

三个月后，黄远生又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民国元年十二月发表）一文中，直面袁总统本人和全国人民，大胆直言：“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他又在同月发表的《个人势力与国家势力

之别》一文中开篇直言：“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也”。

这需要何等的胆识和论据啊！

## “新闻通讯” 文体创始人

黄远生从开始投身新闻界到遇害，总共不过四五年时间，他写的大量通讯，是研究民国史的历史文献；他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也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新闻舆论要主持公理、指斥时弊。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全面。新闻记者要做到“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他这些创造性的见解，一直被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所推崇、效法和研究。

在黄远生之前，中国的报纸上虽出现过“通讯”的栏目，其实不过是一些消息，或一些文人编造的故事。而黄远生的通讯，较之（他人）则有明显的区别和自己的个性，常能落笔大政要事，文章开阔深邃；精确系统，形象生动幽默，为我国“新闻通讯”这种新闻体裁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当袁世凯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屈膝投降，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政府，不惜以国家领土、主权作抵押，向六国银行进行数额巨大的借款活动。黄远生从借款开始谈判便进行



1915年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口的广州楼遇害地

了系统的报道：1912年5月12日发表了《大借款波折详记》，报道了唐绍仪挥霍此款五百万，使借款谈判失败的过程。同月18日又发表了《借款里面之秘密》，报道了几家外国银行与中国政界要员的秘密。7月9日又发表了《借款内脉之解剖》，报道并分析了借款的总情况。8月14日又发表了《最近财政之一般》，报道为维持中国财政残局而先小借款；9月20日又发表了《借款交涉之七零八落》，开篇直言：“借款交涉又名为中国之亡国罪案。”然后就借款过程中丑态百出的各类人物的表演作了记录。9月30日发表了《伦敦借款与英国》，揭露英国资本家向银行财团提供款项给中国的内幕，并利用大量材料，分析问题的本质。不久又陆续发表了《断送蒙古声中之大借款》、《借款交涉内脉之解剖》、《最后借款之命运》、《痛苦之新年》、《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十几篇关于借款问题的系列通讯，活灵活现地勾画了袁世凯等一群军阀政客卖国求荣的丑态，同时也揭露了英、法、德、美、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勾心斗角和对中国敲诈勒索的罪行，激发并推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袁群众运动。

青少年时期的邹韬奋，原是立志将来做一名工程师，因在理工中学读书时，被黄远生的优秀通讯所折服，便下决心

改变自己的志向，以黄远生为榜样，当一名记者，后来果然成为我国新闻出版界的伟人（据《韬奋文集·经历》和邹夫人沈粹缜回忆录）。

## 告慰英魂

黄远生以笔作枪，英勇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使新闻主持公理、廓清腐秽，从而使国家政治、人民生活焕然一新。黄远生牺牲后，许多新闻志士接过他手中的如枪之笔，继续进行浴血奋战，和许多革命志士一道，建立起了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逝世后，其挚友、哲学家林宰平先生，费时

四载，广泛搜集他浩如烟海的政论、通讯，从中精选出二百二十余篇，47万字，分类编成《远生遗著》四卷，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曾于1924、1927、1934、1938、1984年再版。从远生先生逝世至今，国内先后五次为他召开了纪念（悼念、研究会，纪念、研究他的文章，不仅在会内，而且在会外还层见叠出，许多民国史学者和新闻学者对他的生平史实和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新闻思想、文学思想、翻译思想等多方面、多层次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和弘扬。

（责任编辑 吴思）

## 邮购启事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书籍本社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 者	定 价	邮 费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思痛录	韦君宜	13.00	3.00
朝鲜战事	徐 孔	53.50	4.00
忆周扬	主编：王 蒙 袁 鹰	36.00	4.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经济实录	主编：王瑞璞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外交实录	主编：张树军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军事实录	主编：蒋建农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政治实录	主编：严书翰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科教实录	主编：岳庆平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文化实录	主编：张湛彬	80.00	8.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4.00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	主编：张湛彬	88.00	8.00
中国改革报告	王瑞璞	48.00	4.00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 要让群众 了解真相

● 李庄

经过多年生活、工作和“运动”的锻炼，我国人民日益理解“以史为鉴”这句话的意义和重要。人们渴望多了解近代史，特别是当代史，尤其是共产党历史各个方面的真相。刘少奇同志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写历史，首先要熟悉历史。

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作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1年6月，又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澄清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是大非，也涉及中国当代一些重大事件，对群众很有教益。

但人民希望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人民有权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坦率地说，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有时做得不好：有的该说未说，有的所说不实。例如，有的领导人患病，这本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提也就是了，但有时偏说“身体健康”、“神采奕奕”。一项工作本来做的是这样，偏要说成是那样。我在“文革”后写过一篇短文，说我国人民过去常在“想不到”中生活，不知哪一天，忽然冒出一件大事来：“想不到。”所以发生这种现象，历史原因之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特别凶恶、狠毒。俄国沙皇以残暴闻名，但对革命者还有一条流放的刑罚，列宁、斯大林都受过此刑，遭难未死。我国的蒋介石辈比沙皇残暴得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早被斩尽杀绝了。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多

数时间敌强我弱，严格保密成为我军致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两军对垒，主帅的性格、嗜好、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等，都是高度机密。三国魏蜀交兵，司马懿假意招待诸葛亮派来的节使，席间随口询问诸葛亮的生活状况。军使是个糊涂虫，有问必答，使司马获得诸葛“食少事繁，岂可久乎”的重要情报。在战场上，不仅严格保密，有时还制造假象，骗敌、诱敌……为了胜利，是不惜运用一切手段的。在和平时期，对待人民群众，这么做就完全错了。三十多年前，为了掩饰错误，或者死不认账，明明“大跃进”搞得不好，造成极大困难，偏要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绝大多数人知道这是假话，却听了相当长时间。明明是“危机四伏”，却说是“莺歌燕舞”，说是愚民骗民，实不为过。我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由于水平低、骨头软，初时积极鼓吹，以后违心执行，负罪心情永世难忘。

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群众最满意两件事：一，经济逐年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二，对当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若干重大政治史实了解日多。后者除了领导因素之外，许多传媒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思想指引下，勇于讲真话，勇于反映真实情况，其功不可没也。

我们党受“左”倾思想干扰时间相当长，“左”的思想对保密工作也有不少影响。这表现在群众应该知道的东西负责方面不说，有时说得不实，所以应该澄清的东西还不少。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认为，简要说来可以概括两条：一，坚持正确的保密，古往今来成大事者莫不注意及此。考虑到现在是和平时期，改革、开放年代，除必须保密者外，过去的制度、作法已不适合当前需要的，坚决进行改革。应当让人民知道的，要让人民知道，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智慧；二，纠正过去说得不全、不实的东西。毛泽东同志说过：不犯错误的政党、个人是没有的。中共中央决议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都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彻底加以否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讲真实情况呢？不管任何组织、领导者造成的错误都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予以批评，只会提高这个组织、领导者的威信而不是相反。

# 王业美发《内参》 引发的思辨

● 李 宾

在“农村改革宣传 20 年回眸”座谈会上，安徽日报记者许锡照递给我一份他 20 年前写的《内参》：《来安县委书记主张包产到户》。

我一口气读完这份《内参》。透过这泛黄的稿纸，我仿佛又回到 20 年前的峥嵘岁月，在春雷滚动中，听到了一名记者发自内心的真诚呼喊，看到一位县委书记的求实、为民的高大身影，以及饥肠辘辘的农民兄弟渴望改革的强烈愿望。作为记者，我不能“资源独享”，应把它的基本内容公之于众，让广大读者回头看看中国农村的改革是怎样从头起步的，从而引发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深层次的思考，或许是有帮助的。

## 农民为什么非要包产到户不可？

《内参》说：“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现改为乡）前郢生产队是全县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队（1978 年秋）。这个队 20 户，116 人，30 个劳力，289 亩耕地。从 1960 年以来，粮食总产长期徘徊在 40000 斤，征购任务从未完成过，年年吃回销粮，少则 6000 斤，多则 12000 斤。去年 10 月，县委书记王业美回这个队了解情况，进村的第一家，夫妻俩带三个孩子，住两间破烂的草房，屋

顶破得露着天。家里只有一床棉絮，晚上全家五口人裹着棉絮睡在床上，白天用被絮包着小孩放在摇篮里。墙脚的泥瓮子里装了几十斤稻子，这便是全年的口粮。女主人叫‘九妹’，见到县里来的干部就哭着要救济。王业美同志来到会计家，会计正生病睡在稻草床上，身上盖着‘半面鼓’（没有被面的被子，被里是用帐子布做的），家里也很穷。又看了几家，家家都缺吃少穿。老王心情很沉重，便找公社和大队干部商量如何把这个队搞好。干部们说，这个队解放后搞得很好，五风以后就不行了。三年困难时期死了不少人。什么办法都用尽了，生产就是搞不上去。当时，这个队已把油菜分到户栽种和管理，因此社员们都在忙着栽种油菜，但种小麦的事却放在一边。社队干部提出把小麦也分到户管理，干脆包产到户。社员们同意这样干，后来县委也批准在这个队搞包产到户，做试点。结果这个队就耕种搞得很好，庄稼长得也很好。去年全队收 70000 斤粮食，今年超额完成了 108000 斤的包产任务。去年吃回销粮 10000 多斤，今年家家留足了口粮，还卖给国家 9000 多斤余粮。”

记者用朴实的文字，准确地记述了前郢队由“大呼隆”到包产到户的突变过程。这个队本来不差，是五风、极左把它搞坏了，弄得种粮的

没有粮食吃、种棉的没有衣裳穿，甚至饿死过不少人。这是倒退，是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这个队很有代表性。然而，实行包产到户，一年见效，不仅家家留足了口粮，还卖给国家九千多斤余粮。这说明什么？几十年找不到好办法，为什么一包就灵？如果说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就能增产呢？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几十年，农民为什么偏偏要往“资本主义”道上跑呢？在解放思想的洪流冲击下，极左的堤坝已经坍塌，但其流毒远没有肃清，时不时地会在不同气候、不同事物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需要全党严重警惕的。

## 王业美真的吃了豹子胆？

20年前，王业美同志就说：“只要上级批准，我同意在全县范围内搞包产到户。只要允许搞包产到户，盖仓库都来不及。”

他主张搞包产到户的理由有两条：

“一、搞包产到户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实践来看，确实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一个好办法。

二、实行包产到户并未改变集体所有制，从理论上讲，是对生产关系实行调整。也就是说，实行包产到户，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王业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这样解释：“来安县的集体经济薄弱，‘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各社队欠国家贷款1100万元。如果归还国家的贷款，许多生产队就谈不上有集体经济。王明公社是当年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前不久罗炳辉同志的儿子从上海来到他父亲当年住过的地方看望群众，群众说：‘现在的日子还没有罗司令在这里时过得好。’有个24岁的生产队长说：他从记事起就吃国家的回销粮，队里扫场用的笤帚都是用国家贷款买的。这个公社现有耕牛600条，以每条牛价值800元计算，将耕牛全部卖掉也还不清欠国家的贷款。由于集体经济薄弱，全县的机械化水平很低。许多生产队连一台手扶拖拉机都没有，有些队有拖拉机，也只是用来脱粒和运输，全县机耕面积只占耕地面

积的百分之八。田间劳动基本上靠两只肩膀一双手，劳动工具仍是二千年前就使用的犁耙锄等。在生产工具落后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好坏取决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过去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记个大概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粉碎了‘四人帮’，思想大解放。农民们强烈要求做土地的主人，用现有的落后工具生产更多的粮油棉……”

以上“内参”写的，是王业美在1979年秋天说的话。

如果说农民搞包产到户是穷“逼”的，尚情有可原，因为“大呼隆”已经把农民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连性命也难保，“民不畏死”，于是“穷则思变”了。当时包产到户是禁区，而作为县委书记的王业美为什么也主张包产到户呢？他不缺穿更不少吃，为什么他不怕“触电”，不怕开除党籍、坐牢杀头呢？

我认为，王业美的大胆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即符合人民利益的事，符合客观规律的事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因为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从实践中来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党的灵魂，事业的保证，这是其一；其二，改革的春风劲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全党同志的强大思想武器；其三，他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视人民如父母，与他们共甘苦、同患难，休戚与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他还考虑什么个人的安危呢？

1988年，王业美同志为人民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累死在皖东大地上。

他生前曾对妻子说过：“我当县委书记，如果解决不了来安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咱就回山东老家！”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一位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心声，犹如一道彩虹亮出了他一生为人民的高大的形象。

王业美同志是党的一面旗帜！

王业美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今年春节期间，我陪同原安徽省社科院院



长欧远方、原滁县地委书记吴炎武，看望了王业美的妻子朱佩琳，对王业美表示敬意；又到来安县十二里半乡前郭生产队访问，看到这个队的巨大变化，听干部群众谈农业产品结构调整后面临的种种难题，农民负担、缺水、缺技术、农业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等等，更听到他们每年过节都对王业美同志表示尊敬和怀念的动人情景，实在令我们大为感动。一个人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你的。

## 今天重读《内参》有什么启示？

在举国上下纪念改革开放 20 周年的日子里，重读这份 20 年前的《内参》，有着特殊的意义。抖落历史的尘埃，你将看到诸多朴实而闪光的内涵，得到令人深思、令人奋进的启示。

启示之一 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是一，二是二，不欺不瞒，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上不阿，下不压；不为尊者讳，不为卑者吹；能听善听不同意见，都叫实事求是。不仅于记者应如此，当官、做人都应如此。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事关你个人前途命运的问题上，你能如实地说、真实地写吗？在“两条路线”、“两种命运”斗争的关节眼上，许锡明同志做到了。这是一种忠诚，一种勇敢。

启示之二 要继续解放思想。大包干使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亦可以说是对农民生产经营权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改革也是一种政治的改革，农村大包干也是农村政治改革，是农民运动。其结果是农民的解放、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只有解放了的人、自由的人才能创造出人间奇迹。因此，在积极推进村民选举的同时，应逐步稳妥地扩大村民自治的权力范围，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那时，贪污腐化，以及什么乱集资、乱收费现象就不会如此猖獗了。

启示之三 要有敢为先声的勇气。许锡明同志 20 年前敢写，但那时没人敢登。两个月后这一很有见解的文章总算得以作为《内参》摘要在《情况反映》上发表，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然而采写编发这类文章，是需要记者、编辑、总编辑的新闻敏感和“敢为先声”的勇气的。改革之初许锡照等同志敢为大包干呐喊，喊出了真情，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材料，这就是贡献。眼下，我们的农村改革、国企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都需要记者去挖掘去反映。新闻是日新月异的，报纸就不能用一个老面孔去“孝敬”读者；只有用新而又新的内容、版面，才能对得起我们的“衣食父母”。

（责任编辑 杜晋）

### 编读窗

编辑同志：

我在贵刊 98 年 12 期发表过一篇小文《从李大钊改杨继盛对联说起》，其中有一错误，把“兵部员外郎”误为“兵部第三把手”，蒙谭玉明先生指出，非常感谢！当时我正在病中，无法找到更多的参考资料，只凭记忆和《辞源》“员外郎”条，牵强附会。《辞源》“员外郎”条是这样说的：“晋武帝始设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简称员外郎，……侍郎不在时，代行曹本”。因此我推论，员外郎仅次于侍郎，这是我的粗枝大叶作风所致。我除接受批评外，今后务求言之有据。

再一次向谭先生致谢！

叶笃庄

1999 年 5 月 2 日

# 参观「柏林墙」追忆

● 王为熊



本文作者在“柏林墙”前

举世闻名的“柏林墙”被推倒即将10年。每当我想起参观“柏林墙”那短暂的经历，其情其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89年4月，我随中国群众文化代表团

访问联邦德国。经过半个月的访问考察，我们抵达访德的最后一站——西柏林。在这里再呆上三个小时，我们就要通过“柏林墙”出境，去民主德国首都——东柏林了。

“柏林墙”曾被认为是德国分裂的象征。二战结束后，柏林市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分别归属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东西柏林之间原本是相通的。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大批东德人先后陆续涌入西柏林，于是，民主德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於1961年8月13日宣布封锁边界，并开始了建构“柏林墙”的浩大工程。从此，两德人民被一道漫长而厚实的“墙”分割开来。

我们代表团到达西柏林市后，市政府派了一位女官员马克思小姐出面接待。热情好客的马小姐与大家见面后就建议我们参观“柏林墙”。对于即将离开联邦德国的代表团成员来说，这也许是最诱人的去处，因此，她的建议马上得到我们的积极回应。据介绍，每天到“柏林墙”的游人如织，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如果我们能够身历其境，目睹本世纪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柏林墙”，实乃一件幸事。我们驱车前往，高速疾驰的奔驰轿车，从帝国大厦附近呼啸而过，很快便将我们送到“柏林墙”附近。我们下车步行，穿过一排排琳琅满目、专售“柏林墙”纪念品的商店，径直走到“柏林墙”墙脚下。

由水泥和石头筑成的“柏林墙”高约4米，长达160公里，曲折蜿蜒，将西柏林团团围住。此时，站在“柏林墙”下，仰望、环视“柏林墙”，立即会感到墙本身固有的那种坚硬和冷酷的特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一眼难望尽头的白色墙面上，重重叠叠布满了许许多多的油画或水粉画，手法不同，风格迥异，其中，现代绘画颇多。这些奇形怪状、色彩斑斓的图画，还有一些文字书写，令人眼花缭乱。其作者是包括西德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艺术家和旅游者。对我们这些东方人来说，这些墙画很难看懂，但可以理解的

是，墙画的主题基本上表达了期望和平、期望统一的愿望。除了“柏林墙”本身之外，还有这些光怪陆离的墙壁艺术，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游客。我注意到在“柏林墙”下流连的各种肤色的游人们，很少喧哗，他们认真地欣赏，默默地留影。

我们边走边看。在“柏林墙”的一个出口附近，我发现墙上悬挂着二三十帧放大的黑白照片，并附有文字说明：内容有姓名、年龄、职业、何时从东柏林逃跑遇难等……西德当局将这些东德偷越过境者视为“英雄”，拍照放大，公之于众，其用心可谓良苦矣！

为了抓紧时间，我来不及细看，便登上一处为参观者架设的高台。放眼望去，东柏林景象尽收眼底。与西柏林不同的是，“柏林墙”外东部地区附近除了警戒的岗哨外，是一片开阔的无人区。沿着漫长的东柏林墙，建了许多瞭望台，墙根则安装锐利的矛尖，地下暗设装置，还有铁丝网、警犬班等，为了防止偷越国境，各种严密设施应有尽有。

参观结束，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换乘我驻德使馆派来的汽车，从“柏林墙”出境，前往东柏林。东柏林检查站的检查人员见我们是中国人，很客气地查看护照，便放行了。汽车启动后，先开进一个近90度直角的弯道，接着，又进入第二个弯道，最后，才入东柏林市宽阔的柏油大道。陪同我们的司机说：“没事了。对使馆人员的检查只是例行公事，对老百姓则另当别论了。”我问：“西柏林人到东柏林查得严不严？”他说：“只要不携带违禁品，交上50个西马克就行了。”他进一步解释道：“按东德银行汇率，1个东马克兑换1个西马克；而在西德银行，1个西马克换7、8个，甚至10个东马克。仅此一项，东德当局通过西德入境，可收入一大笔外汇。”

我好奇地问道：“刚过墙时汽车为什么要转两个弯道？”“道理很简单，”司机回答说：“前些年有一卡车东德人企图开车从进出口处冲过去，哨兵拦不住，开枪打死了不少人，为此，东德当局在“柏林墙”的一些出口修建了弯道。企图开车长驱直入强行出境就非常困难了。”哦，原

来如此！看来，东德当局在“柏林墙”所做的文章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代表团在东柏林呆了两天，便取道莫斯科，乘火车回国了。

半年之后，1989年11月9日。我忽然从报纸上见到一条醒目的标题：著名的“柏林墙”被推倒！一夜之间，十几万东德人跑到西柏林。这条消息使我大吃一惊：坚如磐石的“柏林墙”怎会轻易地被推倒？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理解。过了几天，陆续有报道说，从柏林东部跑到西部的已逾百万人，成千上万的西德人也往东柏林跑。柏林东部人过去，西部人跑过来，你来我往，渐渐融合在一起了。“柏林墙”被推倒一年以后，两德终于宣布统一。两德的统一，作为本世纪重大事件之一载入史册，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分离，久分必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1998年10月，“柏林墙”被推倒9年之后，又爆出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多年来曾经为德国统一建立不朽功业的科尔总理下台了。据舆论分析，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德国东部人对科尔政府信任度下降了。

两德统一时，联邦德国科尔总理曾许下诺言：“没有一个人会生活得比以前更糟。”东德人为此受到极大鼓舞。在1990年德国大选时，德国东部有41.8%的选民投科尔的联盟党的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德国东西部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东部的失业率高出西部一倍以上。东部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感到比西部人矮了一头，一些人产生怀旧情绪，怀念起“美好的过去”。据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的人认为如今生活有保障。于是，这次德国大选，德国东部人调转方向，把票投到联盟党的对立面社民党了。

现在，德国社民党成了执政党，社民党主席施罗德当上了总理，他又许下什么诺言，夸些什么海口呢？德国东部人的生活是否会改善，政治和社会地位会得到提高吗？我想，德国东部人将会拭目以待的。

（责任编辑 洛松）

编者按：

做过李立三秘书的李思慎同志，主要引用前苏联学者 A·M·格里哥里耶夫著作中提供的论据，写了《毛泽东与立三路线》一文，发表在本刊今年第二期上。本刊读者、也是李思慎朋友的张培林同志，认为李文所引论据有以偏概全之处，得出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够符合。这里我们将张文予以刊载。

我们一向认为，对待这一类问题只能是实行真正的百家争鸣，通过讨论切磋，探求真理。本刊“争鸣篇”，亦旨在提供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园地。在这里参加讨论的人，一定都有一颗“平常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争论时可以唇枪舌剑，争论后要做到毫无芥蒂团结如初。

# 胜利之路为毛泽东作证

——与《毛泽东与立三路线》一文作者商榷

● 张培林

《炎黄春秋》今年第 2 期发表的李思慎同志的《毛泽东与立三路线》一文，读了感慨良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确实有许多重要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论述还需要变换视角，重新加以认识。李思慎同志这篇文章就是他的一次尝试。不过，我觉得对待如此大的原则问题轻率不得，弄得更清楚、些更准确些还是必要的。

李思慎同志的文章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 1930 年李立三推行其错误路线期间，毛泽东究竟是处于什么地位，是什么状态呢？”他在引用了一些历史资料之后结论说：毛泽东“是超前于李立三的”；在“立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之后，毛泽东是贯彻执行的；在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错误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李立三纲领的基本原则”，“仍然继续执行”立三路线。言外之意是，毛泽东比立三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思慎同志的这些观点，我是不赞同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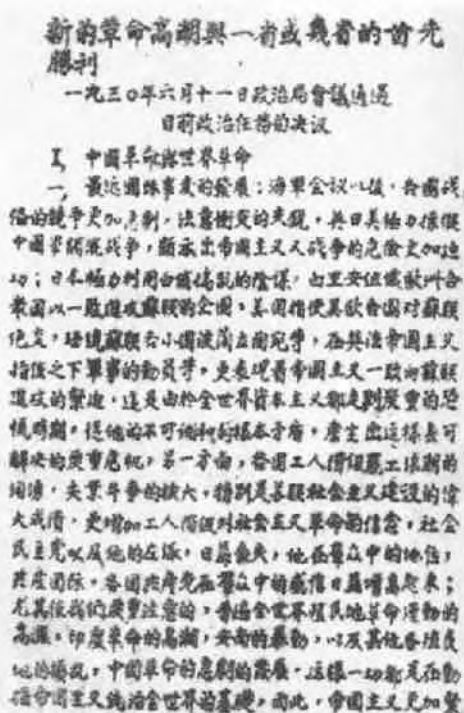
毛泽东是“超前于李立三”吗？不是的。

从 1929 年到 1930 年上半年，李立三发表大量文章。他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极力鼓吹城市工人罢工和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性，并一再批评和反对毛泽东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1930 年 4 月 2 日，李立三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的文章，特别强调说：“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观念。”6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立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进一步强调

说：“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在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决议还指责毛泽东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没有决心将地方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中建立起来，这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反映，与目前的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等等。

李立三一再批评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和怎样形成的？历史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在井冈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论证和分析了中国的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及条件，正确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以及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写了《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他不仅强调指出红四军要在闽西、赣南二十余县范围内创造苏维埃政权割据，而且建议中央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创造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并在闽、浙、赣三省“首先创造公开割据”。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写了给党中央的《前委来信》，进一步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着重阐述了党和红军长期在农村发展，成分又主要是农民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化即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又写了那封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这就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一个根本前提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毛泽东、朱德领导创造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创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那个时期，李立三和毛泽东都在期盼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但是他们为高潮作准备的战略思想和行动方针是截然不同的。李立三是“以城市为中心”，毛泽东是“以乡村为中心”，一词之差则有着本质的区别。难怪当年李立三斩钉截铁地说两者“没有丝毫的共同点”。然而，时隔近70年后的今天，李思慎同志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最基本的史实。尽管李思慎同志列举“依据”也有五条之多，但他忽略的是基本的事实即反映事物本质的事实，这些“依据”我认为就是难以站住脚了。



这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此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依据之一是，“李立三的思想尚未发热的时候，以毛泽东为党代表的红军第四军的党部就发出布告，宣称：‘工农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在全国’。”这是事实。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以红四军军党部署名的《共产党宣言》。这两个文件表达了三方面的重要思想：第一，指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属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权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就是为这个宗旨而奋斗的；第二，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各阶层的方针政策；第三，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团结起来，“风发雷奋”，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奋斗。《布告》和《宣言》是动员革命群众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作斗争的号召书，是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的政策措施。李思慎同志用《宣言》中的“工农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在全国”这句“布告四方，大家起劲”的话，来否定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基本思想，并且和李立三扯在一起，是很牵强的。

依据之二是，毛泽东批评了中央的二月来信，并且

“雄心勃勃的建议中央”一年为期争取江西。这也是事实。毛泽东、朱德等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认为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经前委开会讨论后，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复信》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正确文献。至于《复信》中关于争取江西的建议，不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里作了这样的说明：“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中央的《二月来信》与前委的《四五复信》在我们的案头上摆着，孰是孰非，似乎早有定论。如果从根本上怀疑《四五复信》的正确性，那就又当别论了。

依据之三是，在陂头会议上提出了“打到吉安去”的口号和分兵游击的行动计划。确实如此，陂头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部署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但会议也明确指出：“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2月14日专门发了《前委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第一号——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但通告在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后指出，攻取吉安的第一步，则是要先占领与吉安为犄角之势之吉水、安福、泰和等县城，以包围和恐吓吉安。2月24日、25日，取得歼灭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俘敌一千六百多人的胜利后，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从更多地消灭敌人、更好地发动群众出发，认为红军北进打吉安又没把握，应乘金汉鼎入闽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酝酿战争不能分兵到江西之机，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的联系，把这一广大地区完全赤化，作为红军前进发展的根本，从而进一步夺取全省政权。在这个目标下，红四、五、六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路线。3月18日，前委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发布了《前委通告（第三号）》，具体部署了这次大规模的分兵争取群众的工作。通告着重阐明了红军分兵发动群众对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根据地建设必须采取“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和“伴着发展”（即波浪式的前进）的正确的工作路线。这都是古田会议和陂头联席会议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对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它的基本精神与“左倾”冒险是没有共同点的。

依据之四是，赣西南特委在富田召开的第一次代表

大会及会后公布的政纲。这次会议对陂头会议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的讨论。会议期间，毛泽东不在富田。他正在率红四军主力，攻克南康、大余等县，紧接着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的负责人会议和南康、南雄、信丰、大余、崇义、上犹等六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布置发动群众，配合红四军扩大赣南根据地的斗争。

依据之五是，“毛泽东奉命进攻南昌达不到李立三规定的‘猛烈发展’，李立三的大脑膨胀了”。这话于理不通，而且与史实不符。红四军自陂头会议后，即分兵游击，致力于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农村根据地，以期逐步实现把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斗争。毛泽东、朱德执行的这个“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计划，遭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接二连三的批评和指责。4月3日，《中央给四军前委的信》中批评毛泽东说：“造成粤闽赣三省边界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信中还进一步强调全国革命形势在平衡向前发展，提出要准备在全国实现总暴动，并把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作为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5月22日，《中央军委给南方办事处并广东军委信》中说：“第四军（朱毛）中央最后决定是要他们向长江发展。”6月9日，立三中央又专门委派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到闽西，指令红四军“向长江流域发展”，“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案，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组织武装暴动。6月15日，李立三等又迫不及待地发出了《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特别强调：“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这封信还严厉地指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从这段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奉命进攻南昌在后，李立三的大脑膨胀在前。李思慎同志颠倒二者发生的时间和因果关系，只能视为作者为了证实毛泽东“超前于李立三”这一观点的需要。李思慎同志还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说成“是立三路线借重给毛泽东的信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更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了。

## （二）

李思慎同志在他的文章中，为了说明毛泽东在立三



这是茅坪八角楼。毛泽东在这里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文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之后贯彻执行了立三路线,一口气列举了制定冒险计划、进军南昌攻占长沙和再攻长沙的事例。为避免行文冗长,在这里我不想逐一地复述6月到9月这段战争史的真实情况,只抄录几句艾格妮斯·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所载朱德的一段回忆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史沫特莱写道:毛泽东对于立三路线,一开始即为朱德后来所回忆的:“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毛泽东和朱德认为红四军和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而“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因此,“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大可疑的”;“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加上当时党中央一再加给的粗暴批评和咄咄逼人的“左”倾威势,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军团前委不得不在组织上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1930年6月在汀州,中央派涂震农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部队“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

利。由于发动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一万人左右,这时约有一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朱德是当事人之一,似有不够客观的嫌疑,这里我再抄录一段美国学者施拉姆的论述。斯图尔特·施拉姆是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他在1967年所著《毛泽东》一书中关于毛泽东抵制立三路线问题有这样的论述,他写道:“…

…经过24小时激战,朱和毛放弃了占领南昌的打算,向西撤走。在途中,他们与彭德怀相遇。彭德怀此时收到李立三的命令,要他再次攻打长沙。因此,第一、三军团共两万人,再次向湖南省会进军。在与装备精良的蒋介石部队打了13天后,毛‘劝说’同志们放弃这一毫无希望的战斗,返回江西南部的根据地。两年前,毛拒绝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南部进军的命令,这次,他认为上级党的命令可能危及他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时,又有意识地违背上级党的命令。”事实正是这样。9月12日,红一方面军(8月24日由一、三军团合编而成)从围攻长沙的前线撤至萍乡、株州、醴陵等处。9月13日,总前委在株州召开会议,初步总结围打长沙的经验教训,并决定不打长沙,不打南昌,而转头去攻打吉安。会后,红一方面军便分别向醴陵、攸县、萍乡及赣西广大地区撤退。如果说,在二打长沙以前,毛泽东没有抵制立三路线的明显行动,那么,在二打长沙失利以后,他便形成了抵制立三路线,坚决不再攻打大城市的思想。他的确比立三路线的其他执行者回头回得更早一些,更快一些。

### (三)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以后,毛泽东真像李思慎同志所写的“仍然坚持李立三纲领的基本原则”,“仍然继续执行李立三原来要他进攻南昌、九江的路线”吗?也不是。

9月28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到达袁州,29日下午,红一军团总部下达向吉安进军的命令。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长江局军事部部长周以栗来了,他带着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和长江局的命令,要毛泽东、朱德率一方面军开回去三打长沙。长江局是1930年8月1日成立的,项英为书记。当时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所以,长江局是毛泽东、朱德的顶头上司。不听指挥无异于犯上作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精神是要夺取长沙,占领南昌、九江,为会攻武汉创造条件。这正是“李立三纲领的基本原则”。因而,在一方面军内部引起了争论,是维持原议攻打吉安还是回头攻打长沙或南昌?为此,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讨论。会前,毛泽东与周以栗秉烛长谈,陈述不能回去的理由;他根据蒋阎冯大战很快就要结束,蒋介石将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的形势和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终于说服了周以栗。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以无畏的精神,放弃了中央和长江局要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的错误主张,还转过来帮助说服三军团的领导人不要再打南昌,而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去攻打吉安。由于周以栗的支持,袁州会议决定既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打南昌,而是去攻打吉安,然后再打南昌、九江。10月5日,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守敌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率部乘船逃往南昌。这时,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敌军,在三万红军的压力下纷纷撤退,赣南苏区发展到三十多县。苏区群众踊跃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四万余人。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同时,中共江西省委改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与毛泽东尖锐对立的李文林为书记。

吉安攻下之后,是否按照中央关于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的指示行动,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红三军团少数领导人跟红一军团一同攻打吉安是有条件的,就是打下吉安后,一、三军团配合打南昌、九江。如今吉安已经拿下,他们力主火速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经过争论,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策略性的方案:“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先向袁水流域推进”,“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包括分宜、新余、清江和峡江等县县境)布置工作,……发动这一带群众筹措给养……。”实际上还是不打南昌、九江。在向袁水流域推进中,毛泽东个别做说服工作。总前委于10月17日在峡江召开会议,对时局和行动等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峡江会议的情况,毛

泽东在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中曾有概括记述。峡江会议对时局问题的分析,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在8月6日中央行动委员会上关于整个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处在“迅速崩溃”、“不可终日的形势”的错误估计,而且正确地指出了反动统治阶级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的必然性。红军的任务是利用军阀混战来推进革命,为冲破敌人的联合进攻作准备。但是,关于红军是否要放弃攻打南昌、九江,会议没能统一意见。因此,在红军的行动问题上,会议仍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由峡江出发,向南浔路前进。”这是向湘东特委通报峡江会议精神,并不象李思慎同志所说的,“是要他们继续执行攻打南昌、九江的‘立三路线’。”

红一方面军总部10月20日从峡江出发,25日到达新余县的罗坊。为进一步统一全军的思想,确定红军行动方向,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陈家闹村举行联席会议。

从9月29日红一军团总部下达向吉安进军的命令到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再到10月26日罗坊会议,都是在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地方党某些干部中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影响,而纠正“左”倾错误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由于战争环境交通阻塞,还没有传达到江西的情况下形成的。因而在文件中对有些问题的提法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词句,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为了表示服从中央。坚决不打南昌、九江,是毛泽东的基本主张和核心观点,但在对某些问题的表述上要“和‘立三路线’的精神相接近。不打大城市,深入土地革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这是行动方针,其它只是些虚话。在行动方针问题上,不让步,在虚话方面,作些妥协。这样才能取得李文林等中央特派员和某些领导人的支持。罗坊会议通过的《决议》对形势所作的客观分析,对从一打长沙到攻取吉安经验教训的总结,使总前委内部在思想上基本达到了统一,肯定了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消灭赤色区域间的白点,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并对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围剿”作了战略性的部署。罗坊会议决议的通过,说明在红一方面军中克服了“立三路线”的干扰。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黄陂召开军长以上干部会议期间,收到党中央12月22日才正式下发的《中央第96号通告》。通告承认,中央犯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宣布撤去李立三的一切职务。这一精神,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传达,使红一方面军的思想进一步统一了。

(责任编辑 洛松)



# 泪凝的记忆

## ——悼丈夫志民一生之坎坷

● 傅雅雯

他走了！我怎么能相信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有说不尽的话，写不完的诗，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眼前闪现。

1998年的早春，历受癌症折磨的志民，又不得不再次去协和医院住院了，早晨，我陪他准备下楼去，他踌躇，不肯离开这个家，他左手紧按着多年相守的写字台，停步深思。我看出他心情沉重，我说：“先去医院看病吧！病好了一切都会好的。”

我扶他走出家门……

可是，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他再回不来了。

4月3日下午4时20分，他真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

志民，1926年5月21日出生在京西丛山峻岭中的门头沟煤窝张家村。由于家中兄妹多，父母负担沉重，他自幼便懂得疼爱父母。每日天不亮就起身，替母亲去煤窑背煤，那时他才只有五岁。

志民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教小学，并擅长中医，志民聪明早慧，很小就识中药，帮助父亲拉“药斗子”。

志民心地善良，从小对弱者充满同情，他热

爱苦难中的祖国。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他毅然走向革命，参加八路军，开始在地方工作委员会工作，后去挺进军司令部，作萧克将军的译电员。1941年1月他未满15岁，便加入了共产党。他住过教导队和军校。以后作过文化教员、指导员、教导员……

1947年，志民21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到河北省易县远台村发动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了他，他学习群众语言，开始写长篇叙事诗《王九诉苦》，每日工余，坐在村边写诗，边写边念给农民听反映。这首诗，十余日完稿，寄往《察哈尔日报》，7月13日发表于该报文艺副刊，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首长诗。当时，《东北日报》转载了这首长诗。另一首长诗《死不着》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的《察哈尔日报》副刊，同时载有萧三同志发表于《晋察冀日报》的评论文章，题为：《我读了一首好诗》。萧三同志对他的诗《王九诉苦》给予赞扬。这是志民的成名之作。

在刚刚解放天津时，他写作的时间都在晚上。往往是吹过熄灯号，查完铺后，他才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诗，发表在《华北解放军报》文艺副刊和《人民日报》以及《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和《石家庄日报》上。

1949年冬，他被调至华北军区宣传部文艺科创作组。一面写诗和小说；一面担任编辑《华北解放军报》文艺副刊的任务。抗美援朝开始

后，他两次入朝，写下了《祖国，你的儿子在前线》等通讯，还写下了诗和剧本。

## 二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对人民赤诚的诗人，脚下迎来的却是坎坷的道路。

1955年3月，志民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同年8月部队开展“反胡风”运动。那时，我和志民住在景山后街部队宿舍。胡风先生的家在景山后街后边一个叫太平街的胡同。我家老人和小孩也住在那条胡同里。

8月2日，创作组忽然通知志民检查与胡风分子的关系。原来，志民由朝鲜前线回国，便常去太平街家中看望孩子和老人。可是谁又想到这条胡同正被暗中监视呢！于是，一个“情况”便反映上去，说张志民“走过胡风家的门口时，向门口里看”。

为这无端怀疑，志民很生气，他把自己的笔记本、日记都交给了党小组。同一个党小组的剧作家杜峰和胡可，很快向上写了“张志民同志没有问题”的证明。可是解除了与胡风关系的怀疑，又要志民检查文艺思想，即所谓受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检查在“文学讲习所中受的资产阶级教育”。

志民此后，得了胃溃疡症，体质下降。

1956年志民由部队转业调到中央公安部宣传室，搞专业创作。此后他担任过该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副总编辑，回家乡深入生活，在门头沟斋堂派出所挂职任过所长。他走遍斋堂川的沟沟岭岭，忠厚、纯朴的父老乡亲，和养育了他的山山水水，给他以创作冲动，他写下了大量的歌颂劳动人民新生活的诗作。

## 三

“文革”开始，他这个作家、诗人，无奈停笔。每日要上班去作“检查”，听造反派的训斥。

街上越来越乱，为了他的安全，我让大儿子

和平骑自行车送他去“上班”。志民每日回家感叹着一路的见闻。彭老总和张闻天，被绑在卡车上游长安街的情景，故宫北墙筒子河上人们打捞自溺者尸体的情景，都曾使他颤栗，使他震惊。

不久，公安部大多数干部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办“学习”班。志民被揪斗、批判、打骂、靠边站，打扫厕所。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处于失去自由的状态。

1968年，我们夫妇二人，分别被监管。我住女宿舍，志民住男宿舍。只有食堂打饭时才可能见面，但不准互相说话。

4月27日，那天是星期六，忽然准许我们回家。说回家换换衣服，因“五一”将至。回家后，志民告诉我，这几天，夜间他常被捕人的汽车声惊醒。他认为让“回家看看”，是让做被捕前的“准备”。

回家后，安顿了老小，志民便把我们珍藏已久的婚前婚后的来往信件，包括他在朝鲜前线坑道里写给我的信，统统找了出来，对我说：“都烧掉吧！”我开始一惊，但很快镇静下来，我知道志民怕这些信落在那些小人手里，被污辱，被褻渎，给我和孩子们留下麻烦和灾难。我背过脸面对窗外，说了声：“行！”眼泪随之流到嘴角。

还有那本小红皮笔记本，写着婚前他写给我的那首长诗。“姑娘啊！我的女战士！”是这长诗的首句。是我离开天津到华北军区工作，临分手时，他在天津“金阳桥”海河边交给我的。那是一个月明的夜晚。

志民痛心地撕碎这个小红皮本之后，我们俩已泣不成声了。

当日晚，难以成眠，志民对我说：“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俩淌泪互对。但是，对老人和孩子竟又一直装作没事的样子。

5月1日，大部分人放假回家，只有少数所谓“重点对象”不准走。因是假日，食堂的人极少，我在宿舍门口等待志民过来，随志民一起走进食堂。我向炊事员要一个馒头，却也给了我一个窝头。志民说话了：“为什么也给她窝头？”

炊事员没有表情，也没有说话。我怕事情闹坏了，托着窝头，悄悄拉志民一下，赶快走出食堂，他敢怒而不敢言，无奈地看看我，扭身走向他的宿舍。

5月8日中午一点左右，志民劳动了一个上午，十分疲劳，脱掉外衣正欲午睡，专案组忽然来人叫他去谈话。刚谈几句，几个荷枪军人突然闯入，亮出“逮捕证”，给他上手铐，两个人扭住胳膊，按住脖子，把他推下楼梯，扔进一辆灰色卧车，按在坐椅下，车行一个多小时，被投入秦城监狱。从此，他只有犯人号：68134（大约是68年第134人），没有名字。

当天，家被查抄，全部书籍近万册，用大卡车拉走。待我回到家，住室像被土匪抢劫一般，乱七八糟，满地纸屑。

事后我才得知，在志民被捕的当天，专案组的人曾拿一张报纸给他看。这是一张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但是反面被钢笔乱画了。专案组的人严厉地问志民：“画报纸的人是不是反革命？说！”

志民思考了一下，冷静而沉着地回答说：“我不能这么说。我不了解这张报纸被画的情况……”志民不知道，这是否在为他罗织新的罪名。

#### 四

志民被捕那年42岁。

在秦城监狱203号灰楼的单间牢房，闷如铁桶。不审不判，度日如年。他害怕把身体拖垮，时常在牢房内跑步，在那洋灰地上留下了一个明亮的圆圈；听说一个人长期不出声会变成哑巴，他便自言自语，甚至故意和看守争吵；为了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也为当时那个畸形的社会留下一些记录，他又开始吟诗以自慰。



年轻时的张志民夫妇

别家经年久无镜，清汤杯水照囚容；  
道道伤痕冤砍就，囚衣片片血染成。  
善恶倒置人变鬼，美丑更易鼠成龙，  
大圣可有伏魔剑？降妖除孽斩不平。

这首题为《囚客》的诗，就是志民在“铁窗无笔砚”的特定环境中，口吟而来，写在自己心扉上的。

1969年，我们全家老小被由北京“发配”到黑龙江笔架山劳动。三个孩子，老大17岁喂猪，老二在砖场扣坯，老三14岁放羊。

而这些，身在秦城监狱的志民，一无所知。他经常梦见的，还是北京的那个家，北京的那些人。后来他的长诗《梦的自白》真实地记录了这段非人的监狱生活。

不平则鸣。志民写了申诉材料，要求上转。看守扔给他的是一盒火柴，强令他把材料烧掉。直到1971年，志民结束了铁窗生活。我们全家又被“发配”到湖北沙洋鸡鸣嘴农场。

沙洋气候潮热，劳动繁重，给志民分配的活儿是以木桶从丈多深的粪坑内向上提粪，我在鸡号喂鸡。我见他实在承担不了这种劳动，真是痛心至极，我真想去帮他一起拉那木桶的绳子，但我不敢，这样会给他增加更大的麻烦和痛苦。本来由秦城监狱出来，体质就很衰弱了，没

有得到休息和治疗，便到沙洋，立刻投入繁重的劳动。他的身体日日消瘦，至七月，酷暑之日，他病倒了。

赴沙洋农场看病，透视为肺结核病复发。终日咳嗽不止，低烧，服雷米封药，经医务所批准病假。志民向公安部提出要求赴北京看病。八月回到北京。

九月沙洋干校撤消。十月我们全家回到北京。自此，才结束了令人发指的所谓“五七道路”的生活。

## 五

打倒“四人帮”后，志民又拿起笔，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朴素无华。多年凝聚在心头的诗文，像泉水般奔放。三中全会后的大好形势，给了他在创作上飞腾的条件。十年血和泪形成了他那感人的诗篇。正如诗人牛汉老大哥，在1997年夏诗歌朗诵会上所热情赞誉的：“他诗好！人也好，他的诗，真实朴素”。

1997年盛夏，一些在京的诗人好友，与朝阳区文化馆一起，热心地为志民组织了一场朗诵会。请了牛汉、谢冕、蔡其矫、徐放、张同吾、丁国城等著名诗人和诗评家来参加。

那时，我也作完了大手术，刚刚恢复。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前一年我陪志民在通县住院期间，谈话内容都是医院的人和事，有时也和病友们说说笑笑，但我有意地避开谈论文学和诗的话题，怕影响他的情绪。这次他有感于老朋友们的一片热心，竟坚决地说：“我应该去！”

志民到会后，很是高兴。他和著名朗诵艺术家殷之光和著名演员周正等同志一一握手表示谢意，并在会上即席讲话。

会上朗诵的头一首诗，即是他生病前的近作——长诗《昨夜星辰》。这是志民作为一名老战士，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诗中说 he 看到的历史镜头，既有“东条英机，把罪恶的头颅，伸进无情的绞索”，又有“希特勒的情妇，伴随着那位20世纪最大的债主，叩响

地狱的门环，逃离了这个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人类世界”。诗中，他还嘲弄说：“法西斯，已改名换姓，‘四人帮’，并不叫‘希特勒’”，“现代的狼外婆”“戴上了时髦的假发”，“魔鬼涂上了美丽的面膜”。长诗最后写道：

天，快要亮了，  
夜，渐渐退缩，  
滚在我脸颊上的  
那不该是泪珠吧？  
不，那是  
星光的反射。  
仁慈的老天：  
面对今夜的星光，  
请允许我  
用这双年老多皱的手，  
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所有受难的亡灵，  
献上一杯祭酒，  
同时还要咨询一下：  
法西斯的阴魂  
什么时候  
才能在人间绝迹？  
孩子们的眼睛  
什么时候才能——  
只看到鲜花  
再不见鲜血……

他在会上作了热情的讲话。会后记者采访他，提了很多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如“诗人的素质应具备什么？”

他严肃地回答：“爱祖国、爱人民、忠于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

他还说：“要接受历史教训，接受十年浩劫的教训，不要走弯路！”“忠于人民，说真话，讲心里话，忠于生活的真实。”他再次地重复着。

这就是志民留给他深爱着的祖国、人民和亲人们的最后的心声。

（责任编辑 洛松）

# 我眼中的作家

## 胡征

● 涂光群

我知道胡征，是在较早的时候。那是1951年，我在武汉《长江文艺》工作时，在汉口交通路一家书店买得三联书店出版的胡征的长诗《七月的战争》。长诗写1947年夏天，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从中路突进，突破国民党河南、山东两省之间的黄河防线，胜利进军鲁西南，从而为挥师中原，挺进大别山，打开了通道。这是一部大气魄的诗作，激情丰沛。由于作者亲身参加了此次战争，因而具备现场实感。我从未见过中国一位诗人这样写战争，有这样大气魄的长诗，因之，爱不释手。而且从写作日期看，作者是1948年9月10日初稿，1950年5月末定稿，这说明作者写成初稿，是在随大军南进的征途之中；且从初稿到定稿，均离那次战争时间不远，我佩服作者写作速度和诗作的凝练、概括能力。从此，我记下了诗人胡征这个名字。其后50年代初，我来北京《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又购得他1954年出版的《七月的战争》和《大进军》两部长诗的合集，扉页上有刘伯承将军亲笔题词。此时我也知道胡征已调北京，在《解放军文艺》工作。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些人的事情让我至为奇怪。一个是路翎，从他的小说来看，旧时代，他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新时代到来，他热情投入生活，而且去了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抗美援朝前线，怀着虔敬、炽热感情来塑造志愿军指战员形象，作品使许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读者也深受感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而将

其投入监狱，长期监禁呢？再一个就是胡征。诗人胡征本来是《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的主要编辑，又当编辑又写作。听说比胡征小几岁，当年还是无名作者的杜鹏程，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在发表前，作为此稿编辑者的胡征，就曾给他帮助。因之谦虚的杜鹏程曾将胡征当作老师看待。论胡征作品的影响，那部刘伯承将军亲笔为其题词的战争长诗，在1953年出版后，曾连印三次，短时期内，累计印数接近8万册。我的印象，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名诗人出的诗集，能达到如此创记录的发行量。记得1954年某天，在我们编辑部主任葛洛办公室，我曾同来访的诗人胡征匆匆见过一面，那年他三十多岁，显得非常精神。葛洛介绍，胡征是他在延安“鲁艺”的同学，后来又同在第二野战军当随军记者。可是没过多久，胡征突然脱下军装去陕西省作协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一来，胡征很快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从此下落不明。这也是使我非常纳闷的。他怎么是胡风分子呢？我想他顶多是抗战时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过作品。而据说，当时由于邮寄不便，解放区作家的稿件有的是经周恩来带出去，交给胡风选登的，这怎么能算在作家个人账上呢？难道跟胡风沾一点儿边，就是反革命吗？胡征不仅在战场上打国民党，他写的作品，也是赞颂解放军打国民党的，而且受到解放军最有名望的将领刘伯承将军充分肯定（据说刘帅曾逐字审阅胡征的战争长诗）。怎么打蒋

介石的胡征一转眼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些个疑团，我难以解开。

1960年，我去陕西出差，住在作协西安分会。有一次到《延河》编辑部去。陪同我去的一位编辑指着坐在一角侧着身对着我的中年人，低声对我说，那就是胡征，胡风分子，刑满出来后放在我们这里做一般工作。啊，胡征在这里。我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但是不好吭声，也不便同他招呼，退了出来。我知道这样人的处境，尽管是很好的人，处在此种境地，就如同印度的贱民，是“不可接触的人”。

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我重见了胡征，并且成为很好的朋友，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喜欢他的文章和作品，更敬佩他的人品、人格力量。我在心里发出一句话：啊，苦难养育出来的作家，你比你的某些同辈作家更加强而有力，更富有活力，更有后劲儿。你是生活中的勇士，也是笔阵中的佼佼者。

要详细叙说胡征的苦难遭遇，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但我可以讲讲我印象深的那些地方。

胡征，1917年生，湖北大悟人，学徒出身，不到20岁，在他的家乡办过诗歌刊物。21岁赴延安，同年入党。他是全然的诗人气质，热情似火，好学不倦。可是他的大半生生涯，除了在刘、邓大军当随军记者，没过上几天安生、惬意的日子；也没有几年时间，从事他最钟情的文学创作。到80年代初，为他落实政策，他已近七十高龄。1939年他在延安“鲁艺”时，书刊甚少，大家处于文化饥渴状态，因之从国统区进来的进步文艺刊物很抢手，胡风主编的《七月》更是“热门”，不易借到。看了几期《七月》，胡征对胡风的文艺主张和他编的杂志比较能接受、欣赏。对比之下，他觉得周扬院长上的大课，并不是没有缺点的。然而这一家之言，教师、学生，却是洗耳恭听，绝少听见异议。他有时就发点微词、异议。但是两年后的整风，由“审干”很快变为“抢救失足者”运动，胡征遭“抢救”，日记、笔记被查抄一空，要他“交代问题”。后来他虽未被打成“国特”、“日特”，得到解脱；然而笔记本上对胡风文

艺理论欣赏的段落，十多年后却成为他亲胡风、远周扬（也就是远文艺界党的领导人），跟胡风脱不开关系的“罪证”。而1944年，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向他征的诗稿，由周恩来带往重庆交给胡风，被登在《希望》杂志较显著地位的他的“诗集”（虽则刊发后他也没机会见到），十多年后，将他塑造成一个插翅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放下“抢救运动”遭整的包袱，毅然奔赴解放战争前线。他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作为随军记者和文学有心人，他亲临火线，不怕牺牲，与战士打成一片。他全面深入地采访，从部队首脑机关刘、邓首长，到各级指挥员，战斗英雄，普通战士，他广泛接近。他写作勤奋，除写通讯报道外，长诗也在酝酿、起草中。然而在1948年1月，胡征遇见一件在敌我激烈较量、瞬息万变的战争中随时可能发生，但又难以预料的非常倒霉的事。这年1月在大别山王家店战斗中他不幸被俘。这个被俘地点，离他家乡不远。在众乡亲和父亲掩护下，他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坚决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分，终于成功地从敌方俘虏营逃出，回到解放区。共产党员被俘，接受组织审查是理所当然的，胡征也心甘情愿。但是，从此他就不再得到信任。审查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令我万分惊奇又佩服的是，他那激情充沛，文字力透纸背的两部赞颂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的长诗，正是在他被审查之中完成的。这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证明。也是只有矢志不移的真正革命作家方能做到的。但是，在拖拖拉拉七年的审查之后，胡征背上了“派遣嫌疑”、“变节行为”，被开除了党籍。我猜测，大约也是在这样背景下，他才身不由己地离开部队文艺工作岗位而去了地方的。

然而祸不单行。在他向北京申诉对自己的错误处置、上边回信表示将受理此案不过十天之后，新的更大的灾难突然降临，他所在的陕西的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要他讲清楚和胡风“是什么关系”。从这一天起，他失去了自由。他被隔离

在单位的一间房中，有人监管，家人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在他竹筒倒豆子似地将他和胡风的关系书写出来，等待他的却是更大惩罚，公安部门一纸通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驻会作家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胡征，隔离反省以来，拒不认罪，交代不老实，决定逮捕关押”。关押五百多个日夜之后，他虽被释放回原单位，但行政降了六级，“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名背了25年。也就是说，他不仅被剥夺了老党员、老干部的权利，还从人民队伍中出列，从而也被剥夺了一个作家写作和发表的权利。1960年，我看见他时，他正是这样一个处境。

90年代初期，我去胡征所在的陕西社会科学院看望他。他已年过七旬，而创作心劲儿甚高。他告诉我，他长期背在身上的，被开除党籍的“派遣”嫌疑、“变节”嫌疑，是在1980年才彻底解决，随即恢复了党籍、级别、待遇的。这一冤案延伸的长度，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人生有几个四分之一世纪？但毕竟解决了，还是应当庆幸的。

胡征对我说他有一部写刘邓大军当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高超、绝妙的战略战术，快速突破蒋介石黄河防线，胜利进军鲁西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已经写完初稿，正在找出路，他也希望我帮他想想办法。我说，正好我在编《传记文学》杂志，可以给你发一些，求之不得呀？他还告诉我，自从80年代对他落实政策以来，他以争分夺秒的精神，写作新著和整理编辑以往旧作多种，近百万字，有诗学、美学论著，诗作评论鉴赏，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等，还有小说、散文创作，等等。只是出书艰难，有的出版社出书，向作者索要很高的费用，我们穷文人，如何出得起？他的三四部定稿书稿，那时只有《胡征诗选》于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他坚信，有价值的书，总是社会需要的。

我返回北京，他即赐寄从《鲁西南会战》这一大著中抽取的精彩篇章多篇。像《刘邓大军司令部见闻》、《中国军神》（写刘伯承将军）、《王克勤排长的牺牲》等。我读后，觉得是刘、邓神奇的战争指挥艺术和玄妙的战争风云际会的现场写



胡征同志近影

真，是难得的表现战争的杰作。因之我以“战争奇观”作栏题，率先将《强渡黄河前夕的刘邓司令部》发在1992年《传记文学》第三期最显著位置上。此后，胡征成为这本杂志经常的撰稿人，除了战争题材作品，他还写了些忆往的作品，如《我在延安鲁艺的时候》等。这是一种友谊的合作。此后，凡写了新作，他都寄给我一观。

近数年，胡征的多部大著如《诗情录及其他》、《创作拾穗》等均已由西北的出版社出书。最使我高兴的是去年秋末，胡征写战争的大著《鲁西南会战》终于面世，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赐我一本，虽说其中不少篇章我早已阅过，但从头至尾读一遍，仍感觉精彩纷呈，令人欣喜畅快。写刘伯承将军甚为传神，写敌方将领如郭汝槐、宋瑞珂之辈，也决不简单化。至于对真枪实弹战争的描写，也相当出神入化。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你看他写自己青春时代所经历的，仍然新鲜如昨。这不是这位作家青春不老最好的象征吗？

（责任编辑 元璋）

# 甘肃的古罗马 军人后裔

· 陇人

“近日，中国考古学家在甘肃发现了近百名形貌酷似欧洲人的当地农民，据有关专家考证，他们应该是2000年前古罗马远征军残部留下的后裔。”1998年秋，这条简短的消息经新闻媒体传播后，迅速在海内外引起震动。这支军队当时为何要远征亚洲？他们是怎样在中国“落户”的？这些军队后裔的生活方式，与当地有何不同？日前笔者带着一系列疑问，专门对此进行了采访。

## (一)

据史学家介绍，公元前53年，也就是中国西汉甘露元年，克拉苏，这位与恺撒大帝、庞培同称罗马“三巨头”的新贵，执政不久，就率罗马军队远征。据当时的资料称，有7个重步兵军，一支轻步兵，4000名骑士，连同辎重队在内总共约5万大军，进攻属于古安息王国（今伊朗）的美索不达米亚，并于次年向安息王国腹地推进。他们计划从美索不达米亚展开进攻，强渡幼发拉底河，并前出到底格里斯河，一举夺取前亚细亚。哪知事与愿违，公元前54年4月底，古罗马军队在宙格马城附近渡过幼发拉底河后，却被安息国一万骑兵引至滴水皆无的沙漠深处，并派出精锐骑兵不断袭击，以疲惫罗马步兵。不久，在一个叫卡尔莱的地方，这支不可一世的远征军遭到对手

围歼。除克拉苏之子普布利乌斯率第一军团6000余人拚死突围外，几乎全部在此丧生（克拉苏本人也在这次战役中被俘斩首）。这次战役，给人留下了一个旷世之谜。突围出去的这支军队，从此神秘消失。至于他们去了哪里，下落何在，谁也说不清楚，就连欧洲史上也没有任何记载。

到了公元前20年，古罗马帝国和安息王国签约言和。这时，罗马帝国要求安息遣返33年前在卡尔莱战役中被俘虏的军人，并寻找普布利乌斯的下落。可是，普布利乌斯及其所率领突围残部，已在安息消失得无影无踪。

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利斯为追寻罗马失踪者的踪迹，弃职来到兰州，与西北民族学院关意权教授等，共同开展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他们查阅了大量史书，结合中西史料的对比研究，理清了那支古罗马军队残部的踪迹：即普布利乌斯率领的这支残部，在卡尔莱战役中逃脱后，在安息军队围追堵截、回国无路的情况下，一直在安息高原流浪，伺机东进。他们历经艰辛，几经磨难，最后终于在防御松懈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一道口子，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后被匈奴郅支单于收编成雇佣军，并保持了自已的编制。他们还经常参与对西汉西部的劫持和进犯。

这支残部后来竟进入了中国，并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安家落户，繁衍子孙。





早在1992年，他们所在的甘肃永昌，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永昌县位于河西走廊东段，祁连山北麓，是古丝路重镇。此城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这里有汉朝的鸾鸟、番禾古城遗址，汉、明的长城及沿线城障烽燧，以及古代少数民族的三角城遗址等。当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国际远征队”到此考察时，就吃惊地发现，地处永昌县城西南约100公里处的鸾鸟古城，“是一种异族的形状和文化垒筑的东西，与西欧的古城防相似。”在建筑布局上有鲜明的古罗马风格。当时一些西方学者说，这座城很可能是由古罗马人建筑的，他们称之为中国的“庞贝”。随队考察的中国学者李希光先生，还撰文称此城为河西走廊上的“罗马古城”（见《找回中国昨日辉煌》一书160页）。在《史记·匈奴传》和《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于“鱼鳞阵”的描述。据考证，这阵势就是罗马军队的布兵方式，所谓鱼鳞阵就是古罗马士兵手持盾牌组成的方阵。可是，谁也没有想到，2000年前这支古罗马远征军残部的后裔，就住在永昌县境内。

不久前中国考古学家到西部偏僻荒原上考察时，他们在永昌县南10公里处的者来寨村，找到一段10余米长的残存土墙。学者们在土墙附近又发掘出一根3米多长的粗大圆木。圆木周体嵌有几根30

多厘米长的木杆。专家考证，这根奇特的木制品，与史料记载古罗马军队构筑城防的“重木城”工事极为相似。更让众人吃惊的是，他们在这个村庄里还遇到了一些长相与众不同、居民。这里的成年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但无论男女，都眼窝深陷、鼻梁老高，头发都是“自来卷”，且统统金黄（包括胡须）。39岁的村民宋国荣身高1.82米，眼窝深陷、金发披肩。他对考古学家说：“父母告诉我，我们的老辈人都来自遥远的西方。父亲也是黄头发、蓝眼珠，很像后来我在书报上看到的欧洲人。”来过这里的历史学家考察后认为，宋国荣和他的100多名乡亲，就是2000年前神秘失踪的那支古罗马军队的后代。

## （二）

据《汉书·陈汤记》记载，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奴役康居人民，攻略乌孙、大宛等，威胁西域。汉西都护副校尉陈汤和都护汤延寿发兵至康居，恶战数月，灭郅支单于。但令人惊讶的是，汉军在与郅支所属大军的作战中，却意外遭遇了一支善“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修木城的外来军队，其战术很难对付。据军内学者师永刚先生介绍，那时的阵法多用“八卦”、“玄武八斗”等等，步兵夹杂骑兵，战斗队形较为保守。而这种阵形，几

乎是全力向前滚进的冲击队形。据考证，这种阵法正好是古罗马步兵最惯用的阵法之一；包括他们修筑城防的方式，几乎惊人的一致。陈汤率大军降服这支军队后，将俘获的军士收编，协助汉军守卫边防。《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战略要地，今河西走廊一带。事实上早在汉代以前，秦始皇从东海碣石山修筑的万里长城就经过这里。汉朝为了使这广漠的地面上能够有人居住和进行交易，不仅在河西走廊的绿洲上设郡，还向这一带迁徙了大批移民经营开荒。也许就是在这一个大背景下，这些古罗马败军才会在永昌“落户”。公元前20年西汉的版图上标有这个新设立的行政区的具体位置。这个名为“骊靬”的城镇，（有关学者说，“骊靬”是汉朝以前对西域的统称。后又成了对这个古罗马人居住地的专称。）甚至在1979年版的美国《世界历史地图集》里都能找到。年逾古稀的甘肃省考古专家钟圣祖说，有历史学家找到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的地图，这地图是一张报纸大小的布绢。布绢已经腐蚀，上面的丝线有的已经迸裂。但他们仍可以在破旧的地图上，清晰地辨认出“骊靬”那个城镇的名字。它的方位大致相当于现在永昌县的者来寨村。

包括宋国荣在内的这些村民，世代都居住在这个祁连

山下的小村庄里，考古发现也证实了他们落户此地的年代十分久远。文物工作者在村边古墓中挖掘到一些陶器，一具巨大的完整人骨骼和一撮未及风化的棕色毛发。这些陶器和墓葬的形式，都使专家确信它们属于距今 2000 年左右的汉朝。周围的村民在挖地时捡到一个椭圆形的铜器，上面有“招安”两字，人们认为它极可能是古罗马人军帽上的顶盖。因为这支部队本来就被汉朝降服，所以出现“招安”这样就在情理之中了。

### (三)

黄土反映着秋日斜阳最后的温暖，路两边的枯黄的植物簌簌乱抖。走进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小村庄，笔者发现这里的居民除明显具有地中海人特征外，还生性开朗，交谈时不时“冒”出一些颇有当地特色的、甚至有点“粗”的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里的男子不仅“块头”大，且崇尚勇武，十分强悍，也许是继承了他们祖先喜欢打斗的遗风。村里有个习惯十分古怪，尽管这里地处大西北黄土高坡，相当偏僻，甚至很多人连小小的永昌县界都没走出过，但他们却像西班牙人一样，对斗牛有着特殊的爱好。他们始终保留着遥远的欧洲人的习俗，对牛十分崇敬，每年新年都要用面粉做成牛头形状的食品以供祭祀。他们还喜欢用血腥味将牛



者来寨村的孩子们

逗得狂奔乱吼，而后互相拚死角斗。有关专家认为，这正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这里的女子要比当地女子显得大方，无论干什么事似乎都显得很自信；她们对音乐也情有独钟，与当地另外一些村庄的女子相比，似乎更有生活品味；但无论男人或女人，讲话时在发音上都与当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如卷舌音多，鼻音重，通常把“肉”念成“入”或“儒”等等。

村里还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习俗，如他们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按照头朝西方的规矩，所有发掘的古墓葬和现在的坟墓无一例外。这里奇特的古罗马风俗和神秘的历史，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永昌县还新建了一座“骊鞞”宾馆，一家“罗马商场”，以及一个反映该县 2000 年历史的巨型石雕。

尽管可以肯定居住在永昌县者来寨村的特殊“移民”，

是古罗马军人后裔无疑，但至今有许多谜难以解开。在河西走廊定居后，这些远征军是否都成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后代远不止者来寨村这点人，中国其它地方还应该有。据国家文物局青年学者林梅村介绍，他们在新疆米兰一座寺院里发现一幅壁画，上面有一行少数民族文字，记载一位名叫蒂沙的工匠，画完这幅画后得了 3000 枚德拉克马（希腊钱）。由于蒂沙是典型的罗马人名字（像买买提是维吾尔人的名字一样很有代表性）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位工匠来自遥远的古罗马，况且他画的这幅壁画也是罗马风格的，画上的人物插有双翼。新疆是否也居住着这样的特殊“移民”？这些古罗马军人的妻子是汉族或是其它少数民族？

通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也许用不了多久，这些难解之谜就会大白于天下。（责任编辑 吴思）

# 邓颖超与 宜昌儿童公园

● 曾继全

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又是英雄的女性，孝顺的女儿，贤惠的妻子。她终生没有儿女，但有一颗慈爱的母亲的心。她特别关心青少年，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

1985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刚辞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来宜昌视察工作。

10月17日下午，在邓大姐下榻的桃花岭宾馆，我以宜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儿童交通安全教育游艺场建设者代表的身分，毕恭毕敬地向邓大姐呈送了“宜昌市儿童公园交通安全教育游艺场”的影集。

邓大姐高兴地接过影集，戴上放大眼镜，逐页细看游艺场的图片。当看到一对身着男女童装，名叫西西和陵陵的机器人照片时，邓大姐问我：“机器人是宜昌造的吗？”

我回答说：“是宜昌造的。是宜昌710研究所制造的。”

邓大姐又问：“这机器人与日本制造的机器人有什么不同？”

我忙回答说：“我从报上看到彭真同志访问日本的报道，说机器人向客人表示欢迎。我们的‘西西’和‘陵陵’也具备按程序说话、做动作、眨眼睛的功能。”

我接着向邓大姐汇报说：“这些年宜昌市发展快、车

辆增多，交通事故不断发生。为了对孩子们进行交通安全知识教育，我们在儿童公园内投资建设了交通安全教育游艺场。”

邓大姐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在一个城市的儿童公园里，搞一些交通设施，集教育与游艺于一身，是一个创举。占地不多，花钱不多，孩子们在这里玩的过程中也受到了爱国主义和交通安全的教育。你们为儿童办了件好事。”

我们见邓大姐兴致很高，便提出了请邓老为儿童公园题写园名的要求。邓大姐稍有停顿后说：“你们要我题字，他们（指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我的手发抖，已经好久没有写毛笔字了。不过你们今天要我为孩子们写，我还是要写的，但也可能交白卷。”

因为这次来宜昌时间太短，84岁高龄的邓大姐无暇亲去儿童公园视察，但是当日，她还是委托时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的杨德中同志去冒雨看了建设中的交通游艺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赵炜，也将邓颖超同志用毛笔在宣纸上给儿童公园的题字送来了，并说明“儿童公园”四个字，是由邓大姐从她书写的13个字中挑选出来的。

邓大姐对宜昌儿童公园的建设一直挂在心上。1988年2月4日，我以宜昌市建委副主任的身分和市园林局副局长刘家庆，市城建档案馆龚万信一起，经秘书局与赵炜同志联系后，在中南海西花厅，再一次见到邓大姐。

她老人家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认识、认识，我们在宜昌见过面。”我说：“我们是受宜昌市委、市政府领导委托，代表宜昌的儿童们来看望您老人家的。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邓大姐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了！”

这天，正值邓颖超同志84岁生日。我们虽然没有明言是来拜生日祝寿，但聪慧敏锐的邓大姐自然心底明白。老人家既不把话叉开，又不明言批评，而是循循善诱，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在进城前，毛主席就作了规定，进城后，不准给领导人做生日祝寿。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主席这话，还是要照办的。”邓大姐又说：“在我们家里，也是从来兴不生生日的，恩来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过去在战争环境，成天忙于工作，生日过了，有时还不知道。有时候，在过生日这一天，是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在吃晚饭时下一碗面来，这也就算过了生日。”

说着，邓大姐的注意力便转到宜昌儿童公园的建设上，她对两年来公园的发展和面貌的改观，给予充分肯定，并一再嘱咐我们重视儿童智力的开发。

# “义不忘华”的 华裔作家水仙女

● 房福贤

自从1820年第一个中国人踏上美国领土迄今已近两个世纪。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中国人，已成为整个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他们不仅为美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科技文化方面的成就也有目共睹。就文学而言，不仅涌现出了大量华裔华文文学，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华裔英文文学，有些英文文学作品还成为畅销榜上名列前茅的畅销书，华裔文学已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这一文学洪流的源头，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的第一个女小说家：水仙女（Sui Sin Far）。

水仙女，是伊迪丝·莫德·伊顿（Edith Maud Eaton）的中文笔名。她1865年5月15日出生于英国的丝绸业中心麦克莱斯费尔德，是一个欧亚混血儿。她的母亲格雷丝·特费塞思·伊顿（Grace Trefusis Eaton, 1847-1922），广东人，三四岁时被一马戏班子从家中拐走，后被来中国传教的一对英国夫妇收养并送回英国接受学校教育。长大以后又回到中国，在上海传教。水仙女的父亲爱德华·伊顿（1839-1915）是英国一丝绸商人的儿子。他本来在巴黎学艺术，但他父亲却执意要他经商，他只好中断学业，并于1861年来到中国最大的商埠城市上海。在上海，他遇到了格雷丝，两人随后堕入爱河并结了婚，当时格雷丝16岁。婚后不久，这对年轻夫妇回到英国，与家人一起生活

了几年。但是，由于伊顿的父母对中国人有偏见，不赞成这一跨国婚姻，生活很不愉快。这对年轻夫妇只好离开故乡，于1872年带着他们6个年幼的子女远走美国，先在纽约生活两年，后又移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水仙女是他们生养的第二个孩子，在女儿中最大。

这是个庞大的家庭，又是一个贫穷的家庭。家庭消费全靠伊顿画风景画赚来的微薄收入维持。水仙女是个非常懂事孝顺的孩子。她自觉承担起长女的责任，为父母分忧。10岁时就做花边卖钱贴补家用，还挨门挨户去推销父亲的油画。后来她自立以后，每月都要寄钱给她的父母，从不间断，很有中国传统女孩的风范，尽管她从未在中国生活过。

尽管这个家庭贫穷得过圣诞节连棵圣诞树都买不起，但却充满浓厚的艺术气息，父母十分支持孩子们向这方面发展。而伊顿家的孩子们似乎也特别有才华：三个孩子会写诗，一个女儿成了芝加哥第一个美籍华裔律师，两个孩子当了画家，一个儿子做了发明家，并且是柯达和通用电器公司的独立承包人。而水仙女和妹妹温妮弗雷德（Winifred Lillie Eaton，日文笔名 Onoto Watanna, 1875-1954）则成了职业小说家，水仙女主要写美籍华人及中国血统混血儿生活，而温妮弗雷德则主要写美籍日本人及日本血统混血儿生活，两人同时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

水仙花小时候染过腥红热，这次大病损害了她的健康，她长得瘦弱矮小，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人小，但感情丰富，我的虚荣心是成为名家。”她自学写作技巧，靠自己的勤奋，成为《蒙特利尔之星》报的记者。1888年她在《插图自治领》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散文《马车旅行》。她的以北美中国人为题材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赌徒》发表于《飞叶》1896年10月号上，并首次使用了水仙花的笔名。据说这与1891年9月《插图自治领》上的一篇文章《不列颠哥伦比亚中国人生活插曲》有关。这篇文章介绍了一个有关水仙花的中国传说。传说有一个农民死后留给两个儿子一块地产，要他们平分。但哥哥把好地抢走了，留给弟弟的却是什么都不长的沼泽地。弟弟陷入了困境。但是有一天来了一头白象，送给他一棵鳞茎状的根，他种到地里，结果不久好运来了，他的土地成了花的天堂。意外的收获给他带来了财富，也带了官运，成了皇帝信任的大臣，并在他家门前竖了一杆黄龙旗。伊迪丝使用水仙花作笔名是否一定源于此文尚无定论，但伊迪丝使用具有吉祥、运气、美好等象征意义的中国水仙花作为自己的笔名，却毫无疑问地表明她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与热爱。

1898年，基于健康的原因，她在医生的建议下，移居西海岸的旧金山，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当了两年打字员。1900年，她又到了西雅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近10年。她加入了有400多人组成的西雅图华人社团，并参与了当地中国城浸礼会布道团的工作，晚上教中国移民学习英语。这期间，她接触了大量华人，收集了很多素材。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创作于这个时期。1912年，她的唯一的一本也是美国华裔第一本英语小说集《斯普林·佛莱格莱斯太太》(Mrs. Spring Fragrance)在芝加哥出版。虽然早在1887年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李恩富(Yan Phou Lee, 1861-1938)就出版了英文书《童年在中国》，但这是一本自传性的书，不是小说，且内容全是老中国的故事，因此，水仙花

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表现美国华人生活的华裔小说家。

水仙花死于1914年4月7日，年仅49岁，终生未婚。水仙花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美籍华人的权利而斗争的事业，不仅用笔，也用行动。当她在一家地方报纸作记者，负责报道当地华人生活时，许多华人遇到麻烦便找她帮助解决。为此，纽约一华人曾在报上发表文章深情地说道：“因为水仙花在保护华人时采取的勇敢立场，使在美华人全都欠了她一笔还不完感激债。”正是基于这种情感，蒙特利尔和波士顿等地的华人社团，在她死后，为她修建了一块刻有“义不忘华”四个中文大字的墓碑，表达华人对她的热爱与怀念。

上一个世纪之交，美国华人以及欧亚混血儿的生活，组成了水仙花小说的主要内容。作为第一个表现这一题材的华裔作家，水仙花对美国文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水仙花不仅表现了这一题材，还在对华人及有华人血统的美国人生活的真实描写中，表达了她对种族歧视、社会偏见的深沉思索和强烈抗争。正如水仙花新版小说集的编者林英敏和怀特·帕克教授所说：“她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国家政策和社会价值观的偏见和不公，并且勇气百倍地站出来反对它们，……给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以声音”。

水仙花时代的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国家，对华人的偏见尤甚。自从1849年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开后，中国人开始大量涌入美国，到1860年，加州近八万三千的金矿工人中，华人就占了两万四千人。上一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部铁路建设，又吸引了大批华工。从1866—1869年，华工达到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劳动力90%，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铺设了一千八百里铁路，将内陆和西部交通联结起来，为美国西部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华人的增多，美国反华的情绪也愈演愈烈。早在1849年，加州就制定了法律，禁止中国人、黑人和印地安人向法庭出示

证据控告白人，使白人任意虐待有色人种而不受惩罚。1860年的法律则特别禁止“黄种人”入公立学校读书和进公立医院看病。1873年美国股票市场大崩溃，加州经历了它的第一次经济大萧条，一些人便趁机将危机转嫁到中国人身上。一个叫丹尼斯·基茨尼(Dennis Keazney)的爱尔兰血统演说家，在反华联合会和加州兄弟会的支持下，到处演说，他演讲的开场白和结束语都是同一句话：“中国人必须滚！他们偷了我们的工作。”在这种疯狂的叫嚣下，1879年，加州通过了禁止公司雇佣华人的法律，并将中国人从城里赶出去，安置于某个地区。1882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排华法案，从而使反华浪潮达到最高峰。大量华人，特别是在加州的华人，被抢、攻击、私刑拷打、火烧、驱逐甚至谋杀，造成了无数的悲剧。

就是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中，水仙花这个弱女子开始了她的笔墨抗争。这种反抗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首先来自于她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儿自身的痛苦经历。在西方社会，不仅中国人受歧视，只要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受歧视。她的自传体小说《树叶儿》通过水仙花的经历和见闻，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她四岁那年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有一天她听到她的保姆对另一个保姆说，她妈妈是中国人，那个保姆便好奇地看着她，然后窃窃私语。当时水仙花虽不懂中国人是何意思，但她明白她们在谈论她的父母。于是她回家时便试图将此事告诉母亲。但由于年龄太小说不清楚，保姆便说她是撒谎的孩子，母亲为此而打了她。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那以后，许多年过去了，但那天让我第一次懂得了，我是有点不同于其他孩子的。”

这种不同带给她无数的屈辱。一次，她和另外一个孩子在花园里玩耍，从门外走过的一个女孩竟对水仙花的同伴大叫道：“梅米，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和水讲话的，她妈妈是中国人。”在另外一次小同学的聚会上，一个老太太

竟把她叫到面前，仔细辨认她与别的孩子不同。至于被别人追在后面骂：“中国佬，中国佬，黄脸子，长辫子，吃耗子”，就更不新鲜了。而长大以后，精神的刺激更为严重。学跳舞的妹妹不止一次地对她说，有个男青年对别人说，他宁愿娶一头猪为妻也不愿娶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姑娘。

屈辱使水仙花在小小的年纪时就开始了深沉的思索：“为什么我妈妈的种族受到蔑视？”她有机会就到图书馆找有关中国的书看，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但是，这个文明古国的儿女为什么备受别人欺凌呢？水仙花思考的结果是：我们的国家、民族落后了。同是亚洲国家的日本，由于在19世纪后半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东亚强国，在美的日本侨民以及日本血统混血儿便很少受人歧视。中国血统的人在美受歧视，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而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

水仙花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她真实地描写了种族偏见以及种族偏见带来的精神痛苦和压抑，还真实地表现了她对血统中的另一半——中国的热爱及其对种族问题深刻的思考。水仙花并不为自己的中国血统而自卑，相反，她公开向社会承认自己有中国血统，并为血管中的另一半而自豪。水仙花对她的雇主（一个怀有民族偏见的人）平静地说：“我想让你明白，我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水仙花身受种族歧视之害，反对种族偏见，但并不以偏见反抗偏见，相反，她真诚地向往种族间的平相等处。她说：“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把右手伸向西方，左手伸向东方”，“我希望不久去中国生活。因为我的生命开始于父亲的祖国，它自然应当结束于我母亲的祖国。”这是多么博大的情怀和高尚的理想。

除了描写中国血统混血儿的小说外，水仙花还写了很多有关中国城华人生活的小说。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了混血儿的痛苦、困惑和对种族偏见的批评，那么后者则主要描写了华人

正直、善良、勤劳和聪明的美德。水仙花这样写,是有她深刻用心的。当时在美国文学界,出现了很多描写中国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中国人的描写大致相同:鸦片烟鬼,妓女,骗子,屠夫,聪明的恶棍等等。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水仙花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个与华人结婚的白人妇女的故事》及其续篇《她的华人丈夫》是水仙花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美国姑娘明妮的第一个丈夫是白人。比她大十五岁。结婚之初,明妮想方设法让丈夫开心。为了帮助丈夫写作并能出版关于社会改革的书,她又走出家门拚命工作挣钱。但是她的丈夫却不关心她。她因为照顾生病的孩子而丢了工作,丈夫便对她很不满意,不仅如此,还背着她向自己的合作写作者——一个女同事求爱。明妮后被丈夫遗弃。在绝望中,她想到了死。就在这时,刘康吉,一个年轻华人把她从精神崩溃中挽救出来,并把她母女接到一个朋友家去住,还为她找到了一份谋生的工作,使她母子脱离了困境。虽然刘康吉第一次向她求婚,基于种族原因,她没有答应,但当她的前夫又来纠缠时,她才真正认识到了刘康吉的可爱。当她的前夫大骂刘康吉是个“圆滑、矮小的中国佬”时,她愤怒地喊道:“你虽有六尺身躯,但你渺小的灵魂根本没法衡量他伟大的心。你连自己的妻子女儿都不想保护照顾,但他却无私地救助一个陌生女人,尊重她,把她当作一个女人,给她的孩子一个家,让她们独立生活,不把她们当作外人,就像自己人。现在,听到你在背后攻击他,我终于明白了我以前不明白的东西,那就是,我爱他!所有我要对你说的就是:你滚!”他们结了婚。尽管有很多白人瞧不起她,但她不后悔,因为丈夫是个好人。他爱孩子,体贴妻子,而且不乏幽默。他不仅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还是个关心政事、热心社团活动争取人类进步的时代青年。他是改革俱乐部、华人社团俱乐部和华人贸易董事会的成员,经常和自己的同胞谈论生意和中美政策。但是,这

个正直、善良富有爱心的年轻人,却死于那些仇视进步的人手里。死时,手里还拿着给儿子、女儿买的汽球。

《中国的水花》也是一篇感人的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水花是个聪明可爱的中国姑娘。她的邻居莫美,是个残疾人。莫美的哥哥经常在晚上来看她,照顾她。有天晚上莫美的哥哥林约翰没有来,水花便去陪她,两人都很高兴。在把哥哥和水花的探访比较之后,莫美断言,“林约翰是可爱的,但女人不能和男人交流,即使他是你的兄弟。一个人只能同与自己相同的人交流。”对此水花的回答是:“的确是。女人必须是女人的朋友,男人必须是男人的朋友。”自此以后,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一天晚上,房间里突然意外失火。莫美的哥哥林约翰刚好到来。但他只能救一个人。尽管水花早已和林约翰恋爱,水花她还是坚决要林约翰先救妹妹,而自己却不幸死于火中。

在这里,水仙花热情地歌颂和赞美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博大的爱。

水仙花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和思想主题不仅在当时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今天,也仍然是很多华人作家关注的焦点。当今在美国走红的一些华裔英语文学作家如写过《女武士》、《中国佬》等作品的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 中文名字汤婷婷, 1940生)就被称作是“水仙花的精神孙女”。

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水仙花的价值在美国被人们重新发现。她的作品被重新编辑出版,大量论文、研究著作、传记不断问世。一些博士研究生还将水仙花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这说明,一个为人民、为正义而写作的作家,是不会被历史所遗忘的。

(责任编辑 吴明)

# 包拯七次弹劾 宠臣张尧佐

● 春 江

在那皇权至上的时代，皇帝宠爱张贵妃，决心提拔张尧佐。包拯接连上了七次奏折，弹劾这位宠臣。在激烈的廷辩当中，他不慎失态，激怒了皇帝。一场杀身之祸眼看就要发生……包拯仍然没有后退。

反贪官、除恶霸，是包拯一生中最为突出、最为后人称道的业绩。

在他任职的24年间，由他弹劾被降职、罢官、法办的贪官污吏，不下三十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历史上少见的。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象连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这些被弹劾者，都是有权有势有后台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权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拯敢于据理力争，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出类拔萃、望尘莫及的。如七次弹劾张尧佐，多次弹劾宰相宋庠，七次弹劾王逵，都是震动全国的大案。其中特别是弹劾张尧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一场反对贪污腐败的苦战。

## 朝廷宠臣张尧佐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叔父，原来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入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

他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又晋升为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掌管全国经济大权的大臣）。这种扶摇直上，一年之内晋升四次，用现代人的话来说，是坐飞机式的升迁，使许多人感到吃惊。

张尧佐的升迁，并不是凭政绩，而是靠张贵妃这个后宫的关系。

张贵妃八岁进宫，模样儿很漂亮，又很聪明，善于迎合。她本来是服侍杨太后的宫女，宋仁宗又是杨太后抚养长大的。从童年时代，她就有机会接近仁宗，并讨得仁宗的喜欢。仁宗即位以后，便把她由一个普通的宫女，一步一步地提升为才人、修媛、美人、贵妃。在她刚当上了贵妃的时候，害了一场病，她向仁宗皇帝说：“我资薄崇厚，承受不了这样的福气，所以遭了灾，害了这场病，我愿意贬为美人。”她这些举动，很讨仁宗的喜欢。这个张贵妃，父亲早逝，无依无靠，只有抚养她长大的叔父张尧佐。张贵妃出身微贱，迫切希望仁宗皇帝能够提拔张尧佐，来提高自己的身分，满足她那争强好胜的虚荣心。仁宗皇帝一向贪恋美色，四十多岁又没有儿子，对张贵妃便有求必应。张尧佐就是靠这种关系平步青云的。

面对这样的歪风邪气，有些人不敢讲话；有些人还打顺风旗、拍马屁。在张美人册封为张贵妃的时候，谏官王贇就积极为她歌功颂德，一再叫好。张贵妃曾经得意地说：“王贇是我家的谏官”，暗中给了他不少的好处。



## 向庞然大物开炮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包公任户部副使时，张尧佐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因为他曾经是张尧佐的下属，亲眼目睹了这位大红人的所作所为，更加感到肩上的重任。当包拯踏入谏院，便着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1049年（皇祐元年）元月，张尧佐登上了端明殿学士的宝座；3月，权三司使；9月，去掉“权”字，成为正式的三司使。也就是张尧佐一年之内晋升四次的春风得意的时候，包拯在1050年6月，第一次向张尧佐这个庞然大物发动了进攻。在这次弹劾中，包拯提出：“今亿兆之众谓三司使张尧佐凡庸之人，徒缘宠私，骤阶显列，是非倒置，职业都忘，……而尧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来灾疹，实自斯人。”（《包拯集编年校补》147页《弹张尧佐》）包拯指出张尧佐是个庸才，很少建树，办事不力，是非颠倒，造成法制混乱，账目不清，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或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这次弹劾，泥牛入海，没有消息。

包拯6月送上对张尧佐的第一次弹劾后，至9月的四个月当中，又两次弹劾郭承佑，还曾上《请绝内降》疏。这多次活动，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地提醒仁宗皇帝，要解决张尧佐的问题。在《选内外计臣》的两次奏折中，包拯又直接提到张尧佐。因为这一年的9月，是三年一次的南郊祭天地的大典，张尧佐掌握财政大权，慷国家之慨，乱发赏钱，争取公众对他的好感。包拯提出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经相当严重，富裕的江淮两浙，又遭受旱涝灾害，国库空虚，商旅不通，钱粮不足于自给。三司使应该好好算算账，把近几年的收入支出结算一下，让大家心里有数。国家的经济状况，内靠三司使，外靠转运使，要选有才能的人担此重任。如果用人不当，大家又都保持沉默，让事态继续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就不好办了。

这个奏折送上去没有几天，包拯感到话没有讲完，又上了一个奏折。在这个奏折里，他重申了上述意见，特别以宋代一向重视提拔三司使的历史事实，感化仁宗皇帝。奏折回顾说：宋太祖选用陈恕。陈恕掌握财政大权18年，精打

细算，管理得很好。陈恕卸任，是寇准、魏羽接替。魏羽出入三司18年，钱粮业务也管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三司大臣，虽然不如陈、魏，也都是优秀人才。张尧佐才能平庸，担任闲散职务还可以，怎好把财政大权交给他？这会误大事的呀！

## 艰难的选择

过了一段时间，张尧佐不但没有免职，还升迁到比三司使还要高的职位：宣徽南院使。另外还担任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一身而四任。当包拯正为此事生气犯愁的时候，仁宗皇帝又与执政大臣精心策划，把敢于直言的御史中丞郭劝调离，把处事态度平和的王举正调来接任。包拯认为，谏官的责任就是：“惟采取天下公议，别白贤不肖，敷闻于上，冀陛倚常任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贪冒非才者得以胶固其位，害败于事”，皇帝身边的大臣，只是讲好听的，报喜不报忧，皇帝怎能做出正确决策呢？包拯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他决心冒更大的风险，把弹劾张尧佐的事进行到底。

包拯多次弹劾张尧佐，文字不长，并没具体地列举出张尧佐有什么重大的罪状，最突出的一点，说：他是个“凡庸之人”，不很称职。这次包拯在新的奏折中严厉地指出：张尧佐是窃踞高位，“惭羞不知，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也”。（《包拯集编校补》164页）此文的用词已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并且把批评的矛头，婉转地指向仁宗本人：“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义，乃从谀顺指”，“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同上163页）。

## 手捧乌纱 群起廷辩

谏官陈旭、吴奎等人也和包拯一起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抨击。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公又趁热打铁，再次正面发动弹劾。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

仁宗皇帝仍然听不进这些意见。

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连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

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掣乌纱帽了，因有张贵妃从中说情，仁宗皇帝仍然下不了决心。

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诤谏。这是希望改革吏风的仁宗皇帝给予谏官和大臣的最高权利。由于这是皇帝亲自给予的权利，不好马上反口，只好让廷辩照常进行。在这次廷辩当中，包拯作了长篇发言。群臣上朝的时候，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皇帝与大臣是要有一定的距离的。由于包拯措词激烈，情绪激动，不断地移动脚步，渐渐地缩短了中间的距离。正在恳切陈词的时候，一时不慎，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不得不用袍袖擦去唾沫，一怒罢朝回宫。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来。

## 仁宗爱忠臣 又怕忠臣

后宫里的张贵妃，知道大臣在弹劾张尧佐。每次仁宗上朝，她都要送到门口，叮嘱说：“别忘记了宣徽使。”在这个时候，仁宗对张贵妃的要求，几乎是百依百顺，不愿违反她的意愿。所以，不论包拯等人如何提建议，他总是按兵不动，没有采纳意见。这次仁宗皇帝回到宫中，张贵妃慌忙上前询问：“怎么样了？”仁宗长长地叹了口气：“哎！你总是要我袒护你那位叔叔。可是你就不想想，朝廷上站着一位包拯呀！”

仁宗在朝臣面前受了委屈，但是，他没有一怒杀忠臣，泄私愤；他心里仍然明白，要为国家、为社稷着想，包拯是对的，是有道理的。自己的做法是有毛病的。但是，他太爱张贵妃了。他希望满足她的愿望，讨她的开心呀。仁宗是一个立志改革的皇帝，也是一个贪图享乐的皇帝，这就是矛盾的所在。

聪明美丽的张贵妃一看皇帝受了这大的委屈，慌忙跪下请求恕罪。她又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辞，免去一些职务。可是，仁宗皇帝又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拯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

天下。

## 大恩不可频假 群心不可固违

四天不见回音，包拯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

这种一再地劝谏，终于说动了仁宗，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

通过对张尧佐的弹劾，展示了包拯的聪明才智和处事做人的一些准则。即使皇帝要袒护的人，宁愿冒触动龙颜的风险，他也要公开提出弹劾，这种光明磊落的气质、不畏权势的魄力，的确是难能可贵、令人尊敬的。

他提出用人是国家的大事，不能因私人的感情而提拔大臣。如果这种歪风一旦得势，“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尽可皆缘恩私，无求而不获，必快己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私情、私恩，不是小事，当大臣的“岂敢私自顾虑，以身为计哉”（同上 167 页）。

他提出，民心是不可违的，君恩也是不能随便给的，“大恩不可频假，群心不可固违：假之频则损威，违之固则兆乱”（同 169 页）。

而仁宗对张尧佐的恩宠，已经达到了“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之今人则不安”。仁宗犯下了“私于后宫”，“圣经有损”，这会使“奸幸有所窥伺”因此，他建议仁宗“稍割爱情”，“断以大义”。

包拯提出，较小的官吏，贪赃枉法就要受惩罚。“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罢黜”（同上 172 页）。根据这样一个原则，没有“灼然树立”的就要罢官，那些无能之辈，把所在地区的生产搞得很坏，仍然异地做官就行不通了。包拯能够这样提出问题，这说明当时的宋王朝对官吏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

七次弹劾张尧佐，是包公一生许多重大经历中的一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那刚正不阿、大奸必摧、敢担风险的气魄、决心和毅力。人们称他为“包青天”，赋给他许多神奇的幻想色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炎黄春秋

王业美发《内参》引发的思辨 ■

民初名记者黄远生喋血旧金山 ■

甘肃的古罗马军人后裔 ■

温济泽临终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好党员』 ■

『牛棚』里的抗争 ■

泪凝的记忆 ■



严济慈和夫人孩子在一起



温济泽与夫人钱家楣同外孙女合影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